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9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9卷

润东出版社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9卷 润东出版社



#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9卷

润东出版社



毛 泽 东 同 志

#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9卷



润东出版社



#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 目　录

给高桂滋的信……1
（1936年夏）
致朱德等电……4
（1936年7月）
目前西方野战军以休养生息为主……5
（1936年8月1日）
甘南敌情与红二、四方面军的行动意见……6
（1936年8月1日）
关于红军各部指挥权的通令……8
（1936年8月1日）
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9
（1936年8月3日）
为出版《长征记》征稿 ……10
（1936年8月5日）
目前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 ……11
（1936年8月9日）
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 ……12
（1936年8月10日）
致章乃器等及全体救国会会员函 ……14
（1936年8月10日）

致刘鼎电 ……23
（1936年8月11日）
广泛宣传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胜利 ……24
（1936年8月11日）
关于今后战略方针致朱、张、任电 ……26
（1936年8月12日）
致左权、聂荣臻电 ……30
（1936年8月12日）
致彭德怀电 ……31
（1936年8月13日）
对白军俘虏着重施以政治教育 ……32
（1936年8月13日）
攻占岷州战略上十分有利 ……34
（1936年8月13日）
给杜斌丞的信 ……35
（1936年8月13日）
给杨虎城的信 ……37
（1936年8月13日）
给王世英的信 ……39
（1936年8月14日）
给宋哲元的信 ……40
（1936年8月14日）
给宋子文的信 ……42
（1936年8月14日）
给傅作义的信 ……43
（1936年8月14日）

给易礼容的信 ……45
（1936年8月14日）
关于筹款的训令 ……47
（1936年8月18日）
改哥老会为江湖抗日救国会 ……48
（1936年8月19日）
致周昆、袁国平电 ……49
（1936年8月22日）
征询对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作战部署的意见 ……50
（1936年8月22日）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52
（1936年8月25日）
关于向南京进一步谈判等问题致潘汉年电 ……63
（1936年8月25日）
致陈绍禹电 ……65
（1936年8月25日）
关于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红二、四方面军任务的训令 ……66
（1936年8月25日）
给林彪的信 ……67
（1936年8月26日）
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 ……68
（1936年8月26日）
冬季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 ……69
（1936年8月30日）
戏赠周小舟联 ……73
（1936年8月）

给王以哲的信 ……74
（1936年8月）
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76
（1936年9月1日）
关于取消敌对行为互不侵犯等问题给孙蔚如的信 ……78
（1936年9月3日）
陕西、甘肃、宁夏各苏区情况 ……79
（1936年9月4日）
致刘鼎电 ……80
（1936年9月7日）
致宋时轮等电 ……81
（1936年9月7日）
给邵力子的信 ……82
（1936年9月8日）
给王均的信 ……84
（1936年9月8日）
给朱绍良的信 ……85
（1936年9月8日）
抗日反蒋不能并提 ……86
（1936年9月8日）
红二、四方面军行动计划和统战工作进展情况 ……88
（1936年9月8日）
给毛炳文的信 ……89
（1936年9月8日）
致朱德等电 ……90
（1936年9月10日）

致彭德怀等电 ……91
（1936年9月10日）
致贾拓夫电 ……92
（1936年9月10日）
给彭德怀等的信 ……93
（1936年9月11日）
占领宁夏的部署 ……94
（1936年9月14日）
致彭德怀等电 ……97
（1936年9月15日）
聂荣臻部应南下策应红四方面军 ……98
（1936年9月15日）
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意见 ……99
（1936年9月15日）
四方面军宜以主力控制隆静会定大道……101
（1936年9月15日）
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103
（1936年9月16日）
阻滞胡宗南部西进……104
（1936年9月17日）
致朱德、张国焘电……105
（1936年9月17日）
应以红一军团一部先占界石铺……106
（1936年9月17日）
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07
（1936年9月17日）

给宋庆龄的信……113
（1936年9月18日）
给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115
（1936年9月18日）
一军团主力暂在现地待机……117
（1936年9月18日）
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118
（1936年9月19日）
一切工作都应围绕夺取宁夏……121
（1936年9月19日）
统一指挥十分必要……122
（1936年9月21日）
给蔡元培的信……124
（1936年9月22日）
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127
（1936年9月22日）
给蒋光鼐、蔡廷锴的信……129
（1936年9月22日）
给于学忠的信……131
（1936年9月22日）
致朱德等电……132
（1936年9月23日）
致刘鼎电……133
（1936年9月23日）
给李济深的信……134
（1936年9月23日）

致彭德怀电……135
（1936年9月24日）
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136
（1936年9月24日）
复任弼时等电……137
（1936年9月24日）
致彭德怀电……138
（1936年9月25日）
阻止胡宗南西进确保界石铺……139
（1936年9月25日）
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140
（1936年9月26日）
致彭德怀电……141
（1936年9月26日）
与南京谈判重提国共合作停止内战……142
（1936年9月27日）
四方面军宜迅即北上……144
（1936年9月27日）
关于再令四方面军迅速北上致朱、张、徐、陈电……147
（1936年9月27日）
拟令一、二师策应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149
（1936年9月28日）
开办随营学校非常必要……151
（1936年9月29日）
致朱德等电……153
（1936年9月29日）

力求迅速争取和刘湘建立关系……154
（1936年10月1日）
应与国民党军积极建立反日统一战线……155
（1936年10月1日）
致朱德等电……156
（1936年10月2日）
二师宜位于硝河城地域……157
（1936年10月2日）
二方面军渡渭水后的我军行动部署……158
（1936年10月2日）
二方面军宜乘敌尚未全部集中之时迅速转移……161
（1936年10月3日）
四方面军应迅将主力集结马营通渭地区……163
（1936年10月3日）
致彭德怀电……165
（1936年10月4日）
致朱德等电……166
（1936年10月4日）
截断会静定间道路并立即占领庄浪……167
（1936年10月5日）
派人侦察宁夏及绥远等地敌情……169
（1936年10月5日）
给张学良的信……171
（1936年10月5日）
致林育英等电……173
（1936年10月5日）

致朱德等电……174
（1936年10月5日）
目前不应过分威胁宁夏……175
（1936年10月6日）
对一军团主力行动的意见……176
（1936年10月6日）
集中渭水以北后的行动部署……177
（1936年10月6日）
争取迅速开始与南京主要代表谈判……179
（1936年10月8日）
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目前的部署……181
（1936年10月10日）
致彭德怀电……182
（1936年10月10日）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及军事部署致潘汉年、叶剑英电……183
（1936年10月10日）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84
（1936年10月）
致潘汉年、叶剑英电……187
（1936年10月）
致左权等电……188
（1936年10月11日）
红军政治工作的问题……189
（1936年10月11日）
征求对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意见……190
（1936年10月11日）

致彭德怀等电……191
（1936年10月13日）
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192
（1936年10月13日）
复彭德怀电……195
（1936年10月14日）
关于已向南京提出四项意见致叶剑英电……196
（1936年10月14日）
当前形势与扩大停战抗日运动……197
（1936年10月15日）
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谈话……199
（1936年10月15日）
目前我军应坚持休整与迟滞敌人前进的方针……200
（1936年10月16日）
红四方面军情况和中央的方针……201
（1936年10月16日）
国民党提出的谈判条件……202
（1936年10月17日）
为徐向前起草的致胡宗南信……203
（1936年10月18日）
当前统一战线形势……205
（1936年10月18日）
致彭德怀电……207
（1936年10月19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鲁迅逝世发出的电报……208
（1936年10月20日、22日）

给叶剑英、刘鼎的信……212
（1936年10月22日）
致彭德怀电……216
（1936年10月22日）
给彭雪枫的信……217
（1936年10月22日）
给刘少奇的信……218
（1936年10月22日）
关于对阎锡山的态度致叶剑英、刘鼎电……219
（1936年10月23日）
同意彭德怀宁夏战役计划……220
（1936年10月24日）
击破南面之敌的部署……222
（1936年10月25日）
给傅作义的信……224
（1936年10月25日）
致彭德怀电……226
（1936年10月26日）
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227
（1936年10月26日）
致彭德怀等电……231
（1936年10月28日）
致朱德等电……232
（1936年10月28日）
对胡宗南部作战的部署……233
（1936年10月29日）

打击胡敌周孔两师之部署……235
（1936年10月30日）
先打胡宗南后攻宁夏……237
（1936年10月30日）
致林育英电……238
（1936年10月30日）
致彭德怀等电……239
（1936年10月30日）
给许德珩等的信……240
（1936年11月2日）
关于过河部队的行动问题致朱德等电……242
（1936年11月3日）
关桥堡地区作战应依实况决定……243
（1936年11月3日）
集中全力歼灭饥疲之敌……245
（1936年11月3日）
给陈公培的信……246
（1936年11月4日）
争取在运动中打敌一个师……247
（1936年11月8日）
力求消灭敌一部……248
（1936年11月8日）
作战新计划……249
（1936年11月8日）
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及其领导机关名称人选问题……252
（1936年11月8日）

为抗日计红军愿停止攻击国民党……253
（1936年11月9日）
关于询问西路军情况致徐向前、陈昌浩电……255
（1936年11月11日）
关于打曾万钟的部署……256
（1936年11月12日）
和南京谈判的协定原则……258
（1936年11月12日）
致朱德、张国焘电……259
（1936年11月12日）
关于同意曾养甫、陈立夫所提四条并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致刘鼎电…260
（1936年11月12日）
致彭德怀电……261
（1936年11月14日）
致朱德等电……262
（1936年11月14日）
打敌办法……263
（1936年11月14日）
可让王以哲部进豫旺……264
（1936年11月14日）
集结红军准备与胡宗南部作战……265
（1936年11月15日）
胡宗南进攻定边盐池及我军之部署……266
（1936年11月17日）
复徐向前等电……268
（1936年11月18日）

致朱德、张国焘电……269
（1936年11月18日）
朱瑞支队的作战部署……270
（1936年11月18日）
决战动员令……271
（1936年11月18日）
先打丁德隆后打周祥初孔令恂……272
（1936年11月19日）
胡宗南部的行动及我军部署……273
（1936年11月20日）
致红军战士与苏区人民电* ……276
（1936年11月20日）
打丁德隆胜利后立即打周祥初……277
（1936年11月21日）
红军领袖贺绥远守军抗日胜利……279
（1936年11月21日）
坚决阻敌第一旅占领盐池……280
（1936年11月22日）
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中心关键……281
（1936年11月22日）
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282
（1936年11月22日）
组成南北纵队打击敌军……284
（1936年11月22日）
捉住敌军矛盾彻底击破胡宗南……286
（1936年11月23日）

致徐向前、陈昌浩电……287
（1936年11月23日）
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288
（1936年11月25日）
国内国际及红军的情况……290
（1936年11月28日）
致徐向前、陈昌浩电……291
（1936年11月28日）
对胡军勿作仇敌，应尽力争取……292
（1936年11月30日）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293
（1936年11月30日）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 ……294
（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400
（1936年12月1日）
给蒋介石的信……403
（1936年12月1日）
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 ……406
（1936年12月1日）
致彭德怀电……409
（1936年12月1日）
致刘少奇电……410
（1936年12月2日）
给冯玉祥的信……411
（1936年12月5日）

关于联合抗日救国等问题给杨虎城的信……413
（1936年12月5日）
给孙科的信……415
（1936年12月5日）
致徐向前、陈昌浩电……416
（1936年12月6日）
致徐向前、陈昌浩等电……417
（1936年12月10日）
关于国共谈判情况及我们的原则立场致张学良电……418
（1936年12月10日）
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条件等事致潘汉年电……419
（1936年12月10日）
致张学良电……420
（1936年12月12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23
（1936年12月13日）
关于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等问题致张学良电……425
（1936年12月13日）
提议东北军确占兰州汉中两战略要点……427
（1936年12月13日）
关于周恩来等拟十六日到延安致张学良电……429
（1936年12月13日）
关于日本、南京情况及我们的建议致张学良电……430
（1936年12月14日）
关于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及我方行动方针致张学良、杨虎城电……431
（1936年12月14日）

野战军应开至西峰镇……433
（1936年12月14日）
关于注意洛阳、咸阳之敌致张学良电……434
（1936年12月14日）
应奉行大的战略击破敌之要害……435
（1936年12月15日）
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436
（1936年12月15日）
关于周恩来十六日到延安请派飞机去接致张学良电……439
（1936年12月15日）
关于通过端纳活动停止南京发动内战致张学良电……440
（1936年12月15日）
关于国内外对西安事变的反应等情况致张学良电……441
（1936年12月16日）
关于发动民众反对中央军进攻致张学良、杨虎城电……442
（1936年12月16日）
关于西安事变应和平解决等事给阎锡山的信……443
（1936年12月16日）
关于请接周恩来到西安致刘鼎转张学良电……444
（1936年12月17日）
关于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龙海线等问题致张学良电……445
（1936年12月17日）
关于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447
（1936年12月19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449
（1936年12月19日）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 ……451
（1936年12月19日）
关于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致潘汉年电……455
（1936年12月19日）
关于张学良、杨虎城要坚持更有前途致周恩来电……456
（1936年12月19日）
关于争取十七路军抗日反内战问题致周恩来电……457
（1936年12月19日）
配合张学良杨虎城部消灭东来之敌……458
（1936年12月19日）
关于坚守渭南临潼西安线致周恩来电……459
（1936年12月19日）
关于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致周恩来电……460
（1936年12月20日）
关于和宋子文见面问题致周恩来电……461
（1936年12月20日）
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后方问题致周恩来电……462
（1936年12月20日）
关于同意军事计划等问题致周恩来电……463
（1936年12月20日）
给彭雪枫的信……464
（1936年12月20日）
关于共同抗日问题致王以哲转马鸿宾电……466
（1936年12月21日）
实现国内和平一致抗日的五项条件……467
（1936年12月21日）

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致周恩来电……468
（1936年12月21日）
揭破日本与何应钦派联合害蒋之阴谋……470
（1936年12月21日）
致周恩来电……471
（1936年12月22日）
给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信……472
（1936年12月22日）
给阎锡山的信……474
（1936年12月22日）
致南汉宸电……476
（1936年12月23日）
关于胡、曾、关敌南下及我军部署致周恩来电……477
（1936年12月23日）
关于时局正在变化中张、杨不会久处孤立致周恩来电……478
(1936年12月23日)
致阎锡山、赵戴文……479
（1936年12月23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480
（1936年12月24日）
关于坚守固原等处及罗炳辉等均为配合东北军作战之部队致王以哲电…481
（1936年12月24日）
关于东北军、西北军以西安为中心建立后方致周恩来电……482
（1936年12月25日）
对张学良杨虎城击破东敌部署的提议……483
（1936年12月25日）

关于争取陈诚、朱绍良、邵力子诸人致周恩来电……485
（1936年12月25日）
关于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之自由致彭德怀、任弼时电……486
（1936年12月25日）
和军委电台部分同志的谈话……487
（1936年12月25日）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488
（1936年12月2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89
（1936年12月27日）
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 ……491
（1936年12月27日）
给韩复榘的信……493
（1936年12月27日）
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494
（1936年12月27日）
与教堂订立的协定……495
（1936年12月28日）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496
（1936年12月28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500
（1936年12月31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501
（1936年12月31日）

# 给高桂滋[1]的信

（1936年夏）

培五师长阁下：

马志明同志回，述阁下赞同敝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之提议，甚感甚感。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其联之者，为民族革命增义旗也。其攻之者，谓其是真正之汉奸卖国贼，为四万万同胞诛妖孽也。阁下率领之数千健儿，与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役，复与于四年前抗日之役，光荣历史，国人同佩。与红军为敌，谅出于卖国贼首蒋介石之驱迫，转旆击贼，则前事消忘。从此抗日讨卖国贼之革命联合战线上，有广大民众，有红军，复有阁下之义师，无疑将更有无数之义师续续涌出于炎黄华胄之域，出中国于危亡，实为此之是赖。为使猜疑去之务尽，诚信孚于金石，就阁下对马同志所示及敝方所见，列为数条，借求明察：

（一）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

（二）抗日讨卖国贼大计，从长计议，务出尽善，并使贵军处于

---

[1] 高桂滋（1891—1959），字培五，陕西定边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

安全地位，有任何卖国贼加贵军以危害者，敝方愿以实力共击之。

（三）在贵军尚未至能取公开行动之时机，敝方愿将双方关系及一切信使往还保守绝对秘密。

（四）贵军未至公开行动之时机，当敝方攻击卖国贼军队（如井岳秀[1]）时，务望采取消极态度，即对敝方之敌不作任何援助举动。

（五）清涧贵部粮秣柴火，既属友军，自当尽力接济。但请阁下对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药、布匹等）亦量为接济。

（六）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

（七）互相建立最机密之通讯联络（交换密码）。

（八）保证双方代表及来往人员之安全。

以上各项，不论阁下所能同意者为全部或一部，敝方均愿与阁下开始实际之谈判。当此国亡无日关头，鄙人等决不因小节而忘大难。区区救国之诚，谅蒙贤者深察。抑更有进者，居今日而言，抗日讨卖国贼，非有广大之联合战线不为功，此不但在国内者为然，即在国际者亦然。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阁下曷尽力图之乎？其在国际则联合一切与日本为敌之国家与民族，实为抗日讨卖国贼重要纲领之一，远者姑勿具论，近在西北，则有伟大强立之苏维埃联邦。是国也，有与我共同反侵略目标，有援助中国反帝运动之深长历史，引以为友，实无损而有益，鄙人等当尽力以图之。附上敝党中央之政治决议及文告多种，借供参考。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儒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

---

[1] 井岳秀（1879—1936），陕西蒲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师长。

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专此。

顺颂

勋祺

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彭德怀

#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7月）

接占包座捷电，无比欣慰。红四方面军在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

[1] 红四方面军经过艰苦跋涉，第三次通过了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包座地区。是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告诉他们收到攻占包座的电报。这是电报的部分内容。

# 目前西方野战军以休养生息为主[1]

（1936年8月1日）

德怀同志：

目前情况下，野战军似宜以休养生息为主，如无充分有利的作战条件，不妨以八月全月为训练时间。从政治的军事的党的各方面进行有计划的教育，务达到一定的进度。一面派出人员从陕甘宁全省进行扩红，后方医院进行治疗改善，以便在八月增加兵员。团以上高级干部宜有特别的教育计划，为将来计，高级干部教育占了特别重要地位。高级教育内容主要的是学习政治。以上意见如得到你的同意，就请你召集团以上干部大会宣布执行。如果我们在八月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成绩，到九月纪念[2]二、四方面军南北夹击夺取陕甘大道的战斗，就将更有力量地进行了。如何盼复。

泽东

一号十时半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纪念”二字似为“配合”之误。

# 甘南敌情与红二、四方面军的行动意见[1]

（1936年8月1日）

朱、张、任同志：

（甲）接占包座[2]捷电，无任欣慰。

（乙）王均[3]正在陕南集中部队，两星期内可达甘南布防，其配置：一部将向天水、秦安、甘谷[4]，接毛炳文[5]之防；一部似将向文、武、成、康、西、礼、武、固[6]各县。该部为第三军，仍辖第七师、第十二师各六个团。毛炳文之第二十四师由秦安、天水、甘谷移陇西；第八师原在定西，该部两师共十团，任务为保卫兰州。鲁大昌[7]似在岷州[8]，该部虽有六团，但战力甚弱，其第一、第五、第六团曾被我消灭大半。王耀武[9]在汉中，接王均防。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

[2] 包座，有上包座、下包座之分，上包座即今达戒，下包座即今包座，又名俄苦塘，位于四川省若尔盖县东部、包座河东岸。

[3] 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

[4] 天水、秦安、甘谷，均为甘肃属县。

[5] 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

[6] 文、武、成、康、西、礼、武、固，指文县、武都、成县、康县、西和、礼县、武山、西固（今舟曲），均为甘肃属县。

[7] 鲁大昌，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

[8] 岷州，即甘肃省岷县。

[9] 王耀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师师长。

（丙）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1]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望酌。

（丁）包座到哈达铺五百里，有险隘五、六处，主要是瓦藏寺、莫牙寺[2]间二十五里路上之两座河桥，及罗达[3]西边六十里之腊子口[4]山隘。宜选精锐二千余人，以机敏坚毅之首长率领向前开路。最好除此路外，再在西边选一条，直达岷州附近之路，分两路北进较为妥当。腊子口以北即脱离番区[5]，地势宽敞，人烟稠密，便于部队之休息、整理。

毛　周　彭

---

[1] 哈达铺，位于甘肃省宕昌县西北部。

[2] 瓦藏寺、莫牙寺，即今旺藏寺、麻牙寺，均属甘肃省迭部县。

[3] 罗达，即今洛大，位于甘肃省迭部县东部，邻近舟曲、宕县。

[4] 腊子口，位于甘肃省迭部县东北部。

[5] 番区，指少数民族居住区。

# 关于红军各部指挥权的通令[1]

（1936年8月1日）

命令红军大学及总政治部直属毛泽东指挥，所有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各直属独立部队，各省军事部，军委各部门，后方各机关，统归周恩来指挥。任命抗日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兼保安城卫戍司令。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签署的通令。

# 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1]

（1936年8月3日）

接八月一日电[2]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经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2] 朱德、张国焘、任弼时8月1日致电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我二、四方面军此次向包座、巴西、阿西前进便利，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约8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以消灭毛炳文、于学忠为目的，来配合你军。在蒋敌进攻的严重关头，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在积极密切关系和一致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不致受敌各个击破，可能造成西北新局面。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3个方面军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好了一切，为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

# 为出版《长征记》征稿[1]

（1936年8月5日）

## 一

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 二

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

---

[1] 这是毛泽东和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征稿，发给各部队的电报和给参加长征同志的信。《长征记》后来在延安出版。

# 目前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1]

（1936年8月9日）

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

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中。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关于目前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致张学良电的主要内容。

# 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1]

（1936年8月10日）

## 一

蒋介石依靠日本、出卖投降的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有所改变，而战术的改变有可能影响其战略的动摇。两广事变虽然遭到挫折，但它使蒋介石内部裂痕加深。蒋介石过去让出东三省，镇压群众，不同我们往来。现在改变了，也说统一战线、国防政府，要同我们往来，这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日本的退让，以巩固他的统治。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要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创造西北国防政府，红军与东北军正在协商中，两方面都要做艰苦的努力，在东北要加强政治工作，在地方应加紧巩固工作。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对于打通苏联，保卫苏区，统一红军领导，都有很大的意义，应极力地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并使他们完全在中央领导之下。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会议上所作结论的一部分。

## 二

民众抗日已经冲破蒋介石的压迫，但是还没有冲破蒋介石的最高界限，即还没有实现民主。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我们则要求他先给抗日的民主。“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党的独立性。

# 致章乃器等及全体救国会会员函

（1936年8月10日）

乃器、行知、韬奋、钧儒诸先生及全国救国联合会全体会员们!

不久以前，我们在报纸上读到了章、沈、陶、邹四先生所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和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宣言和纲领。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向你们和全国人们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纲领与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你们说："我们所希望的，中国共产党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因此，在红军方面，应当立刻停止攻袭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对富农、地主、商人，应当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内，应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这样，救亡联合各党战线的开展，才不至受到阻碍。"

真的，我们应当这样做，而且已经是这样做。我们在自己的行动上，经常是忠实于自己的提议和政治路线。在九一八事变开始后，我们首先向全国一切党派提出，愿意合作抗日。有些人说，我

们的提议只是宣传的作用，而在实际上并不愿意实行这些提议，但是，几年来的事变证明这样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诬蔑。我们曾与十九路军和福建政府合作。不久以前，当西南派首领发表通电表示抗日的时候，我们宣言同意他们的抗日主张，同时我们向西南派的军政领袖和一切党派与社会团体发表了合作抗日的提议，并郑重声明：我们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事实上诚恳希望一致联合，共同斗争以挽救祖国的生命。一年多以来我们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实现我们北上抗日的目的。虽然我们已经到了北方，可是我们想集中河北实行首先直接抗日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今年春季，我们在渡过黄河以后，如果没有驻扎在同蒲路一带十万以上的中央军的封锁与阻挡，是无疑可以实现我们的愿望的。当时若是我们集中力量来冲破封锁线当然可以做到，但是，这样必然使双方受到很大的牺牲，我们为了避免无价值的内战损失，所以暂时渡河回转陕西。在回军以后，不管对我们继续“围剿”，我们再一次地向南京政府、太原阎锡山将军、河北宋哲元将军表示愿意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河北，进行抗日，并要求他们的同意。虽然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满意的回答，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放弃我们所始终坚决主张的抗日救国的目的。在民族存亡千钧一发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继续任何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无论何时也不会进攻南京中央军或其他军队，如果他们不向我们进攻，不阻碍中国军队抗日斗争的话。如果南京中央军或其他军队实行抗日，不压迫群众爱国运动，我们准备以自己的一切力量，诚恳地帮助他们。我们愿意与任何军队、任何政党、任何派别合作，只要他们赞成准许反日、反卖国贼和爱国运动的完全自由。

有人怀疑，现在红军的力量很难单独抗日。又有人说，抗日的

先决条件，是民族统一和内部和平。还有人说，部分的抗战是有害的。但是我们不这样想。我们东北抗日义勇军能够进行继续英勇的抗日斗争。敌人的报纸都承认东北义勇军已使敌人损失“十万以上的生命和几万万的金钱”，并使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很快地侵入中国的内地。虽然他们还未取得彻底的胜利，可是对于国家民族已有了巨大的功劳与帮助。现在没有任何人能说东北义勇军不能单独抗日了。我们红军在一切方面都不比东北义勇军薄弱，而北方人民的爱国热情亦不落后于东北人民。如果不是想混乱人民耳目的话，那么就没有根据说红军不能单独抗日。上海抗战和长城抗战失败的原因，只是因为当时领导者的动摇不坚定，没有运用紧张的运动战术，没有充分广泛地与人民合作，然而，中国红军是没有这些弱点的，所以我们认为红军能够单独抗日，并不会轻受挫折而能持久抵抗。虽然红军不能期待以现有的力量，达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无论如何，是能单独抗日的。并且在红军继续抗日的过程中，必然能够统一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力量来达到最后的胜利。

如果说，要统一全国力量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说要先统一，然后抗日，这是不正确的。应当记得，部分的力量，已能实行抵抗；应当记得，在没有开始抵抗运动的地方，敌人决不让我们集中力量。敌人已经严密监视着南京中央和地方政府，并一省又一省地侵占了我们的土地。在这样情形之下，只有在开始抵抗的时候，才有全国总动员的可能。实行抵抗与全国总动员应当同时开始的。在“和平”状况之下，很难有全国总动员之可能。

你们要求一切爱国运动的自由，而敌人必然马上用武装来压迫爱国运动，很明显地，战争就不可免了。现在情况日益危急，如果

不立刻开始抗日战争，全国统一自卫与全国总动员必然益加困难，如果坐失时机，甚至将无统一自卫与总动员的可能。就在今日，全国总动员已经不能包括东北和北方的一部分区域了。这样继续下去，敌人可以组织更多的汉奸军队，可以宰割中国更大的区域，可以夺取一切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那时，我们的总动员将只能在很小一部分的领土上与乡村区域中实行。难道现在还可以用统一未成、准备不足等借口来延迟对日抵抗吗？

我们不反对真正的准备，可是我们反对借准备之名，行不抵抗之实。任何抵抗斗争，决不会阻碍准备与总动员的工作。任何抵抗的本身就是极大的动员，上海与长城抗战的经验便是最好的证明。

在敌人监视之下进行秘密准备工作，须花费几年时间所达到的成绩，也许在抗战开始以后，只要几个星期就能达到。而且秘密准备所培养的力量，决不能补偿同时间损失的力量，更不能达到敌人在同一时间所可聚集与准备的力量。

有人说我们的单独抵抗，破坏了他们的抗日总计划。我们无从知道他们所谓“抗日总计划”是什么。我们所要求的，只是落后的人迅速赶上我们，还未准备抗战的军政首领和党派立刻和我们一块进行抗日斗争。没有任何根据来要求我们拒绝抗日政策，停止抗日行动来适合这些“批评家”的纲领和行动。

对日抗战将是长期残酷的战争，不经过千百次的苦战是不会取得最后胜利的。在长期苦斗的当中必然可以动员与集中全国的一切力量，而决不能把抗日战争延迟到动员与集中完成以后。

因此，我们要求立刻开始对日抗战，首先把红军集中河北，使红军能最先开始对日抗战，我们反对利用任何借口延缓和避免对日抵抗。竭诚希望你们帮助实行这些要求。

为了集中国力去对日抗战，我们在各方面改善了苏维埃法律与工作。除了把工农政府、工农红军改成人民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红军外，在苏维埃选举法上，补充了一切小资产阶级职员、自由职业者、专门家和小商人与小企业主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宣布在苏维埃区域内一切政党、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均享有公民权。欢迎一切愿意共同抗日的党派、社会团体的代表参加苏维埃政府，共同担负责任。我们已经通过决议不没收富农的土地，如果他们愿意和我们共同抗日的话，我们并不拒绝与他们联合。不没收大小工商业者的财产与工厂，并保护他们的企业，帮助他们发展，以增加苏区抗日运动所必需的物质供给。不没收积极抗日的军官与地主的土地和财产，邀请一切失业军官、兵士、职员、专门家到苏区来，并给予他们以适当工作，使他们能发挥自己的才干。特定办法优待俘虏的军官和兵士，愿意归家的，发给路费；愿意留在苏区共同抗日的，便给予工作。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征收不重的统一累进税。

这就是在我们苏区通过的和施行的政纲。我们决不敌视民族中反日的阶级。红军将来进入抗日友军的区域，在友军遵守协定之下，红军同意遵守友军所规定的法令与规律，并不干涉友军区域的地方行政。关于劳资关系问题，规定了改良工人生活最低条件，按照每个企业的实际情形，订立劳资协定，劳资双方必须遵守，并避免不必要的罢工、怠工。过去监督生产、工人领导工厂的法律，已经取消了。劝告工人不提出超过本企业能力的要求。在非苏维埃区域，我们主张必须改善工人生活，但希望不加深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我们相信争取海关自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对于工人和资本家都有利益的。相反的，在帝国主义继续进攻之下，无论工人还是资本家，都不能期待自己情形改善。劳资的共同利益，是建立在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之上的。

至于现在河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及其他区域的游击队，还未能执行我们在最近所通过的法律，这是由于有许多的阻碍，使他们不能得到我们的指令。此外，残酷屠杀的围剿是可以激起某些报复的手段，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行动是错误的。我们肯定希望立刻改正这些游击队的错误。可惜得很，我们还不能马上执行这些条件，因为决定的力量不在我们。我们认为红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无条件地尊重并实行全国人民所表示的批评、意见与要求。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问题，我们愿意服从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民民主的决议。

当然，我们的党员应当参加各地方的救国组织和各种形式的救国运动。我们愿意牺牲一切力量来拥护这些运动与组织，以便与一切党派和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民共同斗争，挽救中国人民的危亡。我们的党员，无条件地服从这些组织大多数所通过的规则、纲领和决议。同样，在实际工作上，甚至当我们在原则上不同意的时候，也无条件地服从大多数的意见，我们的党员不会与这些组织中的其他派别对立和竞争来争夺群众与领导权。相反地，我们愿意拥护任何派别的彻底反日的领袖，使他们能毫无阻碍地在群众中发挥自己的能力。我们的党员愿意在他们领导之下工作。为了达到战胜强大敌人的目的，不仅需要我们自己的发展与胜利，而且需要一切联合力量的胜利与发展。我们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各政党各阶级在抗日救国旗帜之下团结起来”。因此我们认为在统一战线中提出推翻某一阶级和某一政党的口号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应有不少的领袖、党员、官吏能够抗日的，我们完全愿意与他们联合。因此，一般地反对国民党和各地政府是不适宜的。我们不同意

并且反对宗派主义、包办把持操纵等方式以及现在有些青年分子在实际上采用的强迫群众参加救国运动的方法。

最后，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一切党派了解抗日救国的任务，改变敌视我们的态度。关于其他问题的意见，都是不重要的。可是有人重视其他问题的许多意见，因此，就产生许多冲突和矛盾。我们完全愿意改变这些缺点。如果我们的党员在救国运动中犯了这样的错误，就希望其他党派的领袖和青年，本着救国热忱，互相劝勉。我们相信，如果为了抗日救国的必需，排除一切相互的敌意，互相忍耐，互相尊重，那么全民统一战线就可胜利完成，并可保证广泛光明的前途。依靠着统一战线力量发展的程度，不只是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而且经过统一战线运动的一定阶段可以使中华民族脱离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并达到全中国的真正民主的统一。因此，我们认为统一战线决不是一个很短的暂时的现象。当然，在统一战线的各个阶段上可以有个别的人发生动摇，叛变与逃走，但是这决不能认为是统一战线的破裂。

现在统一战线比之一九二七年还有更明白的前提和更巩固的基础，因为现在民族危机比之一九二七年百倍地加深。一九二七年的统一战线主要是反对内部敌人（反对北洋军阀），现在统一战线是反对外部敌人。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脱离统一战线的人们，还能组织半独立式的政府。而在现在，哪一个要脱离统一战线或者不参加统一战线，他再也不能建立半独立式的政府，并不能在中国人民各阶层中找到拥护。并且，一九二七年的经验，对于任何阶级都不能机械地运用。因为现在国际的与国内的形势，比之一九二七年已有了急剧的改变，而有利于全民统一战线。所以我们对于现在统一战线的前途毫不悲观，这里没有任何可以悲观的根据。我们为了统一

战线的事业，不害怕被其他党派利用，因为我们有考虑过坚决抗日纲领。我们愿意与一切抗日讨贼的政派组织合作到底。

但是，现在最危险的是有些人幻想实现武力统一的计划。很明显的，武力统一就是不断的内战。如果我们回忆袁世凯及其他军阀武力统一计划的失败，就可以知道这些人的前途是如何的黑暗。而在现在条件之下，在任何方面，武力政策危害中华民族的程度，都远超过于当时。不幸有些人对于这样的政策，还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还有人企图以另一“集中战线”来对立和破坏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这就是统一战线不能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你们说过去的争论是在于抗日斗争的方法和“安内”“攘外”的先后。我们觉得，这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是有些人在民族叛徒与民族英雄之间动摇，在抵抗与投降之间选择道路。我们不相信那些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安内”政策造成怎样的结果，但是，为什么还这样坚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呢？我们不反对统一，我们反对的是国内战争与民族叛徒。我们认为今天中国只有一个出路，就是一切党派在平等基础上团结起来，实行抗日，并服从全国人民的民主政治。如果不走这一条道路，而想用武力统一，那就永远不会有中国人民的统一，只有更加使中国分裂和破坏。仅就这一原因，我们就反对这样的企图。我们拥护在平等基础上的联合抗日与民主的方法来统一中国。我们愿意服从真正代表全中国人民的任何全国大会的决议，并主张把一切问题提到这样的大会去解决。并且我们同意把是否应当在全中国施行苏维埃制度的问题让全国人民实行民主地解决。

但是我们应当声明，南京政府在今年五月五日所公布的宪法草案和国民会议的组织条例和选举条例，我们认为是完全反民主的。

我们不承认根据这些法律所选举的国民会议有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权利，我们不能参加这样国民会议的选举，我们与全国人民都不应服从这样“国民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我们认为这一“国民会议”的存在是有害的。但是我们同意参加任何真正合于民主原则所创立的人民代表机关。

最后，我们希望你们和各地一切救国组织派遣代表来参加苏维埃政府，我们希望你们介绍其他政党派别的代表来与我们进行合作的谈判。一切愿意与我们进行谈判的代表，都请直来苏区，保证不会有任何的危险。如果在苏区外任何区域也保证我们的代表不受危险的话，我们愿意派代表到其他区域去进行谈判。

我们诚意地愿意在全国联合救国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

此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

# 致刘鼎电[1]

（1936年8月11日）

红二、四方面军即出岷州、陇西之线打毛炳文，速乘此机调固原两师入兰州，我一方面军可不打固原。望派飞机到肤施接潘汉年，以便快晤张学良。

[1] 这是毛泽东致刘鼎电的主要内容。

# 广泛宣传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胜利[1]

（1936年8月11日）

彭，林，叶，左、聂，徐、程，宋、宋，李，阎、蔡，谢、刘，戴，郭，钟[2]：

我二、四方面军前锋已抵哈达铺[3]及西固[4]附近，西岷大道[5]被我切断，毛炳文王均鲁大昌[6]惊慌异常，我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势已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的电报。

[2]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叶，指叶剑英，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左、聂，指左权、聂荣臻，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徐、程，指徐海东、程子华，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宋、宋，指宋时轮、宋任穷，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李，指李夫克（李富开），当时任第一作战区参谋长。阎、蔡，指阎红彦、蔡树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三十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兼第二作战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谢、刘，指谢嵩、刘幼安（刘伯安），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和政治部主任。戴，指戴季英，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动员武装部部长。郭，指郭宝珊，当时任红军第三作战区总指挥。钟，指钟赤兵，当时任中共陕北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第六作战区部长。

[3] 哈达铺，镇名，位于今甘肃省宕昌县西北。

[4] 西固，旧县名，即今甘肃省宕昌县。

[5] 西岷大道，指甘肃西固（今宕昌）到岷县的公路。

[6] 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鲁大昌，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新编第十四师师长。

成。这一空前的伟大胜利，将兴奋着全苏区全中国的广大群众和同情我们的武装部队，将震惊着我们的敌人。望即根据上次军委总政的电令[1]，分别在部队中、地方群众中广大宣传，并以扩大部队，训练部队，培养干部，争取胜利，巩固苏区，争取白军，联合苏蒙，共同抗日，保卫西北，庆祝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胜利，庆祝三个方面军大会合等为中心口号，来作庆祝胜利的动员。

毛

十一号

[1] 指1936年8月3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总政治部发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的电报。该电通报了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情况，号召全军准备热烈欢迎3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发展西北抗日的新局面。

# 关于今后战略方针致朱、张、任电[1]

（1936年8月12日）

朱、张、任同志：

关于今后战略方针有如下的建议：

（1）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2]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2）根据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甲军与我们联盟，日本指挥蒙伪军进攻绥远、内蒙，企图割断中苏关系及蒋介石注意西南、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上述任务可能而且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实行之。

（3）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步骤为：

甲、二、四方面军尽可能的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两岸之一段，候部队相当整理后，即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相机消灭之，目的在威胁兰州，以便甲军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林育英（张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凯丰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

[2] 指东北军。

李忠[1]部三个师全部集中于兰州为战略枢纽，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马步芳家乡，目的一在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步芳[2]兵力之东援，以便甲军派出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落于甲军之手；一在消灭青马[3]一部促其与我讲和，李毅[4]现有代表在青马处，以上是李毅与我商定之计划。此外，再派较小一部拒止王均于西礼之线并派员与王进行外交，同时也对毛炳文进行外交，彼等均在极危惧中，外交成功有大的可能。上述计划大概以一个半月时间实现之。在此期间二、四方面军努力解决人员补充与被服补充两问题，以免进到甘北较贫苦区域发生若干困难。

乙、完成上述任务之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约在十月到十一月实现之。

丙、十二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任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甲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

（4）巩固内部的计划如下：

甲、陕北、甘北、宁夏新老苏区之巩固及三个方面军之扩大与巩固，使之成为西北局面之坚强的领导中枢。

乙、甲军政治上的改造与军事上的立于不败之地。

丙、陕、甘、青三省各部统一战线的完成，三省反动分子肃清，三省民主纲领之初步实现。

丁、以上步骤的实现，使得西北局面政治上军事上均置于巩固

---

[1] 指于学忠。

[2] 指马步芳。

[3] 指青海马步芳。

[4] 即张学良。

的地位，一方面足以防御蒋介石在西南问题解决后转向西北之可能的进攻，足以防御日本向宁夏进攻而打断其隔离中苏关系之企图；另一方面，作为出兵绥远之准备，并准备使陕、甘、宁、青四省抗日革命化转向进一步的发展阶段。

（5）甲乙两军[1]各出一部合组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实行抵御德王[2]与李守信蒙伪军之进攻，用此行动号召全国抗日运动，使之进到更高的阶段。

（6）所有以上各个步骤，都是为着形成并巩固西北国防政府，用此国防政府去推动全国统一战线，造成全国国防政府的基础。

（7）甲乙两军苏维埃政府与国防政府对于南京的策略，适用统一战线的一般原则：

甲、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

乙、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号召，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目前不出河南，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

丙、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

丁、防御时用反对卖国贼捣乱抗日后方口号，进攻时用反对卖国贼拦阻抗日去路口号，但不论何时，均取一面作战一面讲和政策。

---

[1] 指东北军与红军。

[2] 即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

戊、向白军进行统一战线，注重其上级官长。

己、一切统一战线的谈判，以忠诚态度出之。

庚、所有以上对南京的策略，都是为着分化南京，揭破其欺骗，孤立其首领，争取其群众，排斥其汉奸部分，而推动其爱国部分，使之走向真正抗日救亡的道路。同时又影响南京以外各派，便利我们进行统一战线的谈判，求得党在全国活动的便利，求得人民爱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并求得创造西北局面的便利。

辛、不可忘记对于真正敌人之革命的警觉性。

（8）以上意见请三兄考虑电复。

洛　育　恩　博　稼　怀　凯　泽

八月二十日

# 致左权、聂荣臻电[1]

（1936年8月12日）

红军大学第一、二两科拟于十月底开始上军事课；第三科过去两个月着重政治，下半期始军事政治并重；目前军事学习尚未开始，不宜调给教导营教员。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林彪致左权、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8月13日）

红一方面军八月至九月中旬仍以训练休养生息为宜，同时求部分扩红，巩固现有根据地，形成强有力的中心力量。准备九月中旬以后向西出动一步，仍以休养、训练、扩红、扩大根据地为目的，对东北军何柱国、董英斌[2]二部全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当红二、四方面军甘南任务完成，九、十月间北上时，红一方面军便以军容整壮之姿态与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固原、海原地区会合。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董英斌，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二路军第七纵队司令、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

# 对白军俘虏着重施以政治教育[1]

（1936年8月13日）

彭，刘，左、聂、朱、邓，徐、程、王，宋、宋，阎、蔡，萧，李，谢、刘，钟，郭，黄[2]：

甲、为加强统一战线的活动与争取白军工作，需要从俘获的白军官兵中施以着重的政治教育，并特别优待，以便训练出一批可以奔走各方的人材，至少可做联络交通。因此特规定：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的电报。

[2] 刘，指刘晓，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左、聂、朱、邓，指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军团长、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徐、程、王，指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宋、宋，指宋时轮、宋任穷，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阎、蔡，指阎红彦、蔡树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三十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兼第二作战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萧，指萧劲光，当时任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李，指李富春，当时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兼省委军事部政治委员。谢、刘，指谢嵩、刘幼安（刘伯安），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和政治部主任。钟，指钟赤兵，当时任中共陕北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第六作战区部长。郭，指郭宝珊，当时任红军第三作战区总指挥。黄，指黄春圃，即江华，当时任关中特区军事部部长兼第一作战区司令员。

1. 凡遇大批俘虏，必须选出一部优秀官兵施以特殊训练。

2. 各个战线上的零星俘虏和投诚的应全部留下训练，概不立即放回。

3. 训练机关，以一部留前方各政治部训练，一部送后方总政治部抗日战线部。

4. 训练内容着重讲统一战线、白军工作。

5. 训练好后应即派出做白军工作，并着重上层活动与军官来往。

乙、为适应目前工作开展，望分别将两马、何、董、沈、王[1]及两高、汤、杨[2]各部俘虏和投诚官兵现留在前方各政治部者，一律送来军委训练。

毛　周　杨

十二日二十四时半

---

[1] 两马，指马鸿逵、马鸿宾。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新编第七师师长。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五师师长。何，指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骑兵军军长。董，指董英斌，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五十七军军长。沈，指沈克，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沈克纵队司令兼第一〇六师师长。王，指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六十七军军长。

[2] 两高，指高桂滋、高双成。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第八十四师师长和第八十六师师长。汤，指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杨，指杨虎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 攻占岷州战略上十分有利[1]

（1936年8月13日）

朱、张、任同志：

如能攻占岷州[2]城，则打马[3]打毛[4]打王[5]均十分有利，战略上大占优胜。万一攻不开，则围城打援。毛炳文现正以一部从陇西增援，是消灭他的好机会。朱总司令宜速派人去见王均曾万钟[6]，彼等孤危，不难收效。城内鲁大昌[7]亦宜派人，允许放他向临潭跑。如何，望酌。

毛　周　彭

十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

[2] 岷州，即甘肃岷县。

[3] 马，指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代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新编第二军军长。

[4] 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

[5] 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

[6] 曾万钟，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第七师师长。

[7] 鲁大昌，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新编第十四师师长。

# 给杜斌丞[1]的信

（1936年8月13日）

斌丞先生左右：

仲节君回，盛称德意，并聆抗日救国宏论，无任钦迟。值此国难日亟，国贼猖狂，大好河山，危险万状。伪蒙军向绥远进攻，冀察政委会[2]质量之改组，凡此种种，愈见日寇之变本加厉。弟等一再呼吁，要求全国不分党派，一致团结御侮。一年以来成效渐著。虎臣[3]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

---

[1] 杜斌丞（1888—1947），陕西米脂人，爱国民主人士。曾任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总参议，对促成杨虎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过积极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1947年在西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2] 冀察政委会，即“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而设立的政权机构。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在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山西、山东、绥远）建立脱离国民党政府的特殊区域来达到并吞华北的目的。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在相继签订丧失河北、察哈尔两省主权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之后，又于同年12月指派宋哲元等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3] 虎臣，即杨虎城。

勉之。特派张同志[1]专谒崇阶，敬祈指示一切。云山在望，延企为劳，诸惟心照，不尽。即颂

日绥

毛泽东　手启

八月十三日

[1] 指张文彬（1910—1944），湖南平江人，当时是红军派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后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1944年在国民党监狱中牺牲。

# 给杨虎城的信

（1936年8月13日）

虎臣先生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国，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1]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2]，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

---

[1] 张文彬（1910—1944），湖南平江人，当时是红军准备派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

[2] 肤，指肤施，即延安。洛，指洛川。

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敬颂
公祺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 给王世英的信[1]

（1936年8月14日）

必须向宋哲元及国民党军二十九军继续做工作。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2]六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

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

---

[1] 这是毛泽东致王世英并转刘少奇信的主要内容。王世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部部长。刘少奇，当时为中共中央派驻华北局的代表。

[2] 商震，当时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

# 给宋哲元的信

（1936年8月14日）

明轩主席先生勋鉴：

刘子青[1]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2]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3]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

---

[1] 刘子青，当时是宋哲元派来与中国共产党联络的代表。

[2] 德王，即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1966），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人，蒙古王公。1936年5月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德王任总裁，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

[3] 冀察政委会，即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于1935年12月在北平设立的政权机构。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贻误。兹遣张金吾[1]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同志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鲁韩绥傅晋阎[2]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专此。即请

勋祺

弟　毛泽东拜启

八月十四日

[1] 张金吾，即张经武（1906—1971），湖南酃县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华北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

[2] 鲁韩，指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绥傅，指当时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晋阎，指当时国民党政府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

# 给宋子文[1]的信

（1936年8月14日）

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2]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

公绥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

[1] 宋子文（1894—1971），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国民党英美派代表，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

[2] 董健吾（1892—1970），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公开身份是牧师，在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

# 给傅作义[1]的信

（1936年8月14日）

作义先生主席勋鉴：

涿州之战[2]，久耳英名，况处比邻，实深驰系。迩者李守信卓什海[3]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4]，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

---

[1] 傅作义（1895—1974），山西临猗人，当时任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这时他正指挥部队抗击日本侵略军和伪蒙军对绥远（现属内蒙古自治区）的进攻。

[2] 涿州之战，指1927年10月至1928年1月晋军傅作义部和奉系军阀部队之间在河北涿州进行的攻守战。在奉军的猛烈围攻下，傅部孤军坚守涿州城3个月。

[3] 李守信（1892—1970），内蒙古赤峰市人，当时任伪蒙古军政府参谋部部长、伪蒙古军第一军军长。卓什海，即卓特巴扎普（1873—?），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人，当时任伪蒙古军副司令。

[4] 溥仪，即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清朝末代皇帝，辛亥革命后退位，1932年任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

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专此。敬颂

勋祺

毛泽东拜启

八月十四日

# 给易礼容[1]的信

（1936年8月14日）

韵珊兄：

还是在五年之前，从文亮[2]口中得知吾兄尚未忘记故人，那时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你，不知寄到你手否？近有人来，知兄从事群众工作并露合作之意，我听了非常欢喜。现在局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合作无以抗日，统一战线之能得全国拥护，可知趋势之所在了。兄之苦衷，弟所尽知。然今非昔比，救国自救只有真诚地转向抗日革命工作，这个意见不知能得兄之完全赞成否？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如有进一步办法，希望能建立秘密联系，可以时常通信。李鹤鸣王会悟[3]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闻兄之周围有许多从前老同事，甚为怀念他们，希并致意。希望你们能发展一个

---

[1] 易礼容（1898—1997），乳名闰三，有时写成韵珊，湖南湘潭人。早年加入新民学会，曾与毛泽东等一起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并任经理。1936年在上海国民党控制的工会中工作。

[2] 文亮，即许文亮，易礼容的内弟。1923年以前曾在长沙文化书社工作。1931年去江西苏区，不久牺牲。

[3] 李鹤鸣，即李达，当时是北平大学教授。王会悟，当时在北平中国大学工作。

有益于国有益于民的集体力量。

文煊[1]还在你身边否？她好否？一同致意。弟躯体如故，精神较前更好，十年磨炼，尚堪告慰。临书仓卒，不尽欲言。敬祝
健康

杨子任[2]
八月十四日

[1] 文煊，即许文煊，易礼容的夫人。早年加入新民学会，曾在长沙文化书社当会计。

[2] 杨子任，即毛泽东。

# 关于筹款的训令[1]

（1936年8月18日）

根据最近中央对于土地政策的新决定，对于地主，只要他不反对抗日红军，应避免用没收办法，而以捐募的方法使其尽量拿出金钱、粮食和物品，宁可少没收一家，不可错没收一家。在筹款中，必须注意经济政策，没收地主的商店固然不对，没收一般的商店尤不容许。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给商人以适当的保护。在不损害商业的条件下，向富商作深入的救国宣传，进行募捐运动，筹得抗日经费。

[1] 这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联名发布的关于筹款的训令。

# 改哥老会为江湖抗日救国会[1]

（1936年8月19日）

我们对哥老会以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其大多数到抗日战线上来；不应勉强使回人哥老会加入汉人哥老会，也不应勉强将他们合并，必须坚持回人事情由回人自己处理的原则。

[1] 这是毛泽东和杨尚昆关于改哥老会为江湖抗日救国会问题致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政治部主任刘晓电的主要内容。

# 致周昆、袁国平电[1]

（1936年8月22日）

红校第三科游击连应暂勿毕业，继续学习至明年一月一日与三科其它连队同学同时毕业。一、二两科因学习内容较多，毕业时间延至明年二月一日，每日上课时间改为四小时，各课进度加快，学习军事时间应提前。全国图书目录望交人带来，应买之战略、战役、战术书籍请先电告。

[1] 这是毛泽东和林彪致红军学校校务部长周昆、训练部长袁国平电的主要内容。

# 征询对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作战部署的意见[1]

（1936年8月22日）

彭：

下列各点请在今明两日考虑见复。

1. 据调查宁二马[2]共有步兵二十个团、骑兵八个团。这个数目属实否。

2. 黄河结冰期究有三个月，还是两个月。

3. 假如以四方面军待机独立攻青海，一方面军独立攻宁夏，而以二方面军位于中央（例如在岷州[3]、静宁、天水地区）钳制敌人，策应两方，估计能达占青宁两地之目的否，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之把握否，如果缺少把握之点在于攻城方面而不在于野战方面，则用多兵攻城与少用兵攻城是否有重大之区别。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二马，指马鸿逵、马鸿宾。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新编第七师师长。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五师师长。

[3] 岷州，即甘肃省岷县。

4. 如以二方面军位于陕甘大道附近钳制毛王何[1]敌，看一四两方面军分攻宁青之第一步作战结果，再定增加与否及向何方增加，距离与时间上来得及否。我觉得如果冰期在两月以上，则增加是来得及的。判断合于事实否。

毛

二十二日

[1] 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何，指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骑兵军军长。

#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

（1936年8月25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大鉴：

自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发表抗日救国宣言[2]以来，忽已一年多了。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创议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一致抗日的主张，虽然得到了全国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的拥护，但因贵党及贵党政府迟疑不肯采纳，致使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直到今天还未发动。而日寇则已乘虚直入，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目前，全国彷徨，不可终日，这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完全是由于贵党及贵党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掉转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

---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这封信对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当时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作了义正词严的批判，同时申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建立国共合作的政策。

[2] 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1935年8月1日发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

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挽回。为了这个原故，我们特以诚恳的态度致书于诸位先生及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之前。

读了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及蒋委员长在全会的报告之后，认为贵党二中全会对于全国人民日夜焦虑的救亡图存问题，依然没有肯定的答复，对贵党五全大会“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对外政策，并没有作彻底的改变，这对于全国爱国人民，不能不是非常失望的。

蒋委员长的报告曾经对贵党五全大会的政策给了新的解释，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中国人民始终不了解如何方可称为“和平的绝望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的最低限度。我们承认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然而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基本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因为蒋委员长在自己的报告中又认为：“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大家相信并未到达和平绝望的时期，与其说是和平绝望，反不如说是这半年来较之以前的形势，还有一线的希望。我敢说最近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因此蒋委员长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以阿比西尼亚的失败为借口，继续了自己的退让政策。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非常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的。在全国人

民看来，东北四省的沦亡，察哈尔大部的失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的猖獗，冀察政委会的傀儡化，日本大军的进驻冀察，华北经济权的丧失，泛滥全国的公开走私，民族工商业的陷于绝境，国家财政的趋于破产，海关权的破坏，华北以至西北各省日本特务机关的遍设，日、伪蒙军对于绥远的大举进攻，内蒙独立政府[2]的成立，敌机在我领空上无限制的飞行，日本浪人的横行无忌，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爱国言论遭受日寇直接间接的干涉，大批工农群众的遭受屠杀，许多爱国人民、爱国军人、爱国警察、爱国记者，甚至许多贵党的要员与贵党政府的官吏，无不遭受不堪的侮辱，守土军队的被迫撤退，青岛的告警，华南自治运动的策动等等，无一而非中国领土主权的极大损失。在全国人民看来，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华北防共协定，以及其他没有宣布的成文与不成文的协定，无一不是丧权失地的条约。因此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强盗计划，除了动员全中国的力量给以坚决的击破之外，是决不会改变的。它的侵略方式的变换，侵略方向的转移，以及所谓“经济提携”的表示，丝毫不是因为它要停

---

[1] 指1935年11月25日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由原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的傀儡政权，成立时称“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而使河北省东部的22个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

[2] 1936年1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下，蒙古上层反动分子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公开投降日本，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同年5月，在嘉卜寺（今内蒙古化德）成立伪“蒙古军政府”。

止侵略，而正是为了便利于侵略。所以如果以为冀察进兵之后，日寇一时着重于华北五省的经济侵略，而即以为和平途径有了希望，这是自欺欺人之谈。如果以为日寇的侵略会停止于黄河以北，而我们可偏安于黄河以南，也是完全的幻想。看吧，正在先生们高谈和平尚未绝望的时候，察北的日伪军又大举向绥远进攻了。绥远、宁夏、内蒙、甘肃各地遍设特务机关之后，又在这些地方建立航空总站与许多分站了。在四川强设领事馆激动了残杀爱国同胞的巨变。华北增兵之后，凶横的日军蠢蠢欲动，二十九军的防线时有小接触，华北局势日趋险恶。日寇军事考察团、经济考察团等侦察集团遍行各地，无孔不入。日寇的侦探网遍布全国，并且遍布于贵党与贵党政府的各种组织中。所有这些，只是指明日寇灭亡中国的形势是十分危急了。和平绝不可能，抗战决不可免，已经是明白无疑的事实，先生们的想法是完全错了。

贵党二中全会宣言中曾郑重申说："御侮之先决条件，乃在集中一切救国力量于中央指挥之下，齐一其步调，巩固其阵线，故御侮救国之有需于统一与纪律，实为无可动摇之铁则，而军政军令之统一，尤为完成'近代国家'组织之最低限度。"我们完全承认，为了发动全国人民的最大抵抗力量，为了取得抗战的彻底胜利，集中与统一全国的救国力量，是绝对必要的。还在九一八事变时，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即已号召全国人民与全国军队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曾向围攻苏区的所有贵党及贵党政府的武装队伍提议，立刻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华北事变之后，我们又提出了迅速组织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最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无数次地请求贵党及贵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议立即召集由全国人

民及全国愿意抗日的武装队伍选举出来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抗日救亡大计，由此大会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并坚决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成为这样的国防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担任一定的战线，并保证每一作战任务的完成。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所有这些主张，是完全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的，是救亡图存唯一正确的政策。全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要求停止内战，集中统一，以便一致抗日的了，只有日寇及其代理人，才会煽动中国的继续分裂与继续内战，因为这只能给日本强盗造成灭亡中国的条件。

然而贵党二中全会所说的“集中统一”，实在未免本末倒置。须知十年以来的内战与不统一，完全是因为贵党及贵党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误国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来一贯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在贵党及贵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进行了连年不绝的内战，举行了无数次对于苏维埃红军的围攻，不遗余力地镇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与民主运动。直至最近还是放弃东北与华北不顾，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最大敌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对苏维埃与红军，从事贵党自己营垒之间的内争，用一切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捣乱红军的抗日后方，漠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剥夺全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与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我们现在正告诸位先生：如果你们不根本改变自己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把仇恨之心放到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去，而依旧放在自己同胞身上的话，那末你们即欲勉强维持现状也是不可能的，集中统一以及所谓“现代国家”更是完全的空谈。

全国人民现在所要的是抗日救民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全国人民现在热烈要求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全国人民要求一个为他们自己谋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必须：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如果要说“现代国家”，这些纲领才是真正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中国在现时代所要求的，全国人民现在正以热烈的愿望与坚毅的决心为着实现这样的目标而斗争。而贵党及贵党政府的政策，则与此种全国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以此而求人民的信任，是决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政府与中国红军，今特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我们认为贵党二中全会所决定组织的国防会议，以及贵党与贵党政府正在召集中的国民大会，是不能完成集中统一抗日救亡的任务的。依照贵党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国防会议条例看来，则国防会议的组织只限于贵党及贵党政府当权执政的少数官员，国防会议的任务是仅充贵党政府的咨询机关，这种会议之不能有任何的成就与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是十分明显的。而诸位先生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依据贵党政府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看来，也同样的不能有什么成就与不能得

到人民的任何信任，因为这种国民大会仅仅是贵党及贵党政府少数官员们所操纵的机关，是这些官员们的附属品与装饰品，这样的国防会议与国民大会，同本党所主张的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即国防会议），中华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会，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我们认为抗日救国的国防会议，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各界各武装队伍的代表，构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权力机关，并从这一会议中产生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而国民大会也必须是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会，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有这样的国防会议与全国国会，才能是全国人民所欢迎、拥护与参加的，才能把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放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之上。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均决然无补实际，决然不为全国人民所同意。贵党及贵党政府历来所召集的各种会议之失败，就是最好的明证。

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又说："险阻之来，本可意计，断不因国事之艰虞，而自懈其应负之职责"；本党"对于国家兴亡，必当尽其心思才力，贯彻始终"。诚然，贵党是中国最大部分领土中的统治的政党，一切过去实施的政治责任不能不由贵党负担，在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之下，国民党决不能逃避其责任。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贵党违背全国民意，违背全民族利益，执行了绝对错误的政策，得到了丧失半个中国的结果，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推诿于任何别人的。然而在我们及全国人民看来，半个中国由贵党而沦亡，决不能不课督贵党以恢复领土主权的责任。同时贵党中许多有良心的分子，现在也确然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于自己党中祸党祸国分子之愤怒与不满。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情于这种新的转变，热烈地欢迎这些有爱国心的有良心的，保存着并正在激发着中华民族英雄气概的中国国民党员的志气

与觉悟，欢迎他们在民族危亡面前愿意牺牲奋斗与勇于革新的精神。我们知道在贵党中央及各省党部中，中央及各省政府中，在文化界、在科学界、在艺术界、在新闻界、在实业界、在妇女界、在宗教界、在医药界、在警察界，在各种民众团体，尤其在广大的军队、国民党的新旧党员与各级领袖中，实在有很多觉悟与爱国之士，并且这样的人还在日益增加着，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随时准备着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够在国民党中迅速形成一种支配的势力，去压倒那些不顾民族利益实际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实际成为亲日汉奸的最坏与最可耻的国民党员——那些侮辱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坚决地担负起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一道，坚决地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为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解除最大多数人民的痛苦而斗争，为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与民主政府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是坚决地赞助你们的，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诸位先生及国民党全体党员，还没有忘记上次大革命时两党合

作的光荣历史吧，因为有了这个合作，一切民族压迫者与封建压迫者都在我们面前发起抖来了！那时的民族压迫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深悉我们的合作会要进到彻底的胜利，会要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他们就挑拨离间威迫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终于挑动了合作的一方，葬送了这个第一次的统一战线。先生们清夜扪心，也应该喟然兴叹吧！现在是谁也明白，如果那时中国国民党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底，那中国就决不会有像现在这样任人宰割、沦亡及半的惨状，而决然是独立自由的中国了！现在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他们相信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们，则一定会又一次地来破坏这种合作，因为他们明显地知道这种合作会要给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向贵党政府提出的以“防共”作中心的所谓“三大原则”，就是这种预防及准备破坏国共合作的企图。但是问题是很明白的，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呢？还是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呢？现在是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一切犹豫动摇，只是国家民族的损失，只是成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诚如贵党二中全会所说：国家兴亡，贵党有责。如果贵党真正愿意担负救亡图存的责任，那末现在是要下决心的时候了，等到做了亡国奴的时候再讲什么合作那就会悔之无及了。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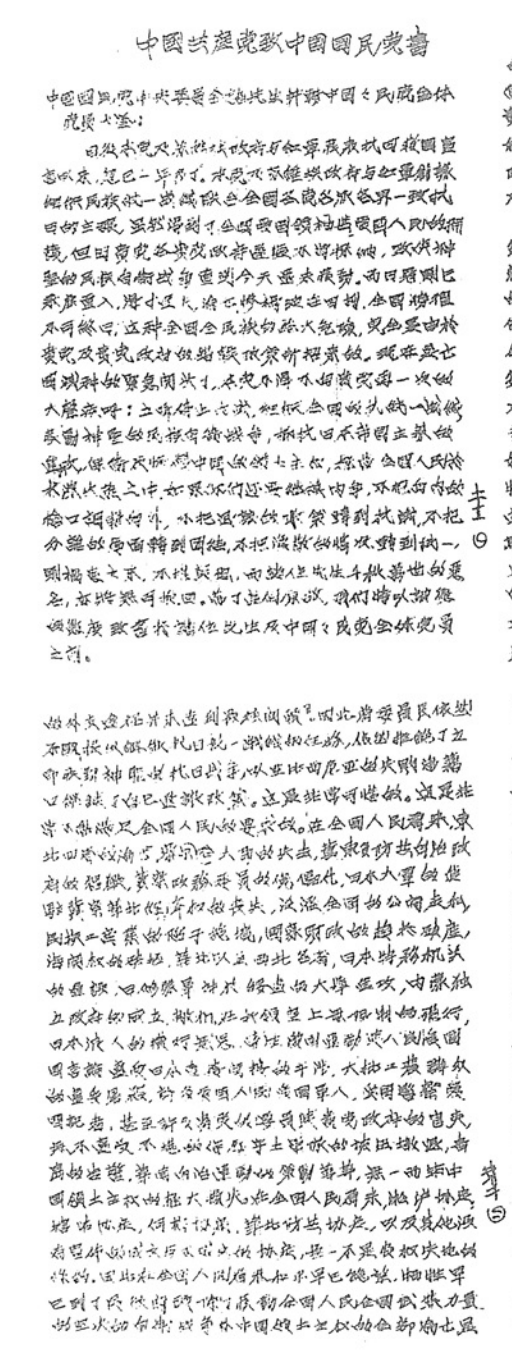
假如你们同我们的统一战线，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的话，那末，你们我们及全国人就有权利高呼：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无气节的奴才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暴力前面高喊“中国无力抗日”吧！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连那个帝国主义成分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内，统治着整个的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专此，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部分）。

# 关于向南京进一步谈判等问题致潘汉年电

（1936年8月25日）

小开兄：

甲、向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兄应于接电后七天内回到保安，受领新的方针，再以七天至十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

乙、向李毅[1]说明这种谈判的成功，对于甲乙两军合作有大的帮助，将使两军合作更加密切，而不是不利于合作，并要求李毅于外出活动时，注意督促南京与我们迅速成立谅解。

丙、对李、白[2]代表暂时抑留在西安，但不可向他作具体表示。李毅对之亦然。

丁、我们与杨虎臣谈判交通、工商问题，张文彬如到，速查其交涉程度，并请李毅向杨交涉，务在日内将肤施、洛川间交通恢复原状。

戊、张子华如尚在西安即与同来，特别注意将他手中之曾养甫亲笔信及密码带来。

己、为求迅速，要求李毅派飞机送你至肤施，要李向杨交涉保

[1] 即张学良。

[2] 即李宗仁、白崇禧。

护，以利与南京谈判。

庚、需款甚急，三万元速送来。

赵　东

八月二十五日午速复

# 致陈绍禹电[1]

（1936年8月25日）

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为着靠近苏联，为着保存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这一带布满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希望苏联方面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目前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否则，只好把三个方面军的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而这种做法，对我们非常不利，将造成许多损失。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王明）电的主要内容。

# 关于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红二、四方面军任务的训令[1]

（1936年8月25日）

在九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在甘南活动，消灭毛炳文、王均部，发展苏区，准备冬季新的行动。我西方野战军九至十一月的任务是，消灭二马部队于运动战中，在不付过大代价条件下，克服若干必要的城寨，占领海原、打拉池、同心城及其以北地区；从发动回民群众斗争之中，争取回民大量加入主力红军；发展西北苏区，保障定边、盐池、豫旺苏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作战。三十一日，西方野战军由豫旺堡南北地区向西出动，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以西、海原以东地区。九月十四日，又占领将台堡和打拉池。红二方面军于九月十一日从哈达铺附近出动，至十九日，先后攻占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地。红四方面军则在九月七日前攻占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四座县城，以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发布的关于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红二、四方面军任务的训令。

# 给林彪[1]的信

（1936年8月26日）

林彪同志：

你的信我完全同意。还有一点，就是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你所说的实际与理论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如你所说的实际与理论联系，文化工具乃是能够而且必须用了去把二者联系起来的。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如果一切课学了许多，但不算很多也不算很精，但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的基础工具了。如果你同意此意见，那我想应在二三两科，在以后的四个月中，把文化课（识字，看书，作文三门）更增加些，我意把它增加到全学习时间（包括自修时间）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请你与瑞卿[2]同志考虑这个问题。定期检查时文化应是重要的检查标准之一。

布礼！

毛泽东

二十六日十四时

---

[1] 林彪，当时任抗日红军大学校长。

[2] 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

# 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

（1936年8月26日）

小开[1]兄：

（甲）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李毅[2]兄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乙）你来信及南京密码今日收到，但张子华[3]未到。现急需兄去南京谈判，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谈判方针亦须面告。但如不能取道肤施[4]，则往返需时过久。能否取道肤施，即复。

东[5]

二十六日二十二时

---

[1] 小开，指潘汉年。

[2] 李毅，即张学良。

[3] 张子华，当时是上海地下党员。

[4] 肤施，指延安。

[5] 东，即毛泽东。

# 冬季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1]

（1936年8月30日）

朱、张、任同志：

关于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我们有下列意见。

甲、情况

（一）日本向绥远[2]有急进势。

（二）全国民众抗日运动有更大发展。

（三）广西与南京的斗争尚未解决，估计蒋在西南问题解决后出兵到西北时，尚有两个月左右时间。

（四）成都感日近万民众暴动[3]，打死日人二，打伤日人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中共中央根据蒋介石解决两广事变后，将继续增兵西北和进一步分化东北军这一情况，对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冬季以前的部署作了调整。

[2]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3] 日本为向中国腹地刺探情报，继在九江、武汉等地设立领事馆后，又要在成都、昆明等地设立领事馆，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对。1936年8月24日，成都万余学生和民众举行抗议示威，愤怒的群众打死日本人两名，打伤两名，并捣毁日本人居住的大川饭店及经营日货的交通公司和益晋、恒宝商号。感日，系韵目代日，指27日。此处时间有误，应为24日。

本有借此大举压迫中国之势。

（五）南京抗日联日两派斗争颇烈。

（六）胡宗南[1]之钟松[2]旅开始由郑州向兰州开。

（七）蒋介石有于西南问题解决后，分化东北军，撤换张学良[3]之企图。

乙、我们的基本方针

（一）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

（二）紧密地联合东北军，并进行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

（三）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准备冬季打通苏联。

（四）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使之成为另一战略根据地与陕北、甘北相呼应。

（五）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

丙、九至十一月的具体部署

（一）一方面军主力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南北地区，一部保卫定边、盐池、豫旺[4]、环县苏区，一部保卫陕北苏区，另一部保卫关中苏区（泾水、环水、洛水之间）。

（二）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

---

[1]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2] 钟松，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第二师补充旅旅长。

[3] 张学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4] 豫旺，旧县名，即今宁夏同心县。

区，尽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但岷州[1]如无办法夺取，则用少数监视之。

（三）二方面军速向陕甘交界出动。首先插出王均[2]防线之后，占领凤县、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再与王均作战。

丁、上述部署的利益

（一）一方面军主力出至海原、靖远地带，四方面军出至武山、通渭地带的结果：一面使得李忠[3]三个师有所借口，全部控制兰州、定西地区，李仁李义[4]之一部得由平凉向西延伸，控制隆德、静宁、会宁等城；一面使得毛炳文[5]离开兰州，吸引之于陇西地区，相机给以打击，吸引宁夏二马[6]部队向中卫及以西地区，并相机给以打击，使定、盐、豫苏区不受威胁。

（二）二方面军向东的结果：首先吸引钟松旅于陕甘交界，使之无法西进；其次相机给王均以打击；其次把陕南苏区与甘南联系起来。

（三）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二方面军向东行动为最重要。不但是冬季红军向西北行动的必要步骤，而且在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之

---

[1] 岷州，指甘肃岷县。

[2] 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

[3] 李忠，即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五十一军军长。

[4] 李仁，即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六十七军军长。李义，身份不详。

[5] 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

[6] 二马，指马鸿逵、马鸿宾。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新编第七师师长。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五师师长。

间不久就将举行的双方负责人谈判上也属必要。此外，在保护甲军[1]与李毅[2]，使不受蒋介石可能的打击，以及解决给养补充问题，都是必要的。以上意见，请你们考虑见复。

育　洛　恩　博　泽

八月三十日

[1] 甲军，指东北军。

[2] 李毅，即张学良。

# 戏赠周小舟联[1]

（1936年8月）

江河移胯[2]下；

蚂蚁做波臣[3]。

---

[1] 1936年8月，周小舟从延安启程去新疆宣传抗日。新疆军阀盛世才心狠手辣，不好对付。临别时，毛泽东见小孩撒尿，触景生情，吟成这副对联相赠，鼓励他藐视困难，勇往直前。周小舟（1912—1966），湖南湘潭人，原名怀求，化名元诚、西苇，1937年由毛泽东改为现名。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毛泽东秘书。建国后，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因被迫害自杀。

[2] 胯，腰的两侧和大腿之间的部分。

[3] 波臣，指水族。古人设想江河湖海中的水族也有君臣之分，其被统治的臣仆奴隶，称为波臣。

# 给王以哲[1]的信

（1936年8月）

鼎方军长勋鉴：

日寇侵略益厉，兄我双方救亡之准备大宜加紧，庶于救亡阵线有最大之裨益。我兄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目前国际与中国形势日益紧张，一方面侵略主义者动员其侵略阵线，一方面反侵略主义者大规模动员广大民众，组成和平与救国的阵线。中国之汉奸势力虽日益嚣张（如所谓以日制蒋、以政制党、以团制军之一派），然反日反汉奸势力亦大见增进。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双方谈判现将进至比较具体的阶段，虽何时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实已存在。倘能达到成功之域，对贵我双方之合作事业自有极大之便利也。

近日外间谣传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副司令。此讯如确，是蒋氏尚未放弃其挑拨离间、排除异己之阴贼险狠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见之实行，弟等可断

---

[1] 王以哲（1896—1937），字鼎方，吉林宾县（今属黑龙江省）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军军长。

言蒋氏必归于最后的失败，因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非陈济棠等之不真实不纯洁的主张，乃真心实意为国家为民族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领的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国际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至于东北军最大多数官兵抗日复土之决心及其坚固的团体，亦必不容东北军中极少数无志节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国叛乡叛团体之万恶的勾当。目前蒋氏及其一派亦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安得以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观，弟则深望此说之止于谣言，或为蒋氏左右一部分汉奸分子谋划，而非现正开始若干转变之蒋氏及国民党多数有良心分子的意见。但兄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则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决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秋风多厉，为国珍摄。匆此布臆。

敬颂

公祺

毛泽东

# 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1936年9月1日）

（一）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

（二）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

（三）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此要解释我们是真正主张“和平统一”的，我们的主张同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并宣布他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出的全国的国会，拥护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破坏和平统一的，南京的国防会议与国民大会是不能集中统一全中国抗日力量的。

（四）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

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对广西方面我们赞成他们的抗日发动，是正确的。但我们更应要求他们在实际行动上表现他们抗日的诚意，主要的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一切民主权利，发动群众的抗日运动。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抗日运动坚持与扩大出去，才能使抗日运动成为有力的运动。对他们的错误决不放弃批评的自由。对蒋方应指出用内战决不能解决集中统一的问题，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的争论，应付之全国人民的公决。

（五）在对付宁粤两方这种冲突时，我们应力求避免在全中国人民前面，袒护一方面的态度。在全国人民前面，我们应表现出我们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决主张者，是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这种态度最能争取广大抗日人民的同情与拥护，在国民党区域中也便利于我们的活动。

（六）关于建议“国共合作”的宣言，下次交通即带上，到时广为翻印，分发南京及各省党政军学商工农各界。

中央

九月一日

# 关于取消敌对行为互不侵犯等问题给孙蔚如的信

（1936年9月3日）

蔚如军长勋鉴：

孙君作宾来，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敝军去岁入陕，及今之二四两方面军继续北上，其志悉在抗日。贵我双方虽彼此接壤咫尺，弟亦未尝视贵军为敌，良以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且先生与虎城先生所处环境，敝方甚为谅解，故十个月来贵方对弟等合作之要求，虽无明确的表示，弟方亦始终未变自己之方针。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尤以贵部移驻肤洛，双方益加接近，团结一致，更所必需。孙君转达各节，弟等极表欢迎。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贵方民团与敝方之游击部队彼此负责约束，不使再生误会，为掩饰外间耳目计，一切可以隐蔽方式出之，至于交换情报，互派常驻代表，互约通信电本，均属必要，统请裁夺，其余由孙君面达，另付敝方致中国国民党书，并祈省察。匆此，顺颂勋祺。

虎城先生即此致意。

弟　毛泽东敬启

九月三日

# 陕西、甘肃、宁夏各苏区情况[1]

（1936年9月4日）

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一千二百余里，南北亦六百里。现有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环县、豫旺九城在我手中。各县地形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物产一般贫乏，不能供给大军久驻。神木特区，东西长二百余里，南北约三百余里，游击战争颇发展。关中苏区，南界距西安九十里，中部、三原、庆阳等十县的乡村已连成一片，县城非我所有。陕南苏区发展至二十余县，部队约二千人。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 致刘鼎电[1]

（1936年9月7日）

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红校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付来。

[1] 这是毛泽东致刘鼎电的主要内容。

# 致宋时轮等电[1]

（1936年9月7日）

我们委任回人马怀蔺为西北抗日救国军第一路游击司令。马为哥老会首领，在宁夏有群众，应优待和帮助他。马由保安到定边，需沿途派兵接送。

[1] 这是毛泽东致宋时轮并转贾拓夫电的主要内容。

# 给邵力子[1]的信

（1936年9月8日）

力子先生：

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2]时代之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今则时局越作越坏，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国一民族哭矣！安得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共产党致国民党书[3]，至祈省览。语云：越人弯弓而射之，则己弯弓而射之，其兄弯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

---

[1] 邵力子（1881—1967），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1949年作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参加国共和谈，后留北平未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2] 《觉悟》，是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1919年创刊，由邵力子主编。从1920年起，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下，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园地。1924年国共合作后，继续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马克思主义。1925年五卅运动后，邵力子去广州，国民党右派分子逐步控制了《民国日报》，《觉悟》的面貌随之右转。

[3] 指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申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

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此办法问题也。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佥同，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书不尽意。顺颂

勋祺！

毛泽东

九月八日

# 给王均[1]的信

（1936年9月8日）

治平先生：

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我们致国民党书，为了共同抗日，实全国一致之要求，先生爱国健儿，对此谅有同感！朱玉阶[2]同志极愿与先生合作，如能与之互通声气，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两党合作之局既为时不远，双方前线宜尽可能减少冲突。如何之处，敬候卓裁。顺颂

勋祺。不一。

毛泽东

九月八日

---

[1] 王均（1891—1936），字治平，云南呈贡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

[2] 朱玉阶，即朱德。他和王均曾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

# 给朱绍良[1]的信

（1936年9月8日）

绍良先生：

十年酣战，随处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然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为鹬蚌者不亦危乎？付上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为国家民族谋，亦为先生谋也。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天下后世颂先生为民族英雄，岂不愈于胡宗南[2]君所谓“无期徒刑”乎？夫“剿匪”非特无期徒刑也，且是一种死刑。非曰红军宣告先生们之死刑也，日本帝国主义实宣告之，非特宣告国人某一部分于死刑，实欲举全民族而宣告之，呜呼危矣！先生而同意统一战线，则鄙人竭诚以迎。惟事宜急办，迁延则利在长驱而入之寇。尚祈致意蒋先生[3]，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书不尽意。顺颂

勋祺！

毛泽东　启

九月八日

---

[1] 朱绍良（1891—1963），原籍江苏武进，当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甘绥靖公署主任。

[2] 胡宗南（1896—1962），浙江孝丰（今并入安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在陕北进攻红军。

[3] 指蒋介石。

# 抗日反蒋不能并提[1]

（1936年9月8日）

朱、张、任同志：

甲、来电收到。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我们已有几个电报给国际，并派邓发[2]经新疆去莫申请，他们正等邓发到后查明情形，即有回答。你们来电已经转去。九至十一月三个方面军的部署，即照商定办法执行。

乙、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三月南京有人来接洽。我们提出一般的条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两次来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大体见以前给你们的电报。然而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的，八月下旬国际有进一步指示。目前我们的联络代表又已出去向南京接洽，双方正式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问题，依情势看有成就之希望。在南京方面不单是我们问题，还有联俄问题。依南京发表蒋廷黻为驻苏大使看来，联俄问题也有成就之望。我们现已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这是我们新的宣言，包括了民主共和国、民主国会与民主政府等新的内容。国际对中国党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

[2] 邓发（1906—1946），广东云浮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政治指示已到，政治局讨论之后即可告知你们。

丙、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向毛、王[1]等部派出人员进行接洽，仅在我们必要占领的地方遇到他们的反对才与之作战，但同时进行宣传与接洽。希望你们依据这个方针，把自己的宣传工作改造一下。

丁、对张学良任何部分都不要取真正攻击态度，应向他的师、团、营长写信，向士兵作普遍宣传。在我们与南京谈判没有成就以前，张学良指挥下的西北各部，包括东北军在内，都还不能停止对我们的敌对行为。东北军之何、于两部受我们影响尚少，何与蒋有联系，张不能以联红事告他，你们更要加紧工作。

戊、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已把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出西北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

己、德怀在前线指挥野战军，育英[2]在环县进行东北军工作，我们在保安。

洛　恩　博　泽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

---

[1] 毛，指毛炳文（1891—1970），湖南湘乡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王，指王均（1891—1936），云南呈贡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

[2] 育英，即林育英（1897—1942），又名张浩，湖北黄冈人。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年11月回国到达陕北。1935年12月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1936年1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林育英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 红二、四方面军行动计划和统战工作进展情况[1]

（1936年9月8日）

红二方面军出两当、徽县，扩大占领区域，相机消灭王均。红四方面军在岷县、临潭、渭源、漳县、陇西、武山地域，一部出通渭、静宁。林育英率一组人在曲子主持统战工作，由周恩来指挥。南京代表来而复去，约主要负责人见面，有成就希望。李宗仁、白崇禧有代表来华北，我们有人去南京。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 给毛炳文的信[1]

（1936年9月8日）

红军北上为抗日，此外悉无所求，先生断乎不可以恶意抗拒。

已电告甘南甘北部队，在贵军不过为己甚条件下，不与先生以困难。如先生赞同一致抗日之议，可随时派人与前线红军首长协商。

[1] 这是毛泽东致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信的主要内容。

#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9月10日）

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三个师准备向通渭进攻，红四方面军通渭、庄浪部队宜向西迫近秦安游击，迟滞敌军，掩护红二方面军提前北进。红二方面军速通过通渭进至界石铺、通渭之间休息，准备经界石铺转静宁、固源、隆德之间。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电的主要内容。

# 致彭德怀等电[1]

（1936年9月10日）

红一军团第二师速转移至静隆大道，相机袭占庄浪，迟滞胡宗南、王均部进攻通渭，以便红二方面军转移至通渭以北地域休息。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左权、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 致贾拓夫电[1]

（1936年9月10日）

马怀蔺到定边后，要经常以开会方式同他讨论，争取马部军队，争取宁夏军队、群众及组织游击队，并详细调查宁夏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各方面的情况。

[1] 这是毛泽东致贾拓夫电的主要内容。贾拓夫，当时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

# 给彭德怀等的信[1]

（1936年9月11日）

彭、刘、富春：

（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

（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

（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

（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

毛　周　博

十一日十六时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给中国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政治部主任刘晓和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的信。

# 占领宁夏的部署[1]

（1936年9月14日）

朱、张、任三同志：

甲、国际[2]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乙、胡宗南[3]部第一师及四十三师、七十八师、九十七师，十号从长沙开动，先头十八号到咸阳，月底集中定西，其补充旅已由静宁向定西开。其目的不外控制兰州地区，妨碍甲乙两军[4]打通苏联，使联俄后苏方接济归其垄断，并于某种时机策应绥远[5]。

丙、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

[2] 国际，指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1922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决定，宣布解散。在这期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做过许多指示。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4] 甲乙两军，指东北军和红军。

[5]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一）一方面军主力，九十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方面军之其余部队，保卫陕甘北苏区。

（二）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1]，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2]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3]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

（三）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四方面军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

（四）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经关中苏区出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之侧后。

丁、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取得密切之配合。

戊、宁夏马[4]部之士兵运动与回民运动，此间正用大力工作，

---

[1] 西兰大道，指陕西西安至甘肃兰州的公路。

[2] 硝河城，镇名，位于今宁夏西吉县东南。

[3] 宁安堡，镇名，为宁夏中宁县县治。

[4] 马，指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五路军司令兼新编第七师师长。

敌情、地形之详细调查不日电告。

己、请兄等考虑电复。

育英　洛甫　恩来　博古　泽东

九月十四日十八时

# 致彭德怀等电[1]

（1936年9月15日）

九、十两月须用全部精力进行宁夏的军队运动与回民哥老会运动，务必取得决定的成绩。所有各兵团领导及政工人员，务必克服对统一战线及回民工作认识不足、教育不力、工作不切实的弊病，必须选拔与指定多数得力干部担任此种工作。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杨尚昆致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负责人及陕甘宁省委负责人电的主要内容。

# 聂荣臻部应南下策应红四方面军[1]

（1936年9月15日）

彭：

甲、李毅[2]无被刺事。他应与南京保持统一，但应准备万一时的防御阵地。

乙、胡师[3]补充旅进兰州，不是去甘凉肃[4]。胡宗南主力前进甚速，故令四方面军速控制静宁、会宁大道。

丙、聂荣臻[5]部应直下静宁、隆德间策应，尔后应迫近固原、瓦亭[6]线活动，使该线敌军不敢北进。

毛

十五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李毅，即张学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3] 胡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

[4] 甘凉肃，指甘州、凉州、肃州，均为旧府名，即甘肃张掖、武威和酒泉。

[5] 聂荣臻，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

[6] 瓦亭，村名，位于宁夏固原县南部。

# 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意见[1]

（1936年9月15日）

朱、张、陈同志，并致任、贺、刘[2]：

战略建议电[3]发出后，适接十三日二十时电[4]，彼此意见大体一致。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5]为中心之隆静会定[6]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7]军占领该线。[8]以一部附电台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第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电报。

[2] 任、贺，指任弼时、贺龙，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和总指挥。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3] 即《占领宁夏的部署》。

[4] 指1936年9月13日20时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给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的电报。电报建议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向静宁、会宁地区，南同红军第四方面军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之胡宗南；红军第二方面军以主力在徽县、两当、凤县以北地区，并以一部进到宝鸡，牵制王均，吸引胡宗南。

[5] 界石铺，村名，位于甘肃省静宁县西北。

[6] 隆静会定，指甘肃隆德（今属宁夏）、静宁、会宁和定西。

[7]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8]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另一抄件在“不让胡军占领该线”之后，还有“此是最重要着”几字。

东出华亭、陇县区域纵横游击，成一远出支队。二方面军之支队附电台直出宝鸡、眉县以东。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隆线出动，如此当可滞阻胡宗南之行进，而便于四方面军之出至隆定大道[1]，并准备作战。至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2]三城必被马[3]敌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打击以前不宜离开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以增至一个军协助之。请斟酌。

毛　周　彭

九月十五日

[1]　隆定大道，指甘肃隆德至定西的公路。

[2]　定盐豫，指陕西定边、宁夏盐池和豫旺（今同心县）。

[3]　马，指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五路军司令兼新编第七师师长。

# 四方面军宜以主力控制隆静会定大道[1]

（1936年9月15日）

朱、张、任同志：

甲、蒋桂妥协。李宗仁为绥靖主任、五路军总司令。白崇禧[2]调南京。胡宗南[3]编入第七路军，第一师、第七十八师十八日全部到咸阳，四十三、九十七两师随后开来，尔后配置于静宁、会宁、定西、兰州线，配合川军及毛王[4]等军向岷州[5]压迫。

乙、一方面军已向海原、固原出动，一军团派第一师出静宁、隆德大道，策应四方面军。

丙、四方面军宜在五天至七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界石铺比通渭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另一抄件，收电人是朱、张、任、陈、王。陈、王，指陈昌浩、王树声，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和副总指挥。

[2]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副总司令。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4] 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

[5] 岷州，即甘肃省岷县。

大），迟则有被隔断之虞。渭水以南留小部队活动。以上建议请考虑。

毛　周　彭

十五日

# 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1]

（1936年9月16日）

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时参加过革命，一九二七年叛变了革命。现在，由于经济危机的加深，日本的压迫，买办资产阶级在南京政权占据了绝对优势，民族资产阶级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统一战线，但这样的领导是要争取的，现在正在争取。国民党也正在争取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中间阶级有成立新的政党的可能，他们有广大的群众，但他们是动摇的，我们应当争取他们。大革命时，我们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这是世界上第一次，那次联合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现在重新与资产阶级联合，更应该由我们领导，这样才能实现抗日的胜利。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加紧对南京以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而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当前的任务。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不是国民党所说的西方现代国家，它是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工人农民的国家。一旦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我们应该参加，但要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的独立性。民主共和国一定要在群众运动、红军和苏维埃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 阻滞胡宗南部西进[1]

（1936年9月17日）

彭：

胡宗南[2]全部到西安，正陆续西运，甚速。已连电朱张[3]速以主力进占界石铺。为配合打击胡宗南，似有以我一军团一部向固原南部及西南部出动之必要。而在一、二日内聂[4]率之第一师宜集中行动，配合策应于静隆大道[5]北侧，向大道绕击，阻滞胡敌西进，同时以利我四方面军北出界石铺大道。如何，盼复。

毛

十七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3] 朱，指朱德。张，指张国焘，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

[4]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

[5] 静隆大道，指甘肃静宁至隆德（今属宁夏）的公路。

# 致朱德、张国焘电[1]

（1936年9月17日）

我第一师已到静宁、会宁北端的单家集一带，红四方面军主力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我野战军昨日在固原北消灭骑六师主力，现令其向南进展策应你们。机不可失，千祈留意。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 应以红一军团一部先占界石铺[1]

（1936年9月17日）

彭，并报聂[2]：

界石铺既无敌，一师应以一个团附骑兵一部在明日确实占领之，并向东南游击，以待四方面军来接替。否则胡宗南[3]先占该地大为不利。另派一部直达隆德、静宁道上扰乱。

毛

十七日十五时半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率该军团第一师前出静宁、隆德，策应红军第四方面军北上。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 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1936年9月17日）

（一）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策动华北独立以来，对于中国的侵略没有一刻停止的，不论它侵略的方法与方式怎样〔随〕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它并吞全中国的基本政策，是始终不变的。在华北进兵之后，高唱着的“经济提携”，实际上不过是以经济的侵掠方法巩固已得的阵地，并给新的进攻准备基础。平津与察北的增兵，绥东的进攻，城〈成〉都、北海、海口、上海、丰台等地的挑衅，表示出日寇的新侵略行动又将开始。民族危机，较之过去是更加严重了。这就指出保卫华北、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更加严重的放到革命政党与全民族的身上了。

（二）一年来全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广大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发动，已经给了日寇侵略计划以相当的打击，暂时的阻止了日寇建立华北国与建立“防共统一战线”的实施，这是中国人民一年来抗日救亡运动的胜利。然而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还不够广泛，它的力量还不够雄伟，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有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时还『不』仅在开始的阶段，最大的政党——国民党及其领导与影响下的军队还没有参加这个战线，国民党的政策还

没有基本的转变，因之，民族革命战争还没有能够发动，以致我们不但没有能够停止日寇的继续侵略与保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再不受到损害，而且日寇不〈还〉巩固了它在华北的地位，获得了对于中国领土主权的新的侵占，并准备新的大举进攻。这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但是需要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共同行动与艰苦卓绝的奋斗。

（三）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攻之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的表现在全国工农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继续增长，中国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抗日救国主张的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赞助与全国主力红军的集中于西北抗日前进阵地，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开始转向抗日战线，国民党军队官兵中广大成分抗日情绪的增长，和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分化与动摇。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外政策的摇摆不定，其言行的自相矛盾；与其各派间关于抗日问题上的争论，明显的表示出它现在是在动摇的中间。在日寇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

（四）为着集中全国力量去抵抗日寇的侵掠，驱逐日寇出中国，我们不仅要收复〈集〉更广泛的民众的力量、和一切真正革命的，觉悟的纯洁的分子，而且要争取统治阶层中一切可能的部分到抗日斗争中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更加增强自己的阵容与力量。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但这绝对不应放松对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一切违反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的严厉的批评与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党南京政府内部的抗日倾向日渐

发展，扩大抗日分子的影响，克服其本身的动摇，战胜亲日派，而走向抗日救国的大道。中央必须着重指出：共产〔党〕在为着实现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不但对于统一战线之公开的或秘密的敌人，应该进行严厉的斗争，而且对于口头上赞成而实际上消极的假抗日分子，以及各种各种〈样〉的同盟者，应该保持批评有完全自由。同时中国共产党赞助一切真正的抗日战争之发动，即〔使〕这种发动是部分的。但是主要的，应用尽一切方法与力量，最迅速的促进与〔组织〕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真正对日武装抗战。为此目的，共产党应继续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反对一切在民族危亡面前自相残杀的内战。

（五）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式〈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残〈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六）中央着重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起

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的巩固苏维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方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给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准备前提。没有艰苦的持久的斗争，没有全中国人民的发动与革命的高涨，民主共和国的实现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应该使这个民主〔共〕和国从实行本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始，一直到中国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彻底的完成。

（七）去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决议上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大半年来党在执行这一总路线下，虽然得到了许多成绩，主要的在于苏维埃红军的力量是加强了，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是扩大了，向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是进步了，这些成绩应当成为今后工作的有利基础。〔但是〕许多党的组织极不善于具体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武装队伍、每一阶级与阶层，常常不善于根据它们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要与要求，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它们接洽、协商、谈判，以求订立各种地方地〈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这种具体实际的行动纲领，并在为着实现这些纲领的共同斗争中，引导推动与组织他们走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议（或国防会议），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以至民主共和国。我们许多党的组织不善于这样做，而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满足于少数先进分子的活动，以抽象的，刻板的与机械的方法方式去对付各个具体的问题。同时在统一战线一时不能建立的场合，却又表现出：

“共产党员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立工作”之放松或不足。这些弱点，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到今天还没有成为千千万万抗日大众实际参加的主观上的重要原因。

（八）中央认为必须及时纠正那种以为阶级斗争的发动会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民族革命的胜利决不是少数上层分子所能完成的。不吸收成千百万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就不能形成抗日救国的雄厚力量，就不能推动与逼迫动摇的游移的上层分子与当权者走向真正的抗日的道路，就不能实现民主共和国。而领导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的斗争，解决他『他』们迫切的生活要求，是组织他们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关键。但在领导这种日常经济政治的斗争中，共产党要同样的善于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吸收最广大的群众到斗争中来。并根据于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把群众的日常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使这种斗争成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扩大，继续发展与继续前进的力量，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的基础。

（九）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斗争过程中，绝对不应该削弱苏维埃红军的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苏维埃红军在一定纲领上同其他政权及武装力量所成立的政治军事协定，但并不与其他政权及武装力量相混合。可以在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统一指挥之下，但并不取消苏维埃红军组织上与领导上的独立性。须充分注意于红军的扩大与巩固，那种不经过选择的允许学生及其他军队的旧军官加入红军的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样足以破坏红军的统一和团结。必须充分注意加强苏维埃红军的领导成分，那种允许资产阶级参加苏区政治管理的意见，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可以从内部来破坏苏维埃机关。即使在

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共产党也决不放弃对于苏区人民与原有武装力量的绝对的领导，相反的，党在坚决领导全中国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与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中要坚持着扩大与巩固自己的政治的与军事的力量，保障抗日战争与民主共和国之彻底的胜利，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实现。

（十）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的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在苏区内特别在非苏区内有系统的征收党员是非常必要的，但必须避免大批入党的办法，而只吸收经过考察的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在这个意义上，去年中央十二月决议中“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的社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与“党不怕某些投机分子侵入”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采取实际办法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因为不论在苏区与非苏区，在彻底实现党的政治路线上，有独立工作能力『能』的优秀干部，有着决定一切的意义。动员成千成万的党员到一切无组织与有组织的群众中去争取千百万的群众在自己的周围，正确的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为着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治〔任务〕面前一刻不可放松的任务。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对于忽视党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忽视巩固苏维埃与红军，放松对于广大下层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斗争的领导，对同盟者批评不够等等右的机会主义倾向必须及时的给以纠正。但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依然是彻底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的危险。正确的党内思想斗争的发展，将是完成党的一切政治任务的有力武器。

# 给宋庆龄的信

（1936年9月18日）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1]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2]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3]、孔

---

[1] 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

[2] 指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3] 吴稚晖（1865—1953），江苏常州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在1937年至1950年的国共斗争中，扮演积极反共的角色。

祥熙、宋子文、李石曾[1]、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

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1] 李石曾（1881—1973），河北高阳人。中国教育家，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曾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 给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1]的信

（1936年9月18日）

乃器、行知、钧儒、韬奋先生：

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2]，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

我相信我们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国口号，必为诸位先生所赞

---

[1]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曾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中国征信所董事长。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人民教育家。沈钧儒（1875—1963），浙江嘉兴人，爱国民主人士，律师。邹韬奋（1895—1944），江西余江人，新闻记者和出版家，曾先后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当时他们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

[2] 1936年5月，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人发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年7月15日，他们四人联合署名发表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同，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实行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方策。

付上我们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请求诸位先生予以审察，并以高见惠示我们。

国民党军队继续对于红军的进攻与一切野蛮法令的尚未撤废，到今天仍然把我们与先生们远远地隔离着，彼此不能经常共同讨论与交换抗日救国的具体意见。这也就不得不使诸位先生对于我们今天所执行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与实际行动，尚有若干的隔阂与误会。因此，我委托潘汉年[1]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此致

抗日救国的敬礼！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1] 潘汉年，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

# 一军团主力暂在现地待机[1]

（1936年9月18日）

彭司令员：

两次电[2]达朱张，要其速占界石铺，尚未得复。打击胡军[3]，须以四方面军为主力，在其部署与决心未明之前，一军团主力暂时宜在现地待机。如能在固原北部再给何柱国[4]一个打击，使后路无被切断之虞则更稳妥。将来进攻宁夏，一方面军只能从盐池、豫旺、同心城分路前进，而以同心城以西划为四方面军之作战线，故后路保持甚为重要。请酌行。

毛

十八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指1936年9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17日12时毛泽东、周恩来给朱德、张国焘的电报。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4] 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骑兵军军长。

# 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1]

（1936年9月19日）

朱、张，并致任、贺[2]：

篠申电十九日十二时收到，敬复如下：

甲、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

乙、我们已将宁夏、甘西地区狭小不利回旋，且城坚难破之困难条件报告国际，并说明须取得苏联飞机、大炮之帮助，才能破城。现据回电说，到宁夏地区后给帮助。则我军只要能占领宁夏之乡村，靠近贺兰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

丙、外蒙、宁夏间是草地，有许多汽车通行路，过去即从这些道路接济冯玉祥。邓小平[3]同志亦亲从定远营[4]汽车路走过。他们从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等的电报。

[2] 任、贺，指任弼时、贺龙，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和总指挥。

[3] 邓小平，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1926年底他从苏联回国，曾经定远营到银川，后又从银川到西安，在中山军事学校工作。

[4] 定远营，也称定远城，即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

外蒙接济，我们先占领定远营。

丁、据宁夏同志云，宁夏因有贺兰山，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实行攻甘西，亦须得到苏联协助才能攻克甘凉肃[1]三州等坚固城池。现盐池、定边可大批买布，我们在向李毅[2]借款，为你们制备一批衣服。从中卫到红水[3]、永登，沿黄河西岸并不通过沙漠。

戊、攻宁夏须待结冰（无造船把握），结冰从阳历十二月开始，距今还有七十天左右。此七十天内，四方面军占领静宁、通渭、会宁、靖远、海原、中宁（中宁县在金积县西南）及金积之一部，粮食不成问题。一方面军则占领固原、灵武、同心城及金积之一部，准备十二月初渡河。

己、因马鸿逵[4]有二十余团，汤恩伯、何柱国、高桂滋、高双成[5]等军在我军侧后，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如使胡宗南确占静、会地区会合毛炳文[6]，彼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

---

[1] 甘凉肃，指甘州、凉州、肃州，均为旧府名，即甘肃张掖、武威和酒泉。

[2] 李毅，即张学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3] 红水，位于甘肃景泰县北部。

[4] 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五路军司令兼新编第七师师长。

[5]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骑兵军军长。高桂滋，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八十四师师长。高双成，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八十六师师长。

[6] 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

宁夏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1]，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各个击破之虞。只有集中先占领宁夏方免此失。

庚、据最近调查，靖远以上至兰州不结冰，靖远以下均结冰。

辛、目前对胡宗南不宜进行决战，只须速进静宁以西，占领广大阵地，让他展开筑碉。我在七十天内逐步北移，至十二月一四两方面军各以一部拒止南敌，各以主力北进攻宁，配合苏联帮助，夺取宁城[2]，至明年春暖再行决定分路西进、南进、北进。

壬、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

毛　周　彭

十九日十五时

---

[1] 马步青，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五纵队兼第二防守区（新编第二军）骑兵第五师师长。

[2] 宁城，即今银川市。银川旧为宁夏府治，称宁夏城。

# 一切工作都应围绕夺取宁夏[1]

（1936年9月19日）

今天讨论一个军事问题，就是夺取宁夏，大体计划已定下来了。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夺取宁夏的胜利，对开展局面有决定的意义，陕甘亦可巩固。宁夏堡垒比较多，如果没有群众工作，专靠硬打是不行的。在这里，白军工作、哥老会工作、回民工作是整个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加紧十一、十二两月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决定成立宁夏工作委员会，李维汉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并以叶参谋长名义指挥军事。对于马鸿逵，要坚决、迅速地消灭之。我们总的策略是联合一切，但不联合马鸿逵，要估计到马鸿逵是绝对无联合可能的。对于土豪，目前一切不打。以后在不妨碍军事行动时，原则上不打，但在红军需要时、群众需要时，也可以打，并要估计到一切土豪没有不站在马鸿逵方面的。

---

[1] 1936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着重讨论夺取宁夏问题，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和李维汉、林彪、叶剑英、王观澜、宋任穷等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特别强调了夺取宁夏的重要性。这是毛泽东发言的一部分。

# 统一指挥十分必要[1]

（1936年9月21日）

朱、张，徐、陈，任、贺、刘、关同志：

来电均悉。

甲、四方面军北进部署既定，对整个战略计划甚为有利。

乙、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的意见[2]，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3]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以毛、彭、王[4]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5]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王稼祥给朱德、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总指挥贺龙、随营学校（稍后改称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副政治委员关向应的电报。

[2] 指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1936年9月19日22时致朱德、张国焘、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的电报，该电提出“以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的建议。

[3] 这里指的六人军委主席团后因情况变化未成立。1936年10月10日20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朱德、张国焘及各方面军领导人电中，确定：“拟请朱、张两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

[4] 毛，指毛泽东。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5] 朱、张、陈，指朱德、张国焘和陈昌浩。

三同志一起工作。

丙、主席团地点暂时以在同心城[1]附近为适宜。

英　洛　恩　博　稼　泽

九月二十一日

[1] 同心城，当时属宁夏省豫旺县，1938年豫旺县改名为同心县。

# 给蔡元培[1]的信

（1936年9月22日）

孑民先生左右：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行之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

---

[1] 蔡元培（1868—1940），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早年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是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上海分部主盟员。1917年1月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四运动期间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1928年起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同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

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宋庆龄先生，何香凝先生，李石曾先生，吴稚晖先生，张溥泉先生，于右任先生，孙哲生先生，居觉生先生，覃理鸣先生，柳亚子先生，叶楚伧先生，邵力子先生，汪精卫先生，陈璧君先生，经亨颐先生，陈公博先生，顾孟余先生，曾仲鸣先生，甘乃光先生，张静江先生，戴季陶先生，陈果夫先生，丁惟汾先生，宋子文先

生，陈树人先生，褚民谊先生，彭泽民先生，李任潮先生，李德邻先生，陈友仁先生，邹海滨先生，徐季龙先生，朱霁青先生，白云梯先生，恩克巴图先生，李福林先生，陈护方先生，程颂云先生，唐孟潇先生，朱益之先生，李协和先生，柏烈武先生，刘震寰先生，谭逸儒先生，张知本先生，冯自由先生，谢慧生先生，茅祖权先生，蒋雨岩先生，孔庚先生，郭沫若先生，沈雁冰先生，陈望道先生，李鹤鸣先生，胡适之先生，章行严先生，周作人先生，钱介磐先生，傅斯年先生，罗家伦先生，段锡朋先生，陈宝锷先生，张东荪先生，彭一湖先生，彭泉舫先生，杨端六先生，胡子靖先生，陈夙荒先生，周谷城先生，舒新城先生，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

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敬颂

道安。不具。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 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1]的信

（1936年9月22日）

任潮先生，并请转致德邻、健生先生勋鉴：

钱寿康君来，具悉贵方情形及所示协定草案，谋国伟画，无任钦迟。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之阶段，敝方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即提出此种实际方案，现托钱君携呈尊览。诸公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2]，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全国汹汹，抗日不成，实为南京当局

---

[1] 李济深（1885—1959），字任潮，广西苍梧人。1927年国共分裂后任国民党政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组织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任主席，失败后去香港。1936年两广事变时，曾赴广西支持李宗仁、白崇禧反对蒋介石。1948年起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广西临桂人，桂系军阀首脑。1936年曾参与发动两广事变，反对蒋介石。1949年一度担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同年12月去美国。1965年7月回到北京。白崇禧（1993—1966），字健生，广西桂林人，桂系军阀首脑。1936年曾参与发动两广事变，反对蒋介石。

[2] 指1936年两广事变中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议和避免战争一事。

缺乏抗日救亡之认识与决心，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督促批判，责其更新，全国人民及各实力派系与有责焉。

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兹对贵方所提草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缮写两份，仍由钱君携回，敬祈审察。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自存一份，以另一份再由钱君携来敝处，即成定案。起效时间，以诸位先生签署之月日为准（请填上时间）。如有尚待磋商之处，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确定。一俟确定之后，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专此奉复。

敬颂

勋祺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 给蒋光鼐、蔡廷锴[1]的信

（1936年9月22日）

憬然、贤初先生勋鉴：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回顾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兄我双方合作救国[2]之时，又已整整三年矣。而国难日亟，寇进不已，南京当局至今尚无悔祸之心，内战持续如故，全国人民之水深火热又如故。瞻念前途，殷忧何极！然而国际形势进入了新的阶段，国内爱国运动蓬勃发展。光荣的十九路军系统在先生等领导之下，继续奋斗，再接再厉。弟等则转战南北，接近了抗日阵地。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得到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之赞成与拥护，即国民党内部亦有了若干开始的转变。凡此都是不同于昔

---

[1] 蒋光鼐（1887—1967），字憬然，广东东莞人。1930年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1932年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他与蔡廷锴等指挥十九路军进行淞沪抗战。1933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广东罗定人。1930年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军长。1932年参加指挥淞沪抗战。1933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2] 指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蒋光鼐、蔡廷锴等组织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期间，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停战协定和抗日反蒋协定。

的新局面。驱除日寇，挽救危亡，为期实不甚远。敝党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提出了新的具体方案，检呈一份，敬祈审察。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拟具草案八条[1]借供研讨，并祈转达陈真如[2]先生及十九路军各同志。如荷同意，即宜互派代表集于适当地点正式签订。如兄方以为尚有需磋商增改之处，不妨往复商洽，使臻完善，然后签订。总之，真正之救国任务，必须有许多真正诚心救国之志士仁人，根据互相确信之政治纲领，为联合一致之最大努力，方有彻底完成之望。热诚爱国如先生，知不以斯言为无当也。真如先生何时归国，深以为念，弟等甚盼其迅速回国，从事统一战线之伟业。钱寿康先生南旋，托致手书。海天在望，不尽依迟。专此。敬颂

勋祺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

[1]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方面起草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全文共8条，主要内容包括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为，互相合作，唤起民众，实行对日武装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等。这个协定草案，当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

[2] 陈真如，即陈铭枢。1931年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1933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去香港。1936年赴欧洲游历。

# 给于学忠[1]的信

（1936年9月22日）

于主席勋鉴：

两军相处密迩，未能通候，甚以为歉。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兹派彭雨峰[2]君晋谒崇阶，申述敝方联合救国之旨，敬祈不佞赐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专此。

即颂

勋祺。不一。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

[1] 于学忠（1890—1964），山东蓬莱人，当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2] 彭雨峰，即彭雪枫，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

#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9月23日）

已照来电向部队大动员，拥护与庆祝会合胜利，并通知全党全军注意当前的政治任务，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林育英俟朱、张到达界石铺大道即动身来前方。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王稼祥致朱德、张国焘并告贺龙、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 致刘鼎电[1]

（1936年9月23日）

我党与南京谈判条件已交潘汉年带来西安。张学良从中斡旋甚好，迅速达成和平统一，国家民族之福。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

[1] 这是毛泽东致刘鼎电的主要内容。

# 给李济深的信[1]

（1936年9月23日）

国难如斯，非有几个纯洁无私之政治集团及许多艰苦奋斗之仁人志士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中坚，伟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是不能容易达到目的的。

[1] 1936年9月23日，毛泽东致信李济深，希望李济深和李宗仁、白崇禧派遣政治上负责人员来陕，能有专人常驻，沟通情意。这是该信的主要内容。

#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9月24日）

接朱德来电，张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为使胡宗南部不占去先机，请加派有力部队南下交红一军团指挥，增兵界石铺并分兵至隆德、静宁大道游击。至要。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 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1]

（1936年9月24日）

胡宗南部陆续入陕，企图压迫与削弱红军，隔断中苏，隔断东北军与红军，然后强迫我们就范，成立妥协。我们的对策：第一步骤似应集合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南北，给胡宗南以相当打击，使其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第二步骤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以一个方面军控制胡宗南，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一环。至于第三步骤则在占领宁夏之后，那时我们已得远方帮助，处于有利地位，分兵掠取甘西、绥远，乃至重占甘南均甚容易。

红一方面军一师已占领界石铺，红四方面军宜以先头师迅速进入，余部陆续北上。

---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王稼祥致朱德、张国焘、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电的主要内容。

# 复任弼时等电[1]

（1936年9月24日）

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

当前政治的军事的总方针，已为大家所同意，则中央内部的团结已有充分保障无疑。关于统一指挥等问题，正依照你们的提议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王稼祥复任弼时、贺龙电的主要内容。

#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9月25日）

四方面军既向西，应考虑何时由何地策应二方面军北上问题。

[1] 这是毛泽东致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 阻止胡宗南西进确保界石铺[1]

（1936年9月25日）

彭，并告聂：

（一）四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2]，其通渭部队二十四日撤去。据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卫策应一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

（二）但目前阻止胡[3]敌西进仍属重要，十三团已否归还第一师，如未宜先派去加强之，界石铺仍应确保于我手中。此外是否可用一军团主力及八十一师占领固原、镇原线，威胁平凉、瓦亭[4]，请酌复。

（三）二方面军如何动作，我们正考虑与电商中。

毛

二十五日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并告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凉州，旧府名，即甘肃武威。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4] 瓦亭，镇名，位于宁夏固原县南部。

# 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1]

（1936年9月26日）

朱、张：

确息：胡宗南[2]部到咸阳未动，其后续尚未到齐。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3]，不会有严重战斗。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北上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

英　洛　恩　博　稼　泽

二十六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王稼祥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的电报。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3] 隆静会定大道，指甘肃隆德（今属宁夏）、静宁、会宁、定西间的公路。

#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9月26日）

国焘动摇，老总[2]曾有电来表示很不满意，说到漳县与张等开会，但结果仍是西进。其参谋长周子昆电告，部队已动，在通渭者二十四日撤，其部署是经永靖渡河向乐都进。他们有造船工人，据云渡河不成问题。但我所虑者，毛、胡[3]将先据乐都，且将先据永登、凉州，遮断其西进路。所谓一部出中卫策应，恐是空中楼阁。

---

[1] 这是毛泽东致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老总，指朱德。

[3] 毛、胡，指毛炳文、胡宗南。

# 与南京谈判重提国共合作停止内战[1]

（1936年9月27日）

朱、张，徐、陈：

彼方[2]又来电，来着重弟等前电所指地区正作一切准备[3]，兄等二十六日十二时电之估计并非事实。

（甲）与南京谈判系国际指示，南京内部已起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均与以前不同，所以我们重提国共合作，力求停止内战，以便真正抗日，是当前唯一正确方针。恩来准备出去，仍应南京要求，实亦有此必要，因七个月来，往来接洽者均次要代表，非负责人不能正式谈判。

（乙）李毅[4]与我益加接近，杨虎城亦与我们实行停战，李、白[5]有代表来求订抗日协定，华北宋哲元、傅作义、韩复榘均接洽中，马步芳亦有妥协线索，唯马鸿逵坚决反动，我应集力消灭。

（丙）宁夏人口百二十万以上，在西北为最富，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得之老苏区易于巩固，与凉州永登接壤可向甘西发展，与绥

---

[1]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

[2] 彼方，指国民党当局。

[3] 原文如此，疑有错漏字。

[4] 李毅，指张学良。

[5] 李、白，指李宗仁、白崇禧。

远交界便于东进抗日，实政治军事经济国内国际之主要一环，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至祷至盼。

毛　周　彭

九月二十七日

# 四方面军宜迅即北上[1]

（1936年9月27日）

朱、张，徐、陈[2]同志，并致贺、任、刘[3]：

甲、迭接二十六日两电[4]，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地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特将结果奉告如下：

---

[1] 为贯彻关于红军第一、第四两个方面军合力北上夺取宁夏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屡电张国焘等，要其北上。1936年9月18日，张国焘在中共西北局朱德等多数同志的反对下，被迫放弃西进计划。9月22日，张国焘又违背西北局多数同志意见，致电中央，仍主张红军第四方面军先机占领甘肃北部，并于9月26日两次致电中央，告已照西渡黄河计划行动。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发出本电。

[2] 朱，指朱德。张，指张国焘，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和总政治委员。

[3] 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4] 指1936年9月26日12时、22时张国焘等给毛泽东、周恩来等的电报。前电说：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我们决定四方面军即应行动，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将胡宗南向北吸引。现已按此调动，不便再更改，务祈采纳。后电说：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此计划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

乙、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且胡[1]敌因西兰路[2]断怕我夹击，又怕东北军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静宁，拟向天水靠近王均[3]。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4]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5]，次堵击凉兰线[6]，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僻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虑。

丙、因此，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7]，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一方面军目前一面确占界石铺，一面立即出四个团以上通过隆静线[8]，直迫秦安、天水，使胡敌不敢动作，以便四方面军十分安全的北上。

---

[1]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2] 西兰路，指陕西西安至甘肃兰州的公路。

[3] 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

[4] 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

[5] 青兰线，指青海西宁至甘肃兰州的公路。

[6] 凉兰线，指甘肃凉州（武威）至兰州的公路。

[7] 指朱德、张国焘、陈昌浩1936年9月18日发布的关于北上夺取通渭、庄浪、静宁、会宁的战役计划。

[8] 隆静线，指甘肃隆德（今属宁夏）至静宁一线。

务请朱张陈徐四兄顾及整个局势，采纳此方针，亦即九月十八日朱张陈三同志之方针。

丁、请诸兄速决速复。

毛　周　彭

九月二十七日十四时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

# 关于再令四方面军迅速北上致朱、张、徐、陈电[1]

（1936年9月27日）

朱、张，徐、陈：

（甲）中央明令已下，请速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乙）俟得复电，我二师即出庄浪、秦安，一师出瓦、隆、静、界线策应。

（丙）胡宗南之补充旅已由会宁退兰州，会宁城仅留二个连，甚恐慌。有袭占该城可能。胡之余部不敢走西兰大道向宝鸡、天水进，我二方面军足以箝制之。二师出庄浪后，胡更不敢冒进。四方面军现有充分时间进入隆、静、会、定大道，敌无阻止可能。

（丁）兰、凉线虽有五六百里，但沿途人户稀少，粮食不足，且中有大雪山。此为邓发亲历函告者。敌如先占要点，我将遇绝大

---

[1]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四方面军领导人接此电报后，即于当日致电中央，表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并说红四方面军“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决不再改变”。10月9日，四方面军到达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合；22日，二方面军到甘肃省隆德西北之将台堡（今属宁夏）与一方面军会合。至此，二、四两个方面军也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困难。

（戊）请速决速电。

毛　周　彭

廿七日十八时

# 拟令一、二师策应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1]

（1936年9月28日）

彭，并告聂：

甲、朱张来电[2]：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先头师十月四日可到通渭，八日到界石铺[3]。

乙、谍息，胡[4]敌六个团到天水、秦安，六个团在凤翔及天水道上。关师[5]向宝鸡。

丙、我军有策应四方面军北上之任务，拟作如下部署：

一、第二师立即南下，取直径超越隆静大道，相机袭取庄浪、秦安、天水，然后在大道渭水之间向华亭、陇县广大地区纵横游击，成为三个方面军之中间的战略支队。加强其政治工作人员。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并告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指1936年9月27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给中共中央和红军第二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电报说：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合，部队即出动，决不再改变。

[3] 界石铺，村名，位于甘肃省静宁县西北。

[4]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5] 关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

二、第一师在原地区与第二师相呼应。

三、其余任务不变。

毛

九月二十八日二十二时半

# 开办随营学校非常必要[1]

（1936年9月29日）

贺、任、关、刘同志：

甲、二十八日电[2]悉。你们尚保存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

乙、随营学校非常必要，你们所需干部主要靠此供给。我们从前线部队抽出大批高级干部开办红大[3]训练，储为将来之用。林彪为校长，罗瑞卿教育长，陈光、罗荣桓、周建屏、刘亚楼、谭政、周士第、周昆、袁国平、彭雪枫及师团营长百余人均在学习。前四个月专学政治理论，后四个月政治军事并重。此外，尚有造就连排长的普通科六百人，均长征中之优秀下级干部与战士。因此，暂时不能供给你们，但准备于毕业后分配你们一部分。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和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的电报。

[2] 指1936年9月28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关于红军第二方面军状况给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电报。电报说，因远征中经过大小十余次战斗，干部伤亡颇多，请派师团级军政干部若干人来，并决定开办随营学校培养干部。

[3] 红大，指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丙、在四方面军北上条件下，只要你们当前情况许可，应该尽量争取在现地区休息整理扩大。

毛　周　彭

#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9月29日）

回师北上之电敬悉，各同志十分佩服与欢慰。

兄处似宜即用原占通渭部队，日内迅占通渭，以取先机。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告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电的主要内容。

# 力求迅速争取和刘湘建立关系[1]

（1936年10月1日）

刘湘代表如在天津，应留他等候中央代表一同赴川。如该代表要求离津，应从他取得介绍信及各种关系。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刘湘，当时任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国民党军四川“剿匪”总司令。

# 应与国民党军积极建立反日统一战线[1]

（1936年10月1日）

朱、张，徐、陈同志，并致贺、任、关、刘：

据报：静宁骑三师第七团曾派代表到通渭与通渭红军联络，但通渭方面仅估计骑七团派代表来的原因是怕我们打他，因此似未十分积极地与之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我们向兄等建议：发一通知于各部队，对一切白军遇接近时，先由我方试派人员携带要求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而态度诚恳的信件，如彼方先派人来或因同意我方要求派人来接洽，不论其动机仅是怕打或真有合作抗日诚意，我方均一律用诚恳面貌招待他们，以期沟通双方，扩大西北统一战线范围。根据我们十个月经验，红色指战员中如无深切的教育及工作中自己的经验，对于与白军建立统一战线工作是困难的。因为又要打又要和的复杂情况，一般的同志颇不易了解。

毛　周　彭

十月一日十六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等的电报。

#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10月2日）

现全国人心愤激，要求南京抗战，南京亲日、抗日两派争论未决，新事变在酝酿变化中。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的主要内容。

# 二师宜位于硝河城地域[1]

（1936年10月2日）

彭：

胡宗南还在陇县一带。我二方面军将于一星期后转移至渭水以北。据李富春[2]报，宁夏群众很好，马[3]部恐慌，除少数据点外，大部围寨可不战而定，并有抢夺渡船之可能。似此二师宜即位置于硝河城[4]地域，以便待提早攻宁问题决定后，二师调动便利，不致过于疲劳。关于提早攻宁问题，请你提出意见。

毛

二号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

[3] 马，指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防守区（第十五路军）司令兼新编第七师师长。

[4] 硝河城，镇名，位于今宁夏西吉县东南。

# 二方面军渡渭水后的我军行动部署[1]

（1936年10月2日）

朱、张，徐、陈，并致任、贺、关、刘[2]：

甲、关于二方面军的行动，根据他们现处地域的情况和他们本身需要休息的情况，似不宜于在渭水以南单独的打仗。故我们曾对他们提议，侦察渭水渡河情况，并准备在一星期后，作战略的或战役的行动。今据他们一日来电，拟一星期后渡到渭水以北地域，我们觉得是可行的。你们意见如何，请告。

乙、二方面军渡到渭水以北之后，三个方面军均处内线，主要的敌人胡关王毛[3]等军，将首先依据渭水流域构成封锁，然后将我压至陕甘大道以北，再凭大道筑起封锁线来。敌之两个步骤完成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等的电报。

[2] 任、贺、关，指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总指挥和副政治委员。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司令兼第一师师长。关，指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路第十一纵队司令兼第二十五师师长。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三纵队司令。

间大约需两个月左右，如我能合力给敌相当打击，还可延长些时间。从十二月起，我之主力向北开展新局面，二方面军即从内线拒止南敌至明年二月，以后我们进入新的地位，自可使用若干力量打出南面封锁，转向外线活动。

丙、估计胡敌集中以后，如不遇到我们打击，二方面军在大道渭水间是[1]能久停的，那时当然再可以北进一步，即进到固原、镇原、庆阳以南地区。严重的缺点是要与李毅[2]冲突。再则长期停留，给养也较困难。所以在十月、十一月内，似有集中三个方面军全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之必要，但如果四方面军之渡河技术能保证迅速在靖远、中卫地段渡河，则自以早渡为妙，对南敌一般可暂取钳制手段。

毛　周　彭

十月二日十四时

[1] 原件“是”后似漏一“不”字。

[2] 李毅，即张学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毛泽东在陕北》（油画）

# 二方面军宜乘敌尚未全部集中之时迅速转移[1]

（1936年10月3日）

贺、任、关、刘：

胡宗南[2]第一师及七十八师，其三个团已到清水，余六团从扶风、岐山跟进。关麟征[3]四团向宝鸡开，有配合王川各部[4]先向你们攻击之势。你们宜乘胡敌尚未全部集中之时迅速开始转移为佳。转移道路似宜走武山附近，并先以支队附电台从天水附近渡河，向胡敌前进，迫近胡敌，节节钳制，掩护主力转移。如有可能，最好再用一支队附电台留在现地若干时，一面吸引敌人，一面候胡敌后续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和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的电报。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3] 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路第十一纵队司令兼第二十五师师长。

[4] 指国民党军王均部和川军一部。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川军，主要指编为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二纵队的川军第四十一军及第四十五军一部。

六团集中清水时，从清水以东渡河转入华亭、陇县一带，在敌后活动。此两支队均以不少于一个师为适宜。仍望斟酌处理。

毛　周

三号一时

# 四方面军应迅将主力集结马营通渭地区[1]

（1936年10月3日）

朱、张，徐、陈：

甲、九十三师[2]宜迅占庄浪，以后续部队接占通渭。庄浪通渭两处部队均向秦安迫近，掩护四方面军主力北进，并掩护二方面军从天水以西向北转移。五军仍宜照原计划向庄浪进，以增厚东面兵力，因胡宗南[3]已有六团进至秦安、清水，但其后续尚在扶风、岐山道上，估计还要五天至七天才能在清水集中完毕。

乙、会宁城已为我西路支队[4]占领，似此，静宁定西两城以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电报。

[2] 九十三师，指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师长柴洪儒、政治委员叶成焕。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4] 指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政治委员陈漫远率领的由第七十三师1个团和骑兵第三团组成的特别支队。该部于1936年9月中旬与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特别支队相呼应，南下策应红军第四方面军北上，于10月2日凌晨袭占甘肃会宁城。

外，以界石铺、会宁城为中心的大道已控制在我手中。兄处除以一部接替会宁、界石铺大道外，宜迅将主力集结马营、通渭地区，主要注意天水、秦安方面。岷县、临潭部队宜迅速北撤。

丙、武山、甘谷方面宜布置相当兵力，掩护二方面军转移。

丁、因兄处已部署占庄浪，二方面军亦将北上，我二师暂停止于硝河城。

毛　周　彭

三号十二时

#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0月4日）

朱、张来电主张速从靖远、中卫渡河，他们有造船工人，只要木料铁钉。同心城地区有铁匠能打铁钉否？我们准备派铁匠来同心城。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10月4日）

准备即派铁匠至同心城造铁钉。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的主要内容。

# 截断会静定间道路并立即占领庄浪[1]

（1936年10月5日）

朱、张，徐、陈，并告贺、任、关、刘[2]：

甲、为彻底消灭迫近会宁城西南门之敌，请你们令向会静[3]前进之部队即速截断会、静、定西间道路，以便我第一师及守城陈支队[4]明（六）日将敌击溃后全部俘虏之。该敌大约是邓宝珊[5]部一团至二团。

乙、胡宗南[6]先头才到清水、秦安，大部尚在咸阳、清水道上。判断该敌再须十天左右才能全部集中并开始展开。二方面军从六号起以四天行程经天水以西到达通渭。千万请你们派有力一部立即占领庄浪，在通渭、庄浪两地部队均向秦安迫近游击，以确实掩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电报。

[2] 贺、任、关，指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3] 会静，指甘肃会宁和静宁。

[4] 陈支队，指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政治委员陈漫远率领的支队。

[5] 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新编第一军军长。

[6]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护二方面军之到达。

毛　周

五号十五时

# 派人侦察宁夏及绥远等地敌情[1]

（1936年10月5日）

罗迈，宋、宋：

甲、立即派妥人分两次出发（装做生意的），经宁夏直到阿拉善旗达王[2]根据地之定远营[3]，确实侦察该地日本人修建机场、储存飞机情形，该地城堡高厚程度，达王步骑蒙兵数目及宁夏到该地沿途里程、房屋、关隘等情形。

乙、宁夏绥远[4]两处日本人是否已筑飞机场及设特务机关，亦派人专查。

丙、上两项限十一月五日以前报告我。

丁、张心余[5]十一月五日须到定边待命。并请立即函张将他所

---

[1] 1936年9月，中共中央为实现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专门成立了定边工作委员会，从事夺取宁夏的准备工作。这是毛泽东给中共定边工作委员会书记罗迈（李维汉）、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和政治委员宋任穷的电报。

[2] 达王，当时任宁夏阿拉善旗旗长、国民党军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司令。

[3] 定远营，也称定远城，俗称王爷府，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

[4]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5] 张心余，即张德生，中共三边特委书记。

知宁夏至定远营道路、房屋、关隘及定远营之一切情形先期妥报你处。

毛

五号十五时

# 给张学良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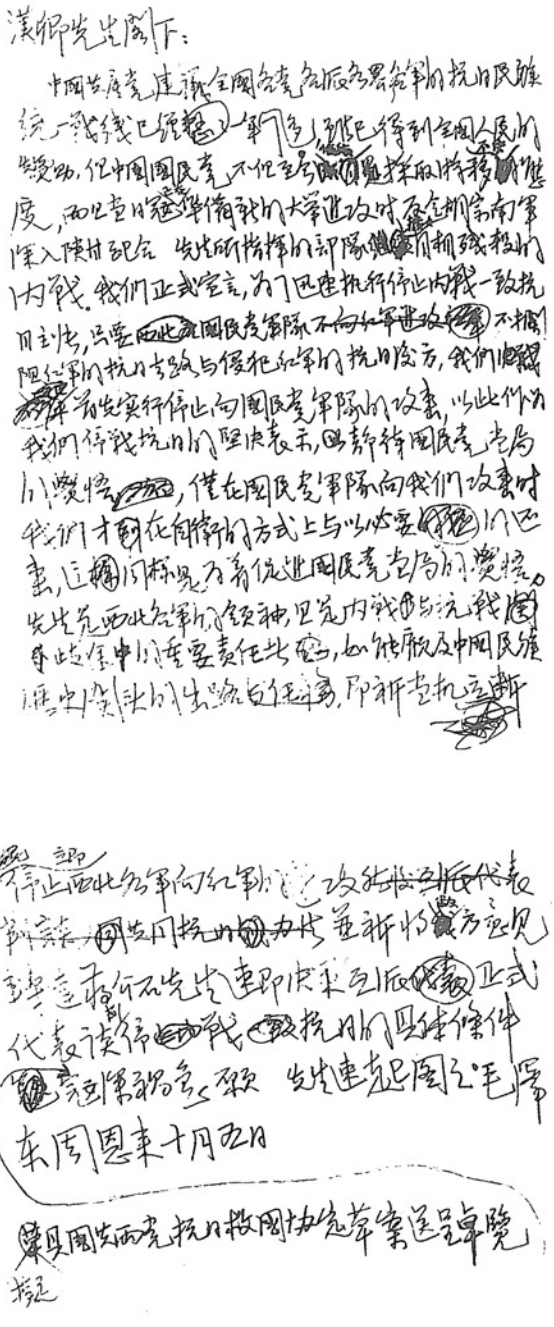
（1936年10月5日）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与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　周恩来

十月五日



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信的手稿。

# 致林育英等电[1]

（1936年10月5日）

红四方面军屡次来电要求你去一次，我们觉得有此必要。请你立即结束现任工作，十月二十日前到达同心城，与朱、张会面，转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党中央新政治决议案日内即送同心城。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致林育英（张浩）并告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10月5日）

同意迅速从靖远、中卫渡河之意见，但甘谷、庄浪仍宜配置必要兵力迟滞胡宗南部，以掩护二方面军北进。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的主要内容。

# 目前不应过分威胁宁夏[1]

（1936年10月6日）

罗、宋：

目前不应过分威胁宁夏，因此东方仍以支队活动为适宜。二十九军亦不宜过早到定边。

毛

六日十时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定边工作委员会书记罗迈（李维汉）和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的电报。

# 对一军团主力行动的意见[1]

（1936年10月6日）

彭，并告左、聂：

甲、四方面军同意我们意见，以一个军到靖远布置渡河，以一部向甘谷、武山间及庄浪活动，掩护二方面军北移。主力位于通渭、马营、陇西、会宁地区，对付胡毛[2]及定西敌。二方面军五号由徽县到天水以南，约九号到通渭。尔后拟令其转至瓦亭、隆德、静宁大道及其以南地区。

乙、在四方面军接替会静段任务后，一军团主力（一二两师）如何行动问题请即提出意见。我意以占领固原城、硝河城、青石咀三点之间地区及其附近，南与二方面军接近为适宜，以便尽量将胡宗南军与东北军向西吸引，利于尔后之机动。如何望即复。

毛

六号十五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并告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军团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

# 集中渭水以北后的行动部署[1]

（1936年10月6日）

朱、张，徐、陈，贺、任、关、刘[2]：

甲、四方面军五号电部署及二方面军从天水以西向通渭转移，我们均完全同意。

乙、我三个方面军在渭水以北集中后，胡毛王[3]三军及东北军均必须从新部署，需要相当时间。尔后，拟四方面军主力仍在通渭、马营[4]、陇西川、会宁、界石[5]地区，一个军相机攻占靖远，布置从靖远以北至中卫段渡河事宜；二方面军拟从通渭再转进至通渭、静宁、隆德、庄浪之间；一方面军之一二两师则将会宁、界石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等的电报。

[2] 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和总政治委员。贺、任、关，指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

[4] 马营，镇名，位于甘肃通渭县西北。

[5] 界石，即界石铺，村名，位于甘肃静宁县西北。

防务交给四方面军后，转至隆、静大道以北固原以南地区，使胡、王、毛、何、王（以哲）[1]各军不得不展开筑碉前进，我则利用时间休息兵力，待十一月即可开始执行新任务。

毛　周

六日十七时

---

[1] 何，指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骑兵军军长。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第六纵队（第六十七军）司令。

# 争取迅速开始与南京主要代表谈判[1]

（1936年10月8日）

朱、张，徐、陈，任、贺、关、刘八同志，德怀同志：

（甲）为确保政治、军事、外交秘密，从今日起用秘字编号发给你们之电，请指定专人翻译，限于你们九同志阅看后立时烧毁。请你们向我们负责，不使任何别人知道。

（乙）第三次与南京联络的代表九月二十日到达广州，二十八日来电称彼方[2]代表北来恐惹人注意，约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复电：

第一，日本新的大举进攻迫在目前，切望南京政府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我方愿以全力相助，万不可再作丧失领土主权之让步，再使全国失望。

第二，立即暂行停止进攻红军，以便双方主要代表谈判。恩来飞赴广州，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

第三，我方宣言，只要彼方不拦阻抗日去路与侵犯抗日后方，红军首先实行停止向彼方攻击，作为我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表示，仅在彼方进攻时我方才在不得已的防御形式下给以必要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彭德怀的电报。

[2] 彼方，指国民党当局。

回击。

（丙）估计南京政府在日本新进攻面前有与我们成立妥协可能，但一面仍以重兵压境，企图迫我就范。我们应争取迅速开始主要代表之谈判，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

洛甫　泽东

十月八日

# 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目前的部署[1]

（1936年10月10日）

宋、宋，并告彭：

甲、高敌双成[2]现无西进模样，敌横山、石湾部队现正积极筑堡垒，因我游击队迟滞之，前进甚缓。如三十军向米横方向活动会引起重新部署，造成对峙，而该地粮困，又不力持久，因之三十军仍以留安、靖边之南清匪与进行赤化为宜。

乙、二十九军于本月半后移铁边城以北清匪就食，逐渐向北转移，月底达安、定、靖边[3]间，以免过早暴露。

丙、同意对二十八军目前部署[4]。

毛

十月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和政治委员宋任穷并告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高双成，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第八十六师师长。

[3] 安、定、靖边，指陕西西北的安边、定边和靖边。

[4] 指宋时轮、宋任穷1936年10月7日8时电报中拟以红军第二十八军西路支队出盐池西南活动7天后再转向西北，其余部队仍担任定边、盐池两县防务的部署。

#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0月10日）

朱、张已到会宁，询问见面人员与地点，中央已复。我们意见，以兄西去就他们为宜。朱、张来电称中央及毛、周、彭，自称西北军委，又一电称执行毛、周、彭所示任务，亦事实上承认我们军委。我们方面曾有两电去，称朱总司令、张总政委，以后即照此种方式解决，以便顺利执行宁夏战役。朱、张以两总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各军作战。为使之增加对于执行军事任务之坚决性，防止可能的动摇性（在目前是防止对宁夏战役之某种可能的动摇），兄须加以特别之注意。

见面时对老问题请一概不谈。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及军事部署致潘汉年、叶剑英电

（1936年10月10日）

开、剑：

甲、张子华二十日到广州，二十八日发一来电，九日收到。据称，陈立夫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乙、二方面军外翼已不利，决集内线，朱、张已到大道。

丙、为执行尔后战略行动之便利，须设法使王以哲驻固原指挥，将何柱国南调，可借二方面军北进调换之。

丁、毅兄[1]主力宜集平凉，在固原不宜置多兵，蒋即有意调固原两师向南，宜即执行于我有利。

戊、抗胡、侯二方面军到通渭后再部署，兄等设法推延时间。

东

十月十日十时

---

[1] 指张学良。

#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

（1936年10月）

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之有加无已，危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保全与民族之生存，一致认为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的。因此，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承认，互矢最大之诚信与决心，一致努力于下列之伟大的政治任务：

甲、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

乙、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丙、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

三、为力求以上政治任务之完成起见，双方同意实行下列各项必要的步骤与方法：

甲、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

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

---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准备由周恩来带去在同国民党谈判时提出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这个协定草案后来没有签订。

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根据地，供给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进行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经过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

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利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奸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并承认以后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之人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丁、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在全中国民主国会未召集与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召集基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之必要，此种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有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之权。

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迅速建立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及由此机关采取真正对日抗战的一切实际军事步骤之必要。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的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

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

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之必要，同时对日本以外之其他国家在不丧失领土主权条件下，应保持友谊并取得其帮助。

四、双方共同承认，为完善地执行本协定起见，两党中央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

五、双方互相承认，两党应忠实地执行本协定所规定之一切原则与事项，但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之独立性。

六、在本协定的原则下，双方得订立关于许多个别问题之协定。

七、本协定在双方代表签字互换后发生效力。

八、本协定之修改须得双方之同意。

# 致潘汉年、叶剑英电[1]

（1936年10月）

张子华[2]来电称，陈立夫[3]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曾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

[1] 这是毛泽东致潘汉年、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张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

[3] 陈立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

# 致左权等电[1]

（1936年10月11日）

同哥老会建立统一战线，是在争取其中优秀的分子及扩大群众参加抗日，并利用它进行白区白军工作；而不是在苏区内另外给哥老会组织团体与军队，扩大与加强它在苏区内的影响与力量，造成我们自己工作中的困难。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左权、聂荣臻、刘晓、李富春、李维汉、宋时轮电的主要内容。

# 红军政治工作的问题[1]

（1936年10月11日）

红军的政治工作在克服长征中的疲劳现象，提高政治情绪上有成绩。应特别注意干部教育，在这方面过去有成绩，也有很多经验，主要是：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教育课少而精。

政治工作的方式要有计划性、纲领性和灵活性，既要集中统一，又要有伸缩性，注意各地方、各时期、各部队的差别，要适应游击战争的特点。整个红军教育，包括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纪律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我们的干部政策：第一，是信任干部，对干部应用之不疑；第二，对个别干部的错误，不应扩大化，应帮助他彻底解决问题；第三，尊重地方干部，他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第四，注意对干部进行政治教育。我们的干部标准是：第一执行党的路线，第二能与群众联系，第三有独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党的纪律。

---

[1] 1936年10月11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红军政治工作问题。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指出了红军的政治工作成绩，总结了政治工作在干部教育方面的经验。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的主要内容。

# 征求对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意见[1]

（1936年10月11日）

朱、张，徐、陈，任、贺、关、刘，彭九同志：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电达，请你们提出意见。此草案是我方起草，准备恩来带往谈判。彼方所能容纳之最后限制，尚不详知。

洛甫　泽东

十月十一日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彭德怀的电报，向他们征求对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意见。

# 致彭德怀等电[1]

（1936年10月13日）

九月二十三日小平同志来信，及一军团党务委员会的决议，我们完全同意。盼你们坚持这种方针，深入干部中去，从根本上转变工作作风，与发展思想上的斗争，教育干部，将干部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是执行一切政治军事任务的决定一环。

[1] 这是毛泽东和杨尚昆致彭德怀、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 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1]

（1936年10月13日）

彭：

甲、吊堡子到打拉池、到硝河城若干里，会宁到打拉池、硝河城到打拉池若干里。

乙、已电询朱张[2]何时到打拉池。

丙、二方面军大约七天内到单家集、硝河城之线。

丁、请按照十月作战纲领[3]准备，作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出于军委。

戊、请准备派一负责人（聂鹤亭[4]如何）带电台或用陈漫远[5]电台到黄河边，参加朱张所派之一个军造船与部署渡河战役之指导事宜。

己、一二两师本月底须集中固原以北，以便全野战军集中训练至少半个月，预先准备粮食。

庚、充分注意个别同志之可能的动摇性。准备在无别部参加时，野战军单独执行冰期计划[6]。

辛、中日形势极度紧张，汤恩伯[7]奉蒋令集中候命援绥[8]。

毛

十三日十七时

[1] 这是毛泽东就制定宁夏战役计划纲要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准备12月利用冰期过黄河占领宁夏，打开西北合作抗日的新局面。为贯彻这一计划，10月11日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对夺取宁夏的各项准备和各部任务作了具体部署。

[2] 朱，指朱德。张，指张国焘，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

[3] 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36年10月11日下达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其内容是：

甲、根据目前敌我情况，为着集中一切力量克服困难条件，完成基本作战任务起见，十月份作战纲领拟定如次：

乙、四方面军以1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11月10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10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丙、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线以南，威胁胡敌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之防御任务。

丁、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固原、同心城间之枢纽地段及豫旺城于手中。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待二方面军到达静隆线后，北上归还建制。第一师及陈支队暂在黄河海原间威胁与抑留于学忠部，使不敢东进，尔后逐渐西移归还主力。二十八、二十九两军，集中定盐地域，一部逼进灵武，准备居民条件完成侦察任务。独四师确保环曲苏区，其余东方部队任务不变。

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

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己、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11月10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击准备。

庚、11月10号前各部注重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的执行新任务。

辛、宣传鼓动以庆祝会合，消灭拦阻红军抗日去路扰乱抗日红军后方之敌，争取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寇侵略中国，为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等口号为中心，不提宁夏任务以免泄露。

壬、本纲领依情况变化得部分修正之。

癸、本纲领不得下达，各部任务由朱张两总及各方面军首长以个别命令行之。

[4] 聂鹤亭，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参谋长。

[5] 陈漫远，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政治委员。

[6] 冰期计划，即红军准备在1936年乘结冰期过黄河，消灭国民党宁夏军阀部队，占领宁夏的计划。

[7]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

[8] 指援助当时绥远省（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军民抵御日本侵略的抗战活动。

# 复彭德怀电[1]

（1936年10月14日）

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张国焘及其他干部不可求善太急。我们政策应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使他们逐渐进步，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周恩来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 关于已向南京提出四项意见致叶剑英电

（1936年10月14日）

剑：

甲、迟延胡宗南进攻，使我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保持西兰大道于手中，以便二、四方面军休息整理，顺利执行新任务。

乙、已向南京提出：第一，日寇进甚急，我方愿以全力为助，希望宁方坚持民族立场，不作任何丧权让步。第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攻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力抗日。第三，欲图和议谈判早日实现，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若一面进攻一面谈判，似无此理。第四，在进攻未停止、恩来未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进行初步谈判，此项请告毅[1]并转年[2]。

丙、年何日去沪，毅何日赴宁？

东

十月十四日十六时

---

[1] 指张学良。

[2] 指潘汉年。

# 当前形势与扩大停战抗日运动[1]

（1936年10月15日）

朱、张，徐、陈，任、贺、关、刘，并告彭：

（甲）现中日关系极度紧张，日帝在上海及长江沿岸增兵增舰，甚至提出驻兵海南岛的要求。意在引导全国视线注意华中、华南，压迫南京政府屈服，诱致英市[2]让步，以便实现华北五省自治与进占绥蒙的根本计划。据驻归绥日本特务机关宣称，绥远地处特殊，日本志在必得，现察北，内蒙李守信、王英等部，已重新武装二三万人，日本派大批军事顾问随军，其前锋已入绥境，与绥远军队已发生前哨战，正式接触即在目前。晋绥军已有一部开往绥东，汤恩伯队亦奉蒋密令，准备开绥抗战，万耀煌师在洛阳布置防御工事。蒋并密令粤军调集沪抗战，湘军调集平汉线，蒋似有以重兵保长江流域及黄河以南，而于晋绥实行局部抗战意。

（乙）我们为抓紧目前有利时机扩大停战抗日运动，除以送致公开函给国民党并去电要求停战谈判外，现拟以红军各将名义发布致西北各军，重申请其立即停止内战出兵援绥，并表明红军愿作前驱，以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此文件苏区发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并告彭德怀的电报。

[2] 原文如此，疑有错漏字。

布后，拟向我周围白军白区进行广大的停战抗日运动，以响应和援助可能发动绥东的抗战，现请二、四方面军将现在各军师长政委姓名电告，以便列入在内，以广宣传，以壮声势。兄等有何意见，亦请电告。

洛　泽　博

十月十五日午

# 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谈话[1]

（1936年10月15日）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现已发布命令：

（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为；

（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

（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

（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举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

吾人已决定再行恳切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该项申请书已在草拟中。目前察晋绥三省形势，已属危急万状。吾人极愿与南京政府合作，以达援绥抗日救亡图存之目的。如南京政府诚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

[1] 这是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名义通过苏维埃新闻社发表的谈话。

# 目前我军应坚持休整与迟滞敌人前进的方针[1]

（1936年10月16日）

任、贺、关、刘，并致朱、张[2]：

甲、十四日电悉。二方面军进至单家集、硝河城[3]线后即可开始休息整理。该地区比较丰富，待一方面军执行新任务时接替对南防御任务，亦当有休息机会。

乙、我三个方面军目前应以休息整理蓄积锐气准备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为基本方针，对敌采迟滞其前进方针。判断在敌情地形等条件下可能达此目的。即使船渡不成，我亦应坚持此方针，方于尔后行动有更大利益。

毛　周

十六日二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总指挥贺龙、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和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等的电报。

[2] 朱，指朱德。张，指张国焘，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

[3] 单家集、硝河城，均位于今宁夏西吉县东南。单家集，今作单民。

# 红四方面军情况和中央的方针[1]

（1936年10月16日）

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能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工作怎样做？第一，任命他为前线指挥；第二，张浩（林育英）同志去的任务主要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关于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的。但如说到时应指出：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另一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路线的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因为就其整个历史来说，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还有一点，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误，那是应与之作斗争的。

---

[1] 1936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育英（张浩）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就林育英去红四方面军问题，讨论了红四方面军情况和中央的方针。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 国民党提出的谈判条件[1]

（1936年10月17日）

朱、张，徐、陈，任、贺、关、刘，并告彭：

（甲）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势，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十四日回西安，携带来国民党条件如下：

（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

（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

（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

（四）即派人具体谈判。

（乙）蒋介石十六日到西安，我们正交涉由蒋派飞机到肤施接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

（丙）为根本停止胡宗南进攻或延缓其进攻期，请你们速将十五日泽东谈话大批印刷，多数小支队直接送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胡宗南、朱绍良，另由向前写信给胡，内附泽东谈话，派专人由静宁送胡（静宁已由胡部接防）。如何，盼即复。

洛　泽　周

十七日十六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并告彭德怀的电报。

# 为徐向前[1]起草的致胡宗南信

（1936年10月18日）

宗南学兄军长勋鉴：

黄埔一别，忽已十年，回念旧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迫，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亟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敝部已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对于贵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仅在贵军攻击时取自卫手段，一切问题均可商洽，总以和平方法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贵军也，国难当前，实不欲自相残杀，伤国力长寇焰也；如不见谅，必欲一战而后快，则敝方部队已有相当之准备，迫不得已当立于自卫地位给予必要之还击。敝方各军仅为抗日之目的而斗争，深愿与贵军缔结同盟，携手前进。蒋[2]校长现已大有觉悟，甚为佩服。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我全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当在今日。吾兄高瞻远瞩，素为弟所钦敬，虽多年敌对，不难一旦言欢。兹特遣使携函征求吾兄高见，倘蒙惠予采纳，即乞停止贵方军事行动，静候敝党中央与蒋校长及贵党中央

---

[1] 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当时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

[2] 蒋，指蒋介石，曾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之谈判。如承派员驾临，敝部自当竭诚欢迎。时危祸急，率尔进言，叨在同门，知不认为唐突也。专此。顺叩
戎绥！

学弟　徐向前　手上
十月十八日

# 当前统一战线形势[1]

（1936年10月18日）

朱、张，并告彭，贺、任，徐、陈：

我党致国民党书已在全国各地及国民党军队中发生极大影响，得到国民党中及各阶层中广大同情。日本侵略日亟，亦不能不影响国民党军队之干部。我三个方面军集中，彼等又有所畏惧。正与国民党谈判，彼方当有不欲使谈判弄僵之意。张[2]本拟飞宁面蒋，请允蒋使入苏区调停，蒋复日内来陕，主要为对我对日两事。昨日胡、王、关、毛、沈、李、曾、唐[3]各蒋系将领联名电蒋、张，以交通阻滞运输困难为词，拟先从改善给养运输着手，亦似有不欲迫我过急，延缓前进之意。李旺堡白团经双方接洽，李毅演假进攻，我把白团放出了事。汤恩伯准备援绥抗日，南京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总观各方情况，目前时局正处在转变交点，我应不失时机，善于运用，争取国内和平，转向对日抗战。请照昨电意旨由朱总司令致书王均、毛炳文，向前同志致书胡宗南及其他黄埔生，贺龙同志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给朱德、张国焘并告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

[2] 指张学良。

[3] 指胡宗南、王均、关麟征、毛炳文、沈克、李默庵、曾万钟、唐淮源。

致书何柱国各部及胡部，发展我们影响。书中一本诚恳相劝之意，不作任何自夸语，自能发生效力。一面严整壁垒，提高士气，立于不败之地。办理情形望复。

洛　毛　周

十月十八日十五时

#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0月19日）

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二十号开始渡河，朱德、张国焘二十号去打拉池。红四方面军有残废干部及老弱幼孩等六百四十人，由余洪远率领来同心城，请处理并发动慰劳。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鲁迅逝世发出的电报

（1936年10月20日、22日）

## 一　致许广平的追悼鲁迅先生的唁电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转许广平女士鉴：

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全国震悼。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仅以至诚电唁，深信全国人民及优秀之文学家能继续鲁迅先生之事业，与一切侵略者、压迫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达中华民族及其被压迫的阶级之民族和社会的彻底解放。

肃以电达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

## 二　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

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

的巨星鲁迅先生陨落于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拨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对于鲁迅先生的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鲁迅先生的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锐〈锋〉、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和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的一切文学，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的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失败；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茨基派想用甜言蜜语来离间大众的阵线，但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痛击。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巨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起见，决定在全苏区内：（一）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十万

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已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南京国民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及全世界拥护和平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人士，一致起来要求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南京国民政府执行上列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尤其是文学界，一致起来继续鲁迅先生光荣的事业，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为中国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十月二十二日

## 三　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南京国民党政府公鉴：

噩耗传来，鲁迅先生病殁于上海。我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上的权威、文坛上最灿烂光辉的巨星竟尔陨落，此乃我中华民族之大损失，尤其是当前抗日运动的大损失。鲁迅先生毕生以犀利的文章、伟大的人格、救国的主张、正直的言论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其对于我中华民族功绩之伟大，不亚于高尔基氏之于苏联。今溘然长逝，理应予以身后之殊荣，以慰死者而示来兹。敝党敝政府已决定在全苏区内实行：（一）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与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十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在中央政府所在地设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贵党与贵政府为中国最大部分领土的统治者，敝党敝政府敬向贵党贵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收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贵党贵政府所颁布的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之法令。表扬鲁迅先生正所以表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敝党敝政府的要求，想必能获得贵党贵政府的同意。特此电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 给叶剑英、刘鼎[1]的信

（1936年10月22日）

剑、鼎二兄：

经济甚紧，外面用费须节省又节省，千万不可过费。无论何时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别人的馈赠。只有到了万不得已时，才允许向别人借一点钱用，日后如数归还。一切用费均须报账。因近日接连发生几件浪费事，故向二兄指出此点。并请向雪枫[2]、理治[3]及其他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随时提出对此问题的警觉。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

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4]

---

[1] 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刘鼎（1903—1986），四川南溪人，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做联络工作。

[2] 雪枫，即彭雪枫（1907—1944），河南镇平人，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山西、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

[3] 理治，即朱理治（1907—1978），江苏南通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驻东北军的特派员。

[4] 艾思奇（1910—1966），云南腾冲人，当时是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编辑。他的《大众哲学》是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著作。

的《大众哲学》，柳湜[1]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请你们写一个带分析性与综合性的报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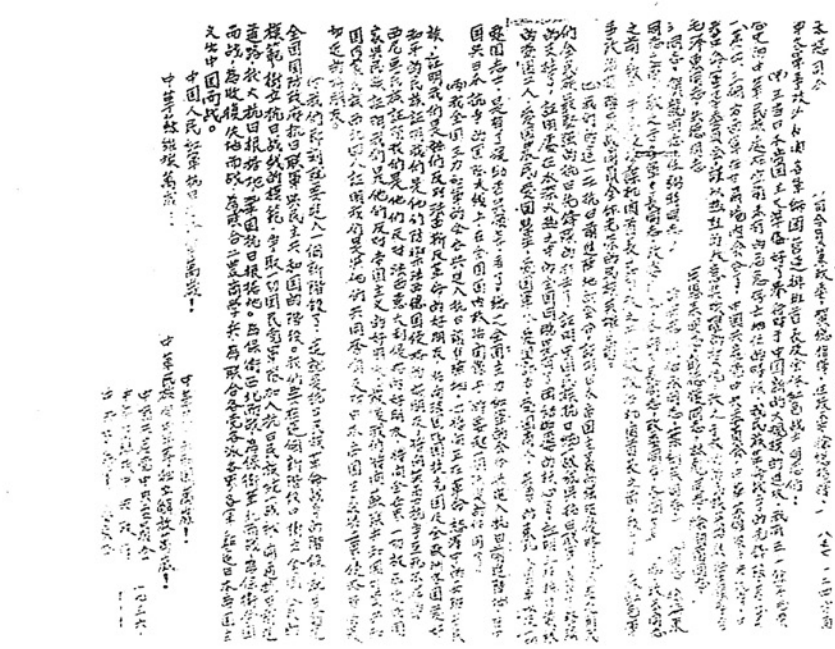
润之

十月二十二日

[1] 柳湜（1903—1968），湖南长沙人，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汉口、重庆等地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工作，曾任《读书生活》《生活日报》《全民抗战》等报刊编委、主编。《街头讲话》是他写的一本介绍社会科学知识的大众读物。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图为三军会师的会宁县城城楼。


中央為慶祝一二四方面軍
大會合通電

中共中央为庆祝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通电。



《三大主力会师》（油画）

#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0月22日）

会谈时请首先注意宁夏战役的准备与部署问题，关于如何夺取定远营，如何克服城堡困难及如何接取远方货物等，均须注意，并以商定结果见告。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彭德怀转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 给彭雪枫的信[1]

（1936年10月22日）

急须将与绥晋关系弄好，得信后即赴津迅速转至绥远办理此事。我有付南汉宸一信，要求他介绍你见傅作义。

交涉要诚恳，要机警，要有耐性。专作上层交际，不与党的组织相关涉，不要引人见疑。

如傅[2]同意，待绥远办好后，请傅介绍见阎[3]，不同意则罢，你的工作以傅为主。

用费从带去之四百元中开支，十分节省用，不要爱奢华，不要失掉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人家的馈赠，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许可从人家借一点钱，日后如数归还，用数要报账。有闲工夫注意看书报，加紧学习。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雪枫信的主要内容。

[2] 傅，指傅作义。

[3] 阎，指阎锡山。

# 给刘少奇的信[1]

（1936年10月22日）

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同盟[2]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

三个方面军已全部在西兰大道会合，内部已基本上统一团结。玉阶、特立[3]任前线指挥，在中央与军委决定之下行动。二、四方面军均保存了基本力量并比前进步，一方面军亦加强了。

---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信的主要内容。

[2] 民族革命同盟，即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由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于1935年7月在香港建立的抗日反蒋团体，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基本政治主张。

[3] 玉阶、特立，指朱德、张国焘。

# 关于对阎锡山的态度
# 致叶剑英、刘鼎电

（1936年10月23日）

剑、刘：

经过李毅或另设他法向阎锡山表示下列各点：

一、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这种决心与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将竭力以全力以为之助。

二、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

三、只要晋绥当局真正抗日，而不与日本妥协，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冒然向晋绥开进。

四、在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

五、某方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

东

十月二十三日十六时

# 同意彭德怀宁夏战役计划[1]

（1936年10月24日）

彭，并致朱、张，贺、任，徐、陈：

甲、同意二十三日九时电[2]之计划。

乙、胡毛王关[3]业占大道[4]，如继续北进，而地形、给养条件又可能给以基本限制，则我处南北两敌[5]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的电报。

[2] 指1936年10月23日9时彭德怀关于宁夏战役的部署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宁夏战役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主力占领黄河沿岸，以第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攻击中卫，牵制马鸿逵。第二步渡过黄河，控制宁夏门户，以一部兵力袭占定远营，相机攻占宁夏省会。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关，指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路第十一纵队司令兼第二十五师师长。

[4] 指陕西西安至甘肃兰州的公路。

[5] 南敌，指从会宁、静宁至隆德、固原一线由南向北进攻红军之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各部以及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等部。北敌，指沿黄河一线布防之马鸿逵、马步青和邓宝珊等部。

北。现虽有各种材料判断，南敌不能持久，但蒋介石在短期内拼命一干之可能仍是有的。因此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丙、前电各项请即复。

毛

二十四日二十四时

# 击破南面之敌的部署[1]

（1936年10月25日）

朱、张，彭，并致贺、任，徐、陈[2]：

甲、根据敌向打拉池[3]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两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

乙、因此，部署应如下：

（一）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头卢塘、三眼井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

---

[1] 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对夺取宁夏的各项准备和各部任务作了具体部署，决定以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和第四方面军3个军进攻宁夏。20日，国民党军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等部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歼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界地区。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等，提出红军先行击破南敌，然后再集中向北。

[2] 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和总政治委员。

[3] 打拉池，村名，位于甘肃靖远县东部。

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1]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攻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

（二）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三个军。二方面军除派赴七营[2]部队外，尚余其主力。对南敌不须多加抵抗，如在若干天内逐渐集结于打拉池南北地区，对敌则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对我则构筑阵地，鼓励士气，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

（三）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3]、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属之，迅速造船准备渡河。

（四）在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之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敌。如何盼复。

毛　周

十月二十五日

---

[1] 定远营，也称定远城，俗称王爷府，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

[2] 七营，村名，位于宁夏固原北部。

[3] 金积，旧县名，1960年撤销，辖区裁入宁夏吴忠、青铜峡二市。

# 给傅作义的信

（1936年10月25日）

宜生先生主席勋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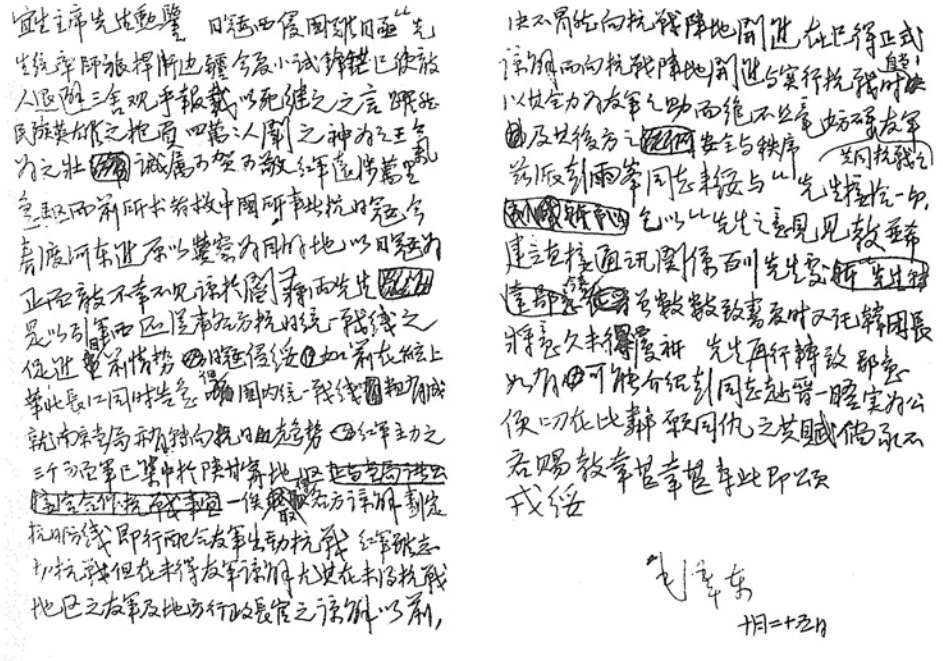
日寇西侵，国难日亟。先生统率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抗日统一战线之促进。目前情势，日寇侵绥如箭在弦上，华北长江同时告急。但国内统一战线粗有成就，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红军主力之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红军虽志切抗战，但在未得友军谅解，尤其在未得抗战地区之友军及地方行政长官之谅解以前，决不冒然向抗战阵地开进。在已得正式谅解而向抗战阵地开进与实行抗战时，自当以其全力为友军之助，而绝不丝毫妨碍共同抗战之友军及其后方之安全与秩序。兹派彭雨峰同志来绥，与先生接洽一切，乞以先生之意见见教，并希建立直接通讯关系。百川先生处，今春曾数数致书，夏时又托郭团长将意，久未得复，祈先生再行转致鄙意。如有可能介绍彭同志赴晋一晤，实为公便。叨在比邻，愿同仇之共赋。倘承不吝

赐教，幸甚幸甚。专此。即颂

戎绥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致傅作义信的手稿。

#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0月26日）

（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二）目前以打击胡敌、夺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三）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又失时机。（四）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五）一方面军速集结同心城休息。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 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

（1936年10月26日）

蒋总司令，张副司令，阎主任，傅主席，杨主任，朱主任，于主席，宁夏马主席，青海马主席，陈总指挥，王治平军长，胡军长，毛军长，王鼎方军长，董军长，何军长，孙军长，冯军长，汤军长，萧军长，高培五军长，高双成军长，邓军长[1]，暨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师旅团长公鉴：

我苏维埃红军自去年八月发表宣言，提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以来，转瞬一年多了。这一年间日寇的侵略有加无已，国土日蹙，国势日衰。现在日寇的凶焰益张。华北分离，绥宁沦亡，已经迫在目前。即长江沿海亦莫不敌船云集，蠢蠢欲动。亡国灭种的条件，接连提出。亡国奴的命运威胁着全中国人民。和平久已绝望，牺牲是无可幸免。局势至此，非抗战不足以图存，已为全中国人民所共信。全中国人民今日所仰望于贵党政府的，是领导抗战，驱除日寇。但直至今日，我们犹未闻贵党政府下最后决心，反而见蒋总司令亲临西北，督“剿”红军。这不能不使全国人民失望，不能不使日寇称快。

---

[1] 这里依次指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傅作义、杨虎城、朱绍良、于学忠、马鸿逵、马步芳、陈诚、王均、胡宗南、毛炳文、王以哲、董英斌、何柱国、孙蔚如、冯钦哉、汤恩伯、萧之楚、高桂滋、高双成、邓宝珊。

时至今日，贵党政府犹欲以捣乱抗日后方加罪于苏维埃和红军吗？诸先生亲在西北，应知真相。红军自去年北上后，即向四周各军倡议停战抗日。今春借道过晋，屡屡声明系东向抗日，又不蒙蒋阎两先生见谅，只得半途折回，另辟途径。现在全国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会合于西北，正拟与诸先生所部共赴国防前线，合力抗战。乃蒋先生忽于绥东告急大祸临头之际，不加调兵力增援绥远，反而派来甘肃进攻红军。这是谁来捣乱抗日后方？难道中国可亡，日寇可以听其长驱直入，惟独愿意抗日的红军非扑灭之不止吗？恐怕红军未灭，日寇已来，诸先生纵欲继续内战，全中国的人民，诸先生的部下，也决不会再让诸先生自相残杀了吧！

虽然蒋先生声势汹汹，扬言聚歼红军，但我们认为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故苏维埃及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谓："（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行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帮助。"依此命令，红军前线各部迄未向诸先生的部队作激烈的抗击，且逐步退让，以期诸先生的自觉。但是如果诸先生以为这是红军的示怯，那末未免大错。在十年对垒之中，为民族、为自由、为正义而战的红军的士气与战斗力，诸先生中不乏身受其教训者。现在集全国精锐于一处，用以抗击诸先生的师出无名和内部充满停战抗日情绪的部队，胜负之数，即诸先生亦当了然。

我们敢以军人的坦白与热忱敬告诸先生：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即

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我们现更代表全中国红军负责宣言：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你们合作到底。在抗日战线上，红军愿担任一定的战线，保证一定任务的完成；在作战指挥上，红军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在不得抗日友军的同意，红军决不开入抗日友军的防地。

民族危机已到最后一刹那了。内战还是抗战，决定的关键是操在诸先生手里。全中国人民所希望于诸先生的是奋起抗战的民族英雄，不愿诸先生继续内战成为民族罪人。尤其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抗战发动得早，是中国民族的大幸。即万一不蒙诸先生采纳，我们亦必以千回百折赴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热诚地盼望诸先生给我们满意的回答。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

我们深信，绥东抗战一起，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地联合起来，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中国而战，为收复东北失地而战。

致以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朱　德　张国焘　周恩来

彭德怀　林　彪　贺　龙　任弼时

徐向前　陈昌浩　王稼蔷　刘伯承

叶剑英　徐海东　萧　克　罗炳辉
董振堂　杨尚昆　关向应　左　权
聂荣臻　程子华　张云逸　罗瑞卿
陈伯钧　王　震　张子意　陈再道
王宏坤　黄　超　孙玉清　陈海松
程世才　李先念　周纯全　周子昆
李卓然　何　畏　王维舟　阎红彦
陈光〈先〉瑞　　周　昆　袁国平
宋时轮　宋任穷　朱　瑞等同启

十月二十六日

# 致彭德怀等电[1]

（1936年10月28日）

甲、胡敌以我避免决战，十分轻我，向打拉池锐进，王、毛[2]向靖远进。乙、我三个方面军主力应依兄等二十七日部署，立即集结在有利阵地，在数日内坚决突击消灭胡敌先头一个师至两个师，以小部抗阻靖远王、毛。丙、九及三十军速复河岸西向中卫、定远营扫荡前进。丁、此是消灭敌人开展局势最适当之时机，请兄等速图之。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彭德怀、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2] 王、毛，指王均、毛炳文。

#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10月28日）

完全同意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彭德怀同志俭日七时之海打战役战略计划[2]，望各兵团首长动员全体红色指战员下最大决心，努力争取整个战役的全部胜利，开辟今后伟大的战略胜利之途径。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电的主要内容。

[2] 指彭德怀10月28日提出的在海原、打拉池地区打击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战役计划。

# 对胡宗南部作战的部署[1]

（1936年10月29日）

彭：

与南敌决战，关系重要。现敌轻我锐进，胡[2]敌先头又是郭华宗[3]旧部周孔[4]两师，打得好可获大胜。我有如下提议：

甲、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人手里。

乙、以野战军[5]全部为主力，从二方面军抽二分之一辅助之，

---

[1] 这是毛泽东给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10月下旬，国民党军乘红军主力准备宁夏战役之机，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歼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界地区。胡宗南部先头向海原、打拉池之间急进，左翼毛炳文、王均两路均向靖远猛进。中共中央军委为阻止南敌追击，遂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组织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胡宗南部。1936年10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复完全同意彭德怀提出的海打战役计划。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3] 郭华宗，1931年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三师师长，率部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时，曾受到红军第一方面军打击。

[4] 周，指周祥初，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孔，指孔令恂，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九十七师师长。

[5] 野战军，指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

专打周孔两师。四方面军为右翼钳制队，或任右翼之部分突击，专对付胡之西路及毛王[1]两路。

丙、以二方面军二分之一替换七营[2]、同心城等处任务，使一方面军全部集中。

丁、需有充分之准备，须召集贺任、左聂、徐程[3]开会，部队要有充分之休息与鼓动。

戊、实行打时要在有利之地形条件下，首战限于打两个师，并首先消灭其一个师。不合此条件时再退一步，总以胜仗为目的。

毛

[1] 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

[2] 七营，村名，位于宁夏固原县北部。

[3] 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左聂，指左权、聂荣臻，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徐程，指徐海东、程子华，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

# 打击胡敌周孔两师之部署[1]

（1936年10月30日）

彭，贺、任，左、聂，徐、陈，并朱、张：

甲、情况：

（一）蒋[2]以我军大部西渡，东岸所余不多，令胡[3]敌猛追。

（二）胡令周、孔[4]两师经过红羊场向打拉池[5]急进，其军部退回静宁[6]，一师停止于平峰镇，仅派一部为追击队，昨到红羊场。

（三）关[7]师向靖远[8]追击，毛[9]各尚其后，似不会全部北进。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组织海打战役期间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人的电报。

[2] 蒋，指蒋介石。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一路军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4] 周，指周祥初，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一路军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孔，指孔令恂，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一路军第二纵队第九十七师师长。

[5] 打拉池，村名，位于甘肃省靖远县东部。

[6] 静宁，县名，在甘肃省东部

[7] 关，指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三路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兼第二十五师师长。

[8] 靖远，县名，在甘肃省白银市东部。

[9] 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一路军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

（四）何[1]令白[2]骑兵师三十日随胡军右翼相机追击。该师主力控制阳明堡，一部晏家窎，准备增援白师。朱敌与我二、四方面军均经[3]，去向已明，唯一方面军是否渡河不明。

乙、据以上情况，给我以打周、孔两师之极好机会。对周、孔右翼之白师须以二方面军有力部队扼阻之。

丙、三十一军必须遵彭[4]令由西向东打。

丁、三十二军附电台每日与周、孔两师接触，务不失联络，吸引之向打拉池或西安州行进，贺、任[5]即率三十二军，密码呼号等送彭，并使之直接通电。

戊、打拉池、西安州为我军尔后宁夏战役之屏障，万万不可失，深望注意。

毛　周

三十日二十二时

---

[1] 何，指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骑兵军军长。

[2] 白，指白凤翔，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骑兵军第六师师长。

[3] 原件如此，似有缺漏字。

[4]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5] 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 先打胡宗南后攻宁夏[1]

（1936年10月30日）

朱、张：

目前方针，先打胡[2]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二十九日部署[3]使用，一战而胜，则全局转入佳境矣。

毛　周

三十日十六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的电报。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3] 指1936年10月29日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发布的关于各兵团集中协同消灭胡宗南部的命令。命令说：“胡宗南向打拉池，毛炳文、王均向靖远前追甚急，我三个方面军主力有协同消灭胡宗南一两个师，迟滞毛炳文、王均之任务。红军各部应于三十一日前集中完毕。第一方面军在古西安州、关桥堡、麻春堡一带集结；第四方面军第四军应注意在打拉池以南设置钳制阵地，第三十一军在打拉池以东集中，准备靠拢第一方面军从东向西侧击北进之敌。”

# 致林育英电[1]

（1936年10月30日）

一、目前方针是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二、你与朱、张略谈后即转二方面军，提高其士气，再转朱、张处。三、对张态度不对，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诚意相处，避免硬化。

[1] 这是毛泽东致林育英（张浩）电的主要内容。

# 致彭德怀等电[1]

（1936年10月30日）

蒋介石以我军大部西渡，东岸所余不多，令胡宗南猛追。胡令周祥初、孔令恂两师向打拉池急进。关麟征师向靖远追击，毛炳文、王均部尾其后，似不会全部北进。何柱国令一骑兵师随胡军右翼相机追击。据以上情况，给我们打周、孔两师的极好机会。对周、孔右翼的骑兵师须以红二方面军有力部队拦阻之。红三十一军必须照彭令，由西向东打。

打拉池、西安州为我军尔后宁夏战役之屏障，万不可失，深望注意。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 给许德珩[1]等的信

（1936年11月2日）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2]，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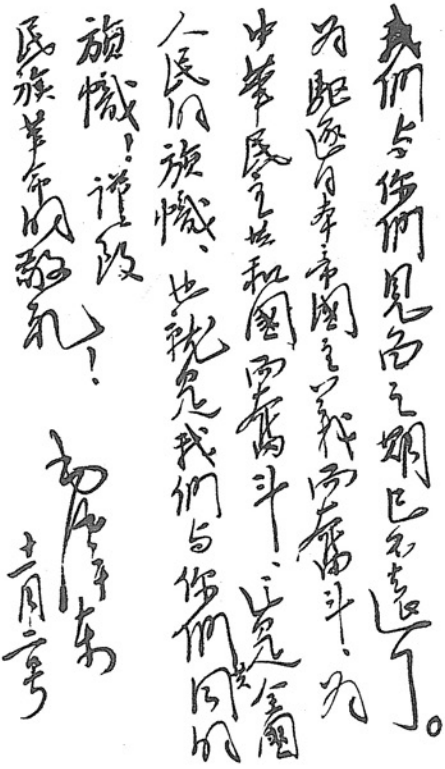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一月二号

---

[1] 许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193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与马叙伦、杨秀峰、张申府、程希孟等教授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四、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四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2] 1935年底，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得悉毛泽东已到达陕北，买了30多双布鞋、12块怀表和十几只火腿，委托中共地下党的徐冰、张晓梅设法转送到陕北。



毛泽东致许德珩等信的手稿。

# 关于过河部队的行动问题致朱德等电[1]

（1936年11月3日）

朱、张，徐、陈：

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2]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动。

毛　周

二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朱德、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电报。

[2] 一条山，镇名，今为甘肃省景泰县县治。五佛寺，村名，位于甘肃省景泰县东北。

# 关桥堡地区作战应依实况决定[1]

（1936年11月3日）

彭：

甲、本日情况：

（一）丁德隆师[2]尚在种田沟、吴家庄，明（四）日向干盐池进。

（二）关麟征马鸿宾[3]奉令开石咀子。

（三）第一师在新营、王家河集结。

（四）刘翰东熊正平[4]两师奉令维护海郑[5]交通，一个师驻脱烈堡。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丁德隆，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七十八师师长。

[3] 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路第十一纵队司令兼第二十五师师长。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四纵队司令兼第三十五师师长。

[4] 刘翰东，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第六纵队第一〇七师师长。熊正平，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第七纵队第一一五师师长。

[5] 海，指今宁夏海原。郑，指郑旗堡，村名，位于今宁夏海原东部。

（五）毛王[1]尚在靖远以南。

（六）骑十师不明。

（七）周祥初[2]由海原向关桥堡[3]，孔令恂[4]师由西安州向关桥堡。孔师后梯队原系第一师之李旅[5]，本日似到西安州及其以南。三部共计九个团，比较孤立。

乙、诱敌深入关桥堡东西地区，以全力向之作战的部署是很好的，但宜估计周孔两师到关桥堡后发生戒心，停一二天等候第一师或丁师增加之可能。因此，明（四）日我之一部能保障关桥堡不失，后（五）日继续扼守该点，吸引周向之攻击，全军即于五日拂晓以前出动，从三面攻击周孔，未知是否有利。如关桥堡不失，而该地附近地形又利于我作战，则似五日向该处攻击为利，否则，让敌更进一步攻击为宜。请依照实况审察裁决，总以打得最适当为目的。

毛

---

[1] 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

[2] 周祥初，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

[3] 关桥堡，村名，位于今宁夏海原北部。

[4] 孔令恂，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九十七师师长。

[5] 李旅，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李正先。

# 集中全力歼灭饥疲之敌[1]

（1936年11月3日）

各首长：

关麟征[2]称：率师近日以来星夜追剿，所过之地给养万分困难，官兵日夜不得一餐，现已丧失靖远、打拉池一带，给养仍日不得饱等语。以情势观察，不独关师，追敌各部当有相同困难，目前敌疲惫已达最高度。宜以此特别情况激励士气，集中全力消灭敌人，争取全战役之胜利。

毛　周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红军各部队首长的电报。

[2] 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路第十一纵队司令兼第二十五师师长。

# 给陈公培[1]的信

（1936年11月4日）

公培兄大鉴：

又数年不见了，得悉吾兄依然奋斗不懈，同人闻之十分佩慰。相距尚远，不能聚首，望用书面时通消息。各方统一战线，深仗大力斡旋，对内则化干戈为玉帛，对外则求一致之抗战，争取民族革命战争与民主共和国之联系及其彻底胜利之前途。疾风劲草，愿共努力！顺祝

行止佳胜！

毛泽东

十一月四号

---

[1] 陈公培（1901—1968），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1933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期，他是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参事。

# 争取在运动中打敌一个师[1]

（1936年11月8日）

朱、张，彭，贺、任[2]：

甲、目前七天内仍求得于运动中打周孔[3]中之一个师。

乙、不可能则向金积[4]、灵武、豫旺[5]出动，诱敌深入以利机动。

丙、徐陈[6]向凉州[7]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

毛　周

八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等的电报。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3] 周孔，指周祥初、孔令恂，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和第九十七师师长。

[4] 金积，旧县名，1960年撤销，辖区裁入宁夏吴忠、青铜峡二市。

[5] 豫旺，旧县名，县治在今宁夏同心县下马关。

[6] 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和总政治委员。

[7] 凉州，旧府名，即甘肃武威。

# 力求消灭敌一部[1]

（1936年11月8日）

彭，并转张、朱，贺、任[2]：

甲、现在地区力求消灭敌一部，就是一、二个团也好。给此打击的作用有二：第一调动胡[3]部第一师增加到宁夏，以利尔后机动；第二使敌进得慢些，我在金灵[4]才有余裕时间筹粮休息。

乙、打法仍以待其前进为妙，惟不必待周孔两师[5]，打一个师亦好。望酌。

毛　周

八号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张，指张国焘，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朱，指朱德。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4] 金，指金积，旧县名，1960年撤销，辖区裁入宁夏吴忠、青铜峡二市。灵，指宁夏灵武。

[5] 周孔两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和第九十七师，师长分别为周祥初和孔令恂。

# 作战新计划[1]

（1936年11月8日）

朱、张，彭，贺、任[2]五同志：

甲、胡毛王关[3]各部北进，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

乙、拟作如下之新计划：

（一）三个方面军主力十一月份在关桥堡至金积[4]、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引胡师北进，并使关师进到石咀子，王以哲进到豫旺[5]。

（二）十二月上旬以后分两路出动。

（三）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合水、正宁、宁县地域，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中部[6]、宜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秦邦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林育英（张浩）给朱德等的电报。

[2] 张，指张国焘，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3] 胡毛王关，指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第一纵队和第三路第十一纵队司令。

[4] 金积，旧县名，1960年撤销，辖区裁入宁夏吴忠、青铜峡二市。

[5] 豫旺，旧县名，县治在今宁夏同心县下马关。

[6] 中部，旧县名，即今陕西黄陵。

君、洛川、富县地域，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以上三个步骤尽可能延长时间，估计可容许活动三个月左右。其任务不是消灭张学良杨虎城[1]，而是扩大苏区，扩大红军，解决给养。

（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2]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第一步安边地区，设法夺取安边城；第二步横山、榆林地区，以佯攻两城姿势吸引二高[3]及二十一师向北增援，以便恢复瓦市[4]、延川一带，并吸引神府[5]残敌向西；第三步神府地区，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

（五）于适当时机开始在两延[6]，在清绥[7]，在神府分三区造船，准备渡河入晋。

（六）如此时我与蒋阎[8]之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

（七）如此时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

（八）入晋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

（九）如不能抗日，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作战，扩大红军；第二步如蒋阎尚无妥协希望，东进有甚大困难，而陕甘蒋军已东调，我可仍回陕甘，如东出有利，则出至冀豫晋之交；并应计划第三步

---

[1] 张学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杨虎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2] 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3] 二高，指高桂滋、高双成，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晋陕绥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第八十四师师长和第八十六师师长。

[4] 瓦市，指瓦窑堡，今为陕西子长县县治。

[5] 神府，指陕西神木和府谷。

[6] 两延，指陕西延长和延川。

[7] 清绥，指陕西清涧和绥德。

[8] 蒋，指蒋介石。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出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豫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尔后再转西北，准备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

（十）第二步至第六步之目的在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

（十一）徐陈[1]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2]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丙、上述新计划暂时还不作为最后决定，征求五兄意见，准备在两星期内决定之。此计划不能过早执行，故十一月内全军须以求战与引敌入宁夏为目的。

丁、请五兄开一秘密会，慎重考虑见复。育英参加。

张　毛　周　博　林

十一月八日

[1] 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和总政治委员，正率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转战黄河西部镇虏堡、打拉牌、锁罕堡一带。

[2] 远方，指苏联。

# 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及其领导机关名称人选问题[1]

（1936年11月8日）

朱、张，徐、陈、李等七同志：

甲、提议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2]，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他们来电批准。

乙、二兄有何意见，请复。

张　毛

八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朱德、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李特等的电报。

[2] 1936年11月7日徐向前、陈昌浩和李特等在给中共中央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张国焘的电报中说："（一）为加强与统一河左岸四方面军部队党政军的领导及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我们提议左岸部队在目前独立行动中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简称西北前委，以昌浩、向前、传六、李特、国炳、克明、树声、先念、海松、义斋、卓然等各同志组织之，并由昌浩、向前、李特、卓然、传六等五人组织常委，以昌浩同志为书记。（二）在军事指挥方面，提议组织军委西北分会。（三）上二项提议当否请中央及军委复准，以便遵照。"

# 为抗日计红军愿停止攻击国民党[1]

（1936年11月9日）

子华同志：

俭日[2]电昨始收到，兹复如下：

（甲）请告陈委员、曾市长[3]：日本新的大举进攻，迫在目前，我方切望南京当局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我方愿以全力赞助；方不可作任何丧失领土主权之让步，再使全国失望，以符蒋介石先生七月间对全国人民宣示之诺言。

（乙）当此国难严重关头，我方正式宣言：只要国民党方面不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红军愿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攻击，以此作为我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表示，静待南京当局回答。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方攻击时，我方才在不得已的防御方式下给以必要的回击。

（丙）我们提议国民党方面，立即下令暂时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双方代表举行谈判。至于恩来飞赴广州会谈，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中共地下联络员程子华的电报。

[2] 指28日。

[3] 陈委员，指陈立夫。曾市长，指曾养甫，当时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员、广州市市长。

（丁）国方未下令停止攻击，双方主要代表未会谈前，我方拟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先与陈、曾会谈，望征同意。

毛　周

九日十六时

# 关于询问西路军情况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

（1936年11月11日）

徐、陈：

甲、你们现到何处，情况如何？

乙、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2]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

丙、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

（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

（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

（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

毛　周

十一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电报。

[2] 胡毛，指胡宗南、毛炳文，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和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王，指王均，原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1936年11月9日死于飞机失事。

# 关于打曾万钟的部署[1]

（1936年11月12日）

彭：

甲、王均[2]已死。曾万钟[3]所率三旅，马旅[4]远至宁安堡，沈旅[5]今（文）日由关不得儿出发向丁家塘大道攻进，李旅[6]由三不拉出发向马家塘攻进。我军布置得好，有打着可能。

乙、打曾敌并相当休息后，似宜以一方面军先行出动，经毛居井或其以西南进，三十一军、四军跟进，二方面军最后出动，方免拥挤及其暴露。如何，请依据实况酌定。但二方面军现时即应以一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王均，原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1936年11月9日死于飞机失事。

[3] 曾万钟，原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第七师师长，王均死后，继任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

[4] 马旅，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一纵队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马崐。

[5] 沈旅，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一纵队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旅长沈元镇。

[6] 李旅，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一纵队第七师第十九旅，旅长李世龙。

部置王以哲[1]右纵队前进道上，迟阻敌进，并掩护一、四方面军。

毛

十二日二十一时

[1] 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第六纵队（第六十七军）司令。

# 和南京谈判的协定原则

（1936年11月12日）

汉年同志：

（甲）真[1]电悉，张子华亦到。

（乙）南京对红军究能容许至何限度，望询实电告。如何〈果〉条件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也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

（丙）据张子华说，曾养甫云：

（一）党公开活动；

（二）政府继续存在；

（三）参加国会；

（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但不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与领导。为一致对日，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

（五）你在南京谈判地待命。

子任[2]

文亥[3]

---

[1] 指11日。

[2] 毛泽东的笔名。

[3] 指12日21时至23时。

# 致朱德、张国焘电[1]

（1936年11月12日）

河西徐、陈所部现进行何处？情况如何？

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 关于同意曾养甫、陈立夫所提四条并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致刘鼎电

（1936年11月12日）

刘：

甲、宁夏计划蒋介石正积极破坏中，我方正想对策，请毅[1]亦为我筹之。

乙、借毅之款五个月后可交还，但目前尚需五万元应急，毅处还可设法否。

丙、张子华已到，对曾养甫、陈立夫所提之：（一）共产党公开活动。（二）苏维埃继续存在。（三）苏区派代表参加国会。（四）及红军改名，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及待遇，但不变更原有人员等四条，我方均可同意，并派汉年为正式代表，迅速进行谈判，请告毅知之。要毅多方设法促其早成，并告卢伟良面告汉年，速按此方针谈判。

丁、十六团人马已交还矣。

毛

文亥

---

[1] 指张学良。

#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1月14日）

朱、张来保安后，前线部队统交你指挥，当可放手做去。

[1] 这是毛泽东致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11月14日）

据彭电胡敌继续向豫旺进攻，不消灭其一部不能南进。似此有打胡敌之机会，自以集中一、四、十五、三十一军在数日内打一仗，再南进。

究应如何，统由彭依前线实况决定可也。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 打敌办法[1]

（1936年11月14日）

彭：

打敌办法，如两翼伏击不便，可以一翼伏击。正面敌前进与之遭遇而消灭之。请依情况酌定。

毛

十四日亥时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 可让王以哲部进豫旺[1]

（1936年11月14日）

朱、张、彭[2]：

甲、王以哲[3]电称，因胡[4]军堡垒同心城[5]，如掩耳目，彼以右纵缓，左纵删日[6]进至虎家山、铣日[7]进至豫旺县。

乙、因胡宗南有向豫旺之由，不如让王以哲进豫旺。已电复同意，请速处置。

毛　周

十四日十七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根据情况的变化，对我军行动进行重新部署的电令。

[2] 朱，指朱德。张，指张国焘，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

[3] 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二路军第六纵队（第六十七军）司令。

[4]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一路军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5] 同心城，当时属宁夏豫旺县，1938年豫旺县改名同心县。

[6] 删日，指15日。

[7] 铣日，指16日。

# 集结红军准备与胡宗南部作战[1]

（1936年11月15日）

蒋介石仍坚决打红军，与南京妥协一时难成，我们应坚决粉碎其进攻。胡宗南占领豫旺后之行动，两三天后即可明白。

目前两三天内，四方面军即在甜水堡、保牛堡集结，二方面军在毛居井及以北集结，一方面军在环县西集结，各兵团鼓动作战准备，胡敌东进时消灭之。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集结红军准备与胡宗南部作战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 胡宗南进攻定边盐池及我军之部署[1]

（1936年11月17日）

彭：

甲、胡宗南向定盐追击，十七日第一旅由惠安堡进，詹旅[2]向萌城进，丁师[3]由西家原[4]进，周孔两师[5]在豫旺待命。

乙、我宜以二十八军钳制第一旅，第四军钳制詹旅，集结一军

---

[1] 红军第一、第二、第四3个方面军会师后，蒋介石集中5个军，从会宁至隆德一线由南向北分4路对红军进攻。红军主力由同心城、李旺堡之线向陕甘宁根据地内逐次转移，寻机给进犯之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第一军以歼灭性打击。1936年11月中旬，胡宗南部孤军深入，进至宁夏、甘肃边境豫旺地区，分3路尾追红军。17日，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在萌城、甜水堡地区设伏，将其中路军第一师之第二旅击溃。19日，红军主力隐蔽集结于甘肃环县以北之山城堡南北地区，诱敌右路第七十八师大部于20日进入山城堡地区。21日，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主力，对该敌发起攻击，经一昼夜激战，歼其1个多旅。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詹旅，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师第二旅，旅长詹忠言。

[3] 丁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

[4] 西家原，似为西田家原。

[5] 周孔两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和第九十七师，师长分别为周祥初和孔令恂。

团、十五军团及三十一军首先消灭丁师，然后再打詹旅，向西北横扫。

丙、速以二方面军有力一部或大部拒止王以哲[1]东进。

丁、二十八军及骑兵团令其在盐池待命，受你调动。二十九军谢甘[2]部在定边任保卫。

戊、部队何日可达集中地?

毛

十七日十八时

[1] 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六纵队司令。

[2] 谢甘，指谢嵩、甘渭汉，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和政治委员。

# 复徐向前等电[1]

（1936年11月18日）

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余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距毛炳文。同时，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战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严整政治纪律，建立会计给养制度，使尔后和远方同志见面时焕然一新。

肃州[2]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复徐向前、陈昌浩并告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2] 肃州，指酒泉。

# 致朱德、张国焘电[1]

（1936年11月18日）

四军萌城抗战[2]甚为得力，请鼓励其继续抓紧阻止该敌，以利一方面军与三十二军之突击。现胡军已露疲惫，兵力又颇分散，一战而胜前途大佳。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

[1] 这是毛泽东致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2] 萌城抗战，指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11月17日在宁夏盐池县萌城地区设伏，击溃胡宗南部第一师第二旅，毙伤敌600余人的一次作战。

# 朱瑞支队的作战部署[1]

（1936年11月18日）

彭：

朱瑞[2]支队附电台，以经豫旺堡以西取间道急行军进同心城、豫旺堡城之间，相机袭击胡宗南[3]指挥部（王家团庄），或扰乱周孔两师[4]后尾为宜。惟须注意马鸿宾[5]部。

毛

十八日八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朱瑞，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他临时率第一方面军特务团与第一军团教导营在今宁夏同心县豫旺堡附近地区活动。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4] 周孔两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和第九十七师，师长分别为周祥初和孔令恂。

[5] 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四纵队司令兼第三十五师师长。

# 决战动员令

（1936年11月18日）

一、二、四方面军各兵团军事政治首长钧鉴：

从明日起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各首长务须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实与最吃苦耐心的意志去执行。而且要谆谆告诉下级首长转告于全体战斗员，每人都照着你们的决心，忠忱与意志，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克服任何的困难，并准备连续的战斗。因为当前的这一个战斗，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敌人的弱点我们的优点又都是很多的。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这一进攻，开展新的局面，以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苏区的胜利作第一个赠献给全苏区的人民的礼物。

红军胜利万岁！

苏维埃胜利万岁！

抗日民族战争万岁！

毛泽东　张国焘　彭德怀　任弼时

朱　德　周恩来　贺　龙

# 先打丁德隆后打周祥初孔令恂[1]

（1936年11月19日）

彭：

我军先打其右路丁师[2]。对周孔[3]似宜让其北进数十里，然后坚决扼阻之，以便我军消灭丁师后，向其周孔之侧后打去。又二方面军主力宜跟进为预备队，其一部则坚决扼阻王军[4]。如何，请依情况决定。

毛

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丁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

[3] 周孔，指周祥初、孔令恂，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和第九十七师师长。

[4] 王军，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六纵队司令王以哲指挥的东北军一部。

# 胡宗南部的行动及我军部署

（1936年11月20日）

彭[1]：

甲、敌现陷在困难中，遵蒋[2]令由保宁堡改向定盐[3]，解决给养，控制战略要屯，其主力进路必经红柳沟[4]，但丁师[5]有经山城堡[6]、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

乙、我以集结四个军从其右侧后打去最好，四军则从正面吸引之。

丙、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个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

丁、敌以为我一、二方面军向环县逃，目前企图胡[7]敌完全不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

[2] 蒋，指蒋介石。

[3] 定盐，指陕西定边和宁夏盐池。

[4] 红柳沟，村名，位于陕西定边西南。

[5] 丁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

[6] 山城堡，村名，位于甘肃环县北部。

[7]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知，但敌增师至山城堡后则必发觉，务望注意。

戊、曲子红大三科[1]及定、盐二十九军归你统一指挥。

毛泽东

二十日五时

[1] 指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亦称红军大学附属步兵学校，对外又称中央教导师，当时驻甘肃环县曲子镇。



毛泽东等在陕北的合影。

# 致红军战士与苏区人民电*

（1936年11月20日）

（甲）蒋介石此次大举向苏区进攻，不但不许红军抗日，反要消灭红军，消灭苏区人民，命令胡宗南各军向盐池、定边、环县猛攻，并要向陕北苏区前进。

（乙）我一、二、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士气大振，坚决拥护中央与军委之路线，消灭进攻敌人，扩大统一战线，实行抗日救国，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定、盐南边之山城堡打了第一个胜仗，消灭胡宗南之一个旅。

（丙）这个胜仗是粉碎蒋介石全部进攻的开始，我全体红军战士要更加团结起来，忍苦耐劳，服从命令，勇敢作战。我全苏区人民要帮助红军作战输送粮食，转运伤兵，搬运战利品。白军来时，用坚壁清野对付之。为保卫抗日根据地而战，为扩大抗日根据地而战，为消灭全部进攻之敌人而战。

红军万岁！

苏维埃万岁！

抗日救国之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十一月二十日

# 打丁德隆胜利后立即打周祥初[1]

（1936年11月21日）

昨日止敌情大体明白，第一旅及孔令恂[2]在大水坑一带，周祥初[3]在攀家沟、保宁堡一带，昨日一部向山城堡，主力二十一日当向山城堡以北距离三、四十里地区前进。丁德隆[4]在山城堡一带。第二旅似在豫旺[5]整理，胡[6]军部到豫旺。我本日打丁师，除周师下午或能赶到外，余均须第三天方能赶到，到亦疲劳不堪矣。我打丁师胜利后，须立即整顿队势打周师。

毛

二十一日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电报。当时彭德怀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

[2] 孔令恂，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九十七师师长。

[3] 周祥初，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

[4] 丁德隆，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七十八师师长。

[5] 豫旺，旧县名，县治在今宁夏同心县下马关。

[6]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面对国民党军的“围剿”，毛泽东、彭德怀等指挥红军沉着应战，1936年11月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图为回师陕北后的彭德怀。

# 红军领袖贺绥远守军抗日胜利

（1936年11月21日）

绥远傅存怀将军台鉴：

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非特足以媲美十九路军，且令□□重兵，专以残杀本国同胞为其唯一事业者，羞愧至死！近闻少数卖国汉奸意欲假手于某有力者，假抗日之名，实际上控制足下之爱国行为，吾人深信足下必能以对民族之大义感化万安，不仅使汉奸卖国贼无所售其计，且转而□□抗日力量之团结也。红军抗日援绥且早决心，无□少数汉奸卖国贼竟仍高唱其抗日必先剿共之□调，驱使□国□□实行进攻红军，以求削弱国防力量，而迎日本帝国主义根绝中国抗日运动之要求，抗日人民红军誓以其全力与若辈无耻之徒相同□，庶几民族解放之大□□，而我全国人民与血性军人所高举着不致堕落，永增光辉，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敬以一瓣心香祝将军之胜利。并希以此竟传达贵军全体将士。

毛泽东　朱德叩

二十一日

# 坚决阻敌第一旅占领盐池[1]

（1936年11月22日）

彭，并告宋、宋，谢、甘[2]：

胡[3]令四十三师向萌城、甜水堡增援，而第一旅昨日已至青山街，离盐池不远。二十八军及骑兵团全部应立即转至青山街，小部由正面，主力由侧后，坚决阻止第一旅，不使盐池落入敌手，以待主力之到达。谢甘所部除小部警戒安边外，主力应立即集结盐池守城。

毛

二十二日十七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等的电报。

[2] 宋、宋，指宋时轮、宋任穷，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谢、甘，指谢嵩、甘渭汉，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和政治委员。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 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中心关键[1]

（1936年11月22日）

小开[2]：

甲、南京两电、上海两电均收到。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

乙、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

丙、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先酝酿，然后发动，一处发动，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详容另告。

东　天

十一月二十二日亥

[1] 这是毛泽东、洛甫（张闻天）给潘汉年的电报。

[2] 小开，即潘汉年。

# 在中国文艺协会[1]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36年11月22日）

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因为现在中国有两条战线，一条是抗日战线，一条是内战。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首先我们就要停止内战。但现在有人不愿停止内战，反而来进攻抗日主力的人民红军，要消灭抗日的领导者和核心的苏维埃，要消灭一切抗日力量，抗日的文艺也要消灭。所以我们要抗日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你

[1] 中国文艺协会，是由丁玲、成仿吾、李伯钊等34人倡议，于1936年11月22日在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正式成立的。在成立大会上，由毛泽东提议、全体会员通过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组织协会是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下，共同推动新的文艺工作，结成统一战线中新的战斗力量。

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所以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中，不管在文艺协会都有很重大的任务。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和红四军部分负责干部合影。

# 组成南北纵队打击敌军[1]

（1936年11月22日）

彭：

似宜由你亲率一方面军昨日作战未使用之一个师及四方面军之两个军全部组成北纵队，今夜或明晨即向青山街转移，配合二十八、二十九军消灭第一旅及马全良[2]部。若周孔[3]再向山城堡进，则以一方面军主力，由二方面军贺任[4]指挥组成南纵队，消灭其一个师有把握。或你消灭驱逐第一旅后，可从青山街向萌城、甜水堡周孔之后路打去，使周孔进退维谷。萌城一带地形条件，我全部集中事实上难于使用，且在丁师[5]惨败后周孔前进当更谨慎，若乘敌从山城堡转移时，主力从一翼侧击才能出敌不意，或可打一、二个胜

---

[1] 这是山城堡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关于发展胜利、继续歼敌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马全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防守区马鸿逵部新编第七师第二十旅旅长。

[3] 周孔，指周祥初、孔令恂，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和第九十七师师长。

[4] 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5] 丁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

仗，且使敌知无大望。尔后敌若转入守势，我北纵队可向金灵[1]以东活动之，使整个局势变化。如何，请解决。

毛

二十二日

[1] 金，指金积，旧县名，1960年撤销，辖区裁入宁夏吴忠、青铜峡二市。灵，指宁夏灵武。

# 捉住敌军矛盾彻底击破胡宗南[1]

（1936年11月23日）

朱、张，彭，贺、任[2]：

现时敌军中发展着四种矛盾：第一种是抗日与“剿共”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蒋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上级的严令进攻与下级的对红军恐惧的矛盾，此种矛盾现在极大发展着；第四种是官长与士兵间的矛盾，此种矛盾以近日的物质困难与疲劳而加深。我们的任务是捉住这些矛盾，更加团结一致，统一指挥，忍受与克服一切困难，不失每一个有利时机，灵活调动部队，准备连续战斗，坚决地各个击破进攻之敌，首先是彻底地击破胡宗南[3]。

毛

二十三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等的电报。

[2] 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 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

（1936年11月23日）

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徐向前、陈昌浩电的主要内容。

# 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1]

（1936年11月25日）

徐、陈：

一、告指战员书[2]及二十五日部署电[3]收到，甚慰。

二、毛炳文[4]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5]敌之后，主力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电报。

[2] 指1936年11月22日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和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发布的告西路军指战员书。文中说，在西北创造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光荣历史责任已落在西路军全体指战员肩上，全体指战员要坚决战胜敌人，正确运用统一战线，为完成光荣的历史任务而艰苦奋斗。

[3] 指1936年11月25日8时徐向前、陈昌浩给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张国焘的电报。电报说，西路军虽有许多困难，但还有寻机歼敌之把握。为创造根据地，策应河东主力，接通远方，决定在凉州、永昌、甘州间寻机歼敌，以五军两个团位于东乐，两团出肃州，指挥部及直属队必要时位于山丹，尔后适时在四十里铺、永昌之间或永昌附近集中第九、第三十军寻机歼敌。并要求接济越快越好。

[4] 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兰州绥靖公署第一路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

[5] 马，指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军兰州绥靖公署第一路第五纵队司令兼第二防守区司令、第一〇〇师师长。

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

三、远方[1]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

四、关于作战方面：

（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

（二）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

（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

（四）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

（五）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

（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

（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

（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望酌行之。

泽东

二十五日二十四时

[1] 远方，指苏联。

# 国内国际及红军的情况[1]

（1936年11月28日）

蒋介石还站在中间地位，对日仍力求妥协，但比过去强硬了许多，对我力求缩小苏区打击红军，但已觉得困难，许其部下二陈[2]与我谈判。潘汉年去南京两次，距离甚远，一时不易成就。我之政策，一方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动；一方面红军消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苏区与红军任务坚持打蒋，不稍放松。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二陈，指陈果夫、陈立夫。

# 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

（1936年11月28日）

我的意见，把全部一万八千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内，进则集中地进，退则集中地退，打则集中地打，不打则已，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如此打两三次，有问题就解决了，教育训练也方便些，只要粮食不缺，似以此法为好，望酌行之。

[1] 这是毛泽东致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电的主要内容。

# 对胡军勿作仇敌，应尽力争取[1]

（1936年11月30日）

我们完全同意张的建议，希望立即采取如下具体办法：（一）首先释放一部分俘虏，勿骂其长官。（二）用诚恳和气与尊重彼方态度，分别写信致胡宗南、孔令恂、周祥初。（三）派人到豫旺见胡。（四）用毛、朱、张、周及各方面军各军团各军首长名义，发表告胡军官佐士兵书，简单明了说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志愿。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该电报通报胡宗南败后其内部充满联俄容共、一致抗日空气，张学良建议“对胡军勿作仇敌，应尽力争取”。

#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6年11月30日）

敌进则坚决消灭之，数日内胡军仍有进攻可能。如敌改取守势，我军全军在此地区休息训练一个月，包括三个方面军政治上团结、体力休养、部队改编、制度统一、军事训练、政治训练、地方工作训练、党的路线解释、政治形势与红军任务解释、各种干部会议等项。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 读西洛可夫[1]、爱森堡[2]等著 李达[3]、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

（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

##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 绪论　哲学的党派性

#### 二　哲学是党派的科学

……

机械论是服从盲目的自然，是理论与实践分

在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的伊里奇的学说中，理论与实践不可分离地被结合起来，去征服盲目的必然，这是唯一的任务。“理论的思想

[1] 西洛可夫，现译希罗科夫。苏联哲学家。

[2] 爱森堡，现译艾森贝格。苏联哲学家。

[3]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主要译著有《马克思经济学说》《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主要著作有《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等。

离，是认识论上的分离。

（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这就是认识论上的统一”[1]——伊里奇把自己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评注的中心思想之一，这样明白的力说了。[第13页]

自流主义与革命主义的斗争

伯伦斯泰因[2]，用他自己所创造的资本主义之平和的进化的发展的理论，来对抗辩证法的飞跃说、革命说。

对于唯物论辩证法的修正，是向着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能动性、革命性——实行的。这种修正是打破理论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的统一之尝试，而这两者的统一在唯物辩证法上，正是“内部的而且不可分的”被结合着。伯伦斯泰因不去提高普罗列达里亚[3]斗争中的能动性与热情，反而鼓吹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之不可能。

普列哈诺夫[4]……虽然暴露了伯伦斯泰因的观念论，却没有冲倒修正派在辩证法问题上曲解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根基。特别是他并不曾顾虑到修正派放弃了“辩证法上决定的东西”——对立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新的译文是：“理论观念（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要注意这点——这个统一正是在认识论中。”（《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6页）。

[2] 伯伦斯泰因，在其他处又译柏伦斯泰因，伯因斯坦等，现译伯恩施坦。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3] 普罗列达里亚，意即“无产阶级”。

[4] 普列哈诺夫（1856—1918），在其他处又译蒲列哈诺夫等，现译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

的统一。伯伦斯泰因及其一党，建立阶级协调论代替对立的统一的法则。……最后，对于辩证法的本质之无理解表现得最厉害的地方，是普列哈诺夫和其他少数派在一九一四年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公然喊出“防御祖国”的布尔乔亚[1]的口号。……[第14～15页]

## 三　为党派的哲学而实行的、伊里奇与少数派[2]的斗争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具体的更好的推动各阶级的势力。

少数派的实践观，是机会主义的把实践迎合于现实，这种实践观，产出和现实完全不同的现实的反映，完全不同的理论。少数派……终于从现实的具体形象中排除了给现实以具体性的东西，即排除了特定阶级的革命行动。伊里奇估计着我们怎样进行并向什么方向进行，才能够具体的更好的推动各阶级的势力。但少数派却不这样，他们只记述现成的东西，并没有指摘在普罗列达里亚与农民的积极的革命任务之上，能够发生什么事。

---

[1] 布尔乔亚，意即“资产阶级”。

[2] 少数派，现译为孟什维克。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选举中的少数派被称为孟什维克，即俄语меньшевик（意即少数派）的音译。

“他们不指明普罗列达里亚在一定的瞬间应当怎样去‘推动革命的发展’……只是记述过程的一般，关于我们对于现实的具体任务却不曾提起。我们看看新火花派[1]说明自己思想的方法，使我们想起马克思对于与辩证法的观念无关的旧唯物论的批判。马克思说：哲学者们，只是各色各样的说明了世界；但紧要的事情，是变革世界，新火花派的人们，虽曾努力记述并说明在他们眼前发生着的斗争的过程，却完全不能定出关于这个斗争的正确口号，他们杂乱的进行，而指导却是拙劣；他们忽视了党——能动的意识着指导的作用即变革的物质条件，并站在前卫阶级先锋的党——在历史上所能做的并且必须做的工作，因此把唯物史观降低了”[2]。（伊里奇）[第25～26页]

目前斗争的正确口号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首先的问题是国内和平即国共合作。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经过少数派的手，从一九〇五年俄国现实基础上实现出来的那种具体条件被割离了。一方面原理变为空虚的一般的

[1] 新火花派，即新火星派。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从第五十二号《火星报》起把持该报编辑部的孟什维克分子。党内将他们称为“新火星派”，以与列宁主办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时的“旧火星派”相区别。

[2] 参见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5页）

以离开一般联结的个个散乱事实为满足，现在正有此种人。

命题——公式化；另一方面，离开了原理的新事实的记载，提供了迂回的经验论。就是提供了只记载在一般联结之外的个个散乱的事实就觉得满足的那种理论。

……伊里奇依照辩证唯物论的原则，不从一般的命题出发，而从客观的现实的运动出发，从客观的现实的一切方面的考察出发，从各种阶级的地位与任务的分析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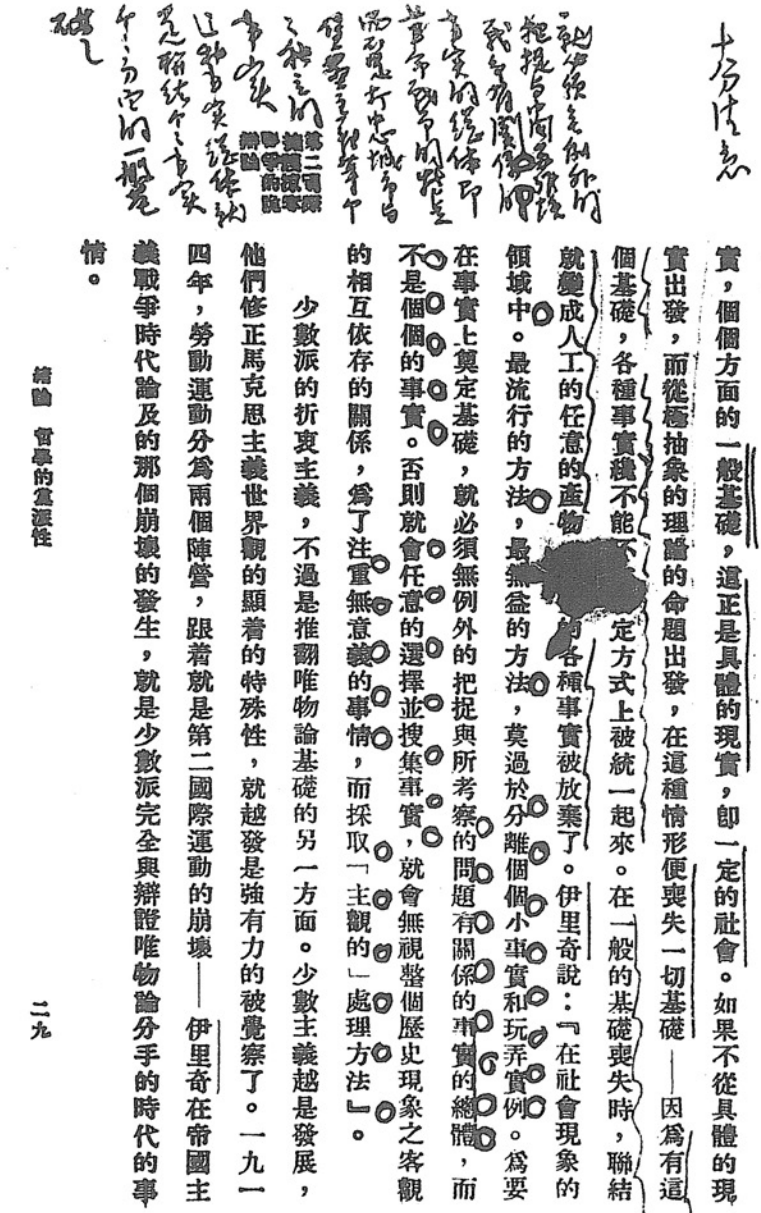
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

少数派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的命题出发，所以结果违背了唯物论的世界观之第一的而且根本的要求。对于辩证法的背叛，与对于唯物论的背叛，是怎样联系着，这可以从少数派的实例看出来。少数派把离开具体发展的死的抽象作为对象，造出了产生任意的主观的非唯物论的解释事实的地盘。

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

十分注意

主观的非唯物论的立场更加是那样，它们偶然的从现实把事实分离出来，往往表面的机械的



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的手稿。

使它互相统一。在这种情形建立了孤立的解释那个事实的基础。这叫做折衷主义。在折衷主义之下，丧失一般的基础及个个事件间的联结。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这正是具体的现实，即一定的社会。如果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极抽象的理论的命题出发，在这种情形便丧失一切基础——因为有这个基础，各种事实才不能不在特定方式上被统一起来。在一般的基础丧失时，联结就变成人工的任意的产物，重要的各种事实被放弃了。伊里奇说："在社会现象的领域中，最流行的方法，最无益的方法，莫过于分离个个小事实和玩弄实例。为要在事实上奠定基础，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所考察的问题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个个的事实。否则就会任意的选择并搜集事实，就会无视整个历史现象之客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为了注重无意义的事情，而采取'主观的'处理方法。"[1][第27～29页]

十分注意

例如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中国苏维埃战争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即革命战争的特点，而不是打中心城市与堡垒主义等个个独立的事实，这种事实总体就是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

[1] 参见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的原话不是一段话，这段引文在摘录和翻译上都与列宁的原话有出入。

抗日战争与反蒋战争并不是不能相容的——孙鸣九[1]说

……少数派与其他类似者为辩护自己的背叛而树立的防卫祖国的有名的口号，在诡辩中使保护祖国的运动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国际主义与保护祖国运动并不是不能相容的——第二国际阵营中发出了这种话。……[第30～31页]

## 第一章　唯物论与观念论

### 一　唯物论及观念论的本质及根源

……

实践使人们确信物质是客观的实在

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作用于自然，并且直接变化自然，使物质受人类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人类深信物质是客观的存在着。

中国是否存在

苏联劳动阶级当着建设社会主义、使国内工业化、电气化、改造农民阶层、并且与豪农[2]实行阶级斗争时，他们不疑惑苏联离开他们的意识独立的客观的存在。他们深信在日常的实践上，

[1] 孙鸣九（1909—2000），原名孙铭久，亦即孙铭九等。辽宁新民人，西安事变时任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的卫队第二营（手枪营）营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扣押了张学良，并调遣军队开进陕西，威逼西安。这以后，东北军内部在如何营救张学良和是否应允中央军开进西安等问题上，发生分裂。孙铭九等人主战，认为为了营救张学良，应对南京中央军作战，反蒋战争与抗日战争并不矛盾。

[2] 豪农，即富农。

苏联现实的存在着，普罗列达里亚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现实的存在着。[第49页]

## 五　康德及马克思主义之新康德主义的修正

……

殖民地资产阶级类似此种情形

……德国布尔乔亚的发达之比较落后，以及他们之依存于封建制度，规定了他们对于布尔乔亚革命的态度之二重性。德国布尔乔亚，一方面梦想革命，梦想废除封建的桎梏；他方面害怕革命，投靠于封建领主，而与他们妥协。[第121页]

## 六　新康德主义

……

……那么，社会生活受什么所支配呢？正是对于这问题的回答，表现着里喀尔特[1]的观念论哲学的特性。在社会中，价值支配着。这个价值，并不是人类在其实践的活动中用作估评种种事件及现象那样的规准。里喀尔特说，这个价值是主观的并且相对的，他依存于各个人的意识。支配社会的价值，不依存于各个人，在这种意义

[1] 里喀尔特（1863—1936），现译李凯尔特。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新康德主义巴登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上，它是“客观的”。里喀尔特随后行着极端混乱的论述，表现出他不能给与价值的定义。……[第139～140页]

## 第二章　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

### 一　认识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斯[1]主义中是决定要素。

如前章所说，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决定的要素，据恩格斯的定义，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及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学问。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不同。形而上学把事物及其知的反映（即概念）[2]，当作不变的东西，凝固了的东西去观察，而辩证法却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运动上、在其发生与消灭上，去把握事物及其知的反映（即概念）。辩证法教给我们，不但客观的现实是发展的，并且认识也是发展的。

客观世界是发展的，主观认识也是发展的。

一九一七年七月革命以后，……

七月革命以后，客观形势发展了，主观认识也应跟着发展。认识新形势中

伊里奇明白的指出：应当理解变化了的现实怎样使人们认识新的矛盾，新的联结。他指出了“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个口号，到七月革命止，它正确的反映了一九一七年革命中的阶级势

[1] 马克斯，即马克思。

[2] 本段中“即概念”两边的圆括号系毛泽东所加。

的新矛盾与新联结。

力和党的相互关系。在一九一七年革命的一定阶段上，“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个口号“是向着和平发展的道路前进一步的、能够直接实现的第一步的口号。它是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口号，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七月四日为止，是可能的，当然又是最有望的东西，但在今日，却无条件的变为不可能了。”[1]——伊里奇指出阶级势力的配置在根本上起了变化，并且这样写着。这个口号，在今日已不正确了。因为在新的情势之下转移权力，只有依据公然的革命才是可能的。

反映论不是被动的摄取对象，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认识是能动的因素，起着改造世界的作用。

现实变化着、发展着。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也随着现实一同变化。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受动的反映现实，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像照相镜那样，无条件地摄映在自己眼界中的一切对象。人类的认识，是当作一个动因被包含在多方面的社会的实践之中的能动的过程。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人类的认识，表现为能动的起作用的动因，参加于世界的改造。

新的形势引导到新的口号，新的口号

例如伊里奇提起“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口号怎样变化了的问题，不把这个口号当作受动的反映革命的现实的东西去观察，而把它当作在革命的实践上决定大众可以前进的方向，并团结他们的力量去观察。……如伊里奇所说，变化了

[1] 参见列宁《论口号》。（《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7～108页）

反映了形势的新矛盾，并指导群众团结起来为改变此形势而斗争。

九月以后再变化了的形势，又引出苏维埃口号，但此口号的内容大不同于过去的苏维埃。

的现实，如何地引导到新的口号、新的认识；并且这新的认识，能动地反映出现实的新矛盾，它本身是向着现实的变革的一条道路。“看前面勿看后面。勿用陈旧的阶级和政党的范畴，要用新的，七月革命以后的范畴”。[1]

从七月到九月这个阶段上变化了的阶级关系，变化了的革命的实践，使伊里奇能够再度提出苏维埃的问题，作为在阶级斗争中夺取国家权力的手段。……这个新口号，并不是重复着与七月革命以前所定出的东西相同的口号，它是由于革命的实践之新内容而被弄得丰富了的东西。新的阶段上的苏维埃，不论从阶级的构成上看，或从革命的变革中它的作用看，都与以前的苏维埃不同。[第193～196页]

认识主体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中起变化

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的统一。

改变外界，同时又改变自己。

阐明了这种认识过程中的辩证法，阐明了现实与认识的充满矛盾的运动的人，首先是马克思。马克思指示了：现实与认识——客体与主体——之辩证法的统一，实现于社会的实践之历史的发展中。不只认识客体，并且认识主体，也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中起变化。人类作用于外部自然，一面变革它，同时又变革自己的性质——马克思说。……与形而上学的唯物论一样，费尔

[1] 参见列宁《论口号》。（《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费尔巴哈：主体与客体都不是历史上发生与发展的东西，认识是不变的自然的不变的反映。二者的统一，是不变状态的统一。

人类的感官是在劳动过程中发展的与分化的。

抽象的人与具体的人

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变化，在革命期中现得

巴赫[1]也不把认识看做历史的过程。在费尔巴赫说来，认识是不变的自然之不变的反映。在他说来，认识主体，也和认识客体相同，是不变的，不发展的东西，而是在实践过程之外被把握的。他以为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不是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上发生的东西。他没有看到社会的实践变化了认识的客体。……他并不理解：物质的＝感性的人类，连同他的五官，都是世界史的产物。他不知道：人类的感官，在人类的劳动过程中，在人类的实践之历史的发展中，都不是不变的东西而是发展的分化的东西。……费尔巴赫心目中的人类，不是由于社会的活动而能动的改造世界的主体，而是直观的实体。马克思批评他说："他不离开抽象的理论之范围，他不在使人类变成现在这样的一定社会关系中、不在周围的生活环境中去考察人类，所以他决不能到达于现实的存在着活动的人类，而停止于所谓'人类'的抽象物的境界，只能感觉上稍微认识'实在的，个别的，肉体的人类'。"[2]……

马克思说过，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变化，在革命期中显现得强烈而明了。这一层，可以用革命的实例表示出来。普罗列达里亚，在俄国革命

[1] 费尔巴赫（1804—1872），现译费尔巴哈。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2]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页）

特别强烈，例如俄国无产阶级与中国农民。

过程中，一面变革现实，同时在根本上变革着他们自己的性质。……

……黑格尔是观念论者，他不承认离意识独立的客观世界之实在性，所以主张认识的能动性，首先是在于思维或绝对精神能动地创造出为这种精神的“他在”的自然。能够成就独自的发展的东西，据黑格尔说来，只是能动的思维。自然界一切种类的发展阶段，都被给予于精神之中。思维，“主观精神”对于自然之能动的认识，虽是发展的，而自然本身却不发展。能动的精神，据黑格尔说来，在认识自然，即认识客观世界时，就是认识它自身的“他在”，即认识自己。照这样说，认识之能动的主体，与其客体，在绝对精神上变为一致的东西，同一的东西。黑格尔不用这个来解决认识上主客关系如何的问题，却把客体解消于观念的主体中，离这个问题的解决愈远了。

赫格尔[1]把客体消解于主体中，把主客等同起来。

费尔巴赫暴露了把主客看作同一的见解之观念论的性质。他说，把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视为同一，弄到使任何认识都成为不可能；因为认识

[1] 赫格尔（1770—1831），在其他处又译黑智儿等，现译黑格尔。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

不是与现实同一的东西，而是现实在人类的感官及思维上反映了的东西。费尔巴赫主张，认识客体与主体不同，它是离人类意识独立的自然。不过费尔巴赫未曾理解主客统一之辩证法的性质，这是在前面说过的。

费尔巴哈不了解主客统一之辩证法性质。

蒲列哈诺夫对于认识论的理解，并不曾注意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费尔巴赫所下的深刻的批判，仍没有超出费尔巴赫的范围，蒲列哈诺夫，与费尔巴赫一样，没有理解辩证法的本质、对立的统一的法则，所以他没有在辩证法上考察认识论。他不能阐明认识的充满矛盾的性质，不能阐明认识与社会的实践之结合，关于主客统一问题，仍旧站在费尔巴赫的立场。他与费尔巴赫一样，虽然表示了主客统一的物质，而这种统一，在他说来，带有与实践的活动无关的直观性。他与费尔巴赫一样，主张主客的统一，被给予于在自己为主体同时在他人为客体的个人之中。他不但没有批判过费尔巴赫，并且追随于费尔巴赫之后，重说人类的本质是他的肉体，没有见到人类的本质并不是肉体的东西，而是社会的性质。认识论中蒲列哈诺夫的反历史主义，是从这种地方发生的。

普列哈诺夫以为主客统一带有与实践活动无关的直观性，这是因为他不了解辩证法的本质（对立统一法则），所以不能在辩证法上了解认识论，他的反历史主义是同费尔巴哈一样的。

机械论——只看见相互关系，不看见相互渗透。

……机械论者亚克瑟洛特[1]不能理解对立的统一之辩证法的本质，机械地考察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在这种关系中，只看到相互的关系，没有看到历史的实践过程中两者的相互渗透之辩证法的统一。

德波林不知主客相互渗透是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的，只有机械的性质（外的、直观的），没有辩证的性质，从实践分离了认识。

……德波林常常说起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说起两者的相互渗透，却不曾理解这种相互渗透是在实践上实现的，因而在事实上证明了他没有理解这辩证法的能力。对立的相互渗透，在德波林之下，没有辩证法的性质，只有外的性质，而终结于主体与客体之单纯的移动。他说，主体变为客体，客体变为主体。于是我们依据蒲列哈诺夫及其门徒的谬误的实例，看到如下的事实。即，从实践分离认识，不理解认识上的辩证法的作用，到了解决主客统一的问题时，必然要走到直观的立场，走到费尔巴赫主义。[第196～203页]

---

[1] 亚克瑟洛特（1868—1946）现译阿克雪里罗得。苏联女哲学家和文艺学家，社会民主党人。1917年年初任梦什维克中央委员，后任普列汉诺夫的“同一派”中央委员。1918年起不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高等院校任教。主要著作有：《哲学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等。

## 二　认识过程的阶段与动因

如何认识外界的问题，在实践以外是不能解决的。

认识运动的路程

认识主体是社会的阶级。

无产阶级的认识发展过程，是阶级认识运动的标本。

前面说过：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实践的发展为基础而实现；人类如何认识周围世界的问题，在实践以外是不能解决的。现在我们来详细研究认识的运动的路程；说明认识的运动在其发展上通过什么样的阶段，说明这种运动是由什么动因构成的。

当作认识物质的现实之主体而出现的东西，如前节所说，不是从社会游离了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人类，社会的阶级。在阶级社会中，周围世界的认识，带有阶级的性质。在阶级斗争上,从“自在的阶级”转化为“自为的阶级”的普罗列达里亚的认识之发展，成为阶级的认识之运动的标本。……

然则普罗列达里亚的认识，是怎样发展，并通过怎样的阶段呢？

土地问题
中国革命
战争问题

普罗列达里亚，在其发展的最初期，还不曾完全意识到在自己周围发生的事实。这一层，在英国的产业革命时代，就可以明了看出来。当时，普罗列达里亚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非常浅薄，劳动者们虽然随着机械的采用而成为产业预备军而被抛弃于街头，但他们却不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看出自己的贫困的原因，而只是在机械当中去寻找那原因。他们不对布尔乔亚作

对轮船、对汽车

第一期：非常浅薄，不了解资本主义本质，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法，还在“自在阶级”的阶段。

中国对帝国主义的认识

第二期：由于日常斗争的实践，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了，使得无产阶级懂得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剥削关系与阶级斗争关系），马克斯主义出现了，进到了“自为阶级”

意识的阶级斗争，而做出了反抗机械的暴动。……普罗列达里亚，由于抗抵机械的运动，就已经是和成为阶级的资本家或布尔乔亚斗争过了，只因他们不曾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所以才做出了错误的斗争方法。那时普罗列达里亚，虽不曾理解资本主义的剥削的本质，而对于自身所受的一切压迫和剥削，却已经是感觉到意识到了。他们为饥饿所苦，又不能满足迫切的生活的必要，他们被放置在今日或明日就要和家属一同挨饿的运命之下。因为这样，所以劳动者们只知道恼恨自己所属的企业家，还不知道那企业家即是剥削者阶级的代表。普罗列达里亚是自然地起来反抗的；他们的斗争，不是基于资本主义发展之科学的理解，而是基于在奴隶生活条件下得到的体验与知觉。然而他们与企业家作日常的斗争，与其他企业中的劳动者相接触，以及资本家们互相支持的事实的反复等——这一切事情，就弄到使劳动者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雇佣劳动与资本间的斗争），教训他们在自己的主人一个人物之中，去看出一个剥削者阶级、布尔乔亚的阶级。阶级斗争的日常的实践，使得普罗列达里亚对于周围现实的认识，从自然的感觉和体验的阶段，提高到革命的变革现实的水平。于是说明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没落的必然性的马克思学说，在劳动大众方面，就能够依据他们自己的阶级斗

的阶段。

争的实践去理解。革命的普罗列达里亚，已经不是盲目的了。于是阶级对阶级的战争，就以现在世界为舞台而开演。

从感性阶段进到理性阶段，再从理性阶段进到革命实践。

普罗列达里亚对于资本主义的现实之认识的路程，最初从感觉、表象、与对象的直觉的阶段，进到对于现实的较高度的理解的阶段，其次再从这高度的阶段，进到革命的实践，进到要实现从前只蕴藏在头脑中的东西的阶段。“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是认识真理的辩证法的路程，是到达于客观的实在之认识的路程。”[1]（伊里奇）

从直观到思维

从思维到实践

这一段话，包含着说明我们的认识发展之辩证法的路程的很深的思想。认识的要点，认识的终极目的，在于发见周围的现实之法则，而把我们在感觉、知觉和表象上所领受的材料，作论理的理解。但我们的认识之到达于论理的理解，是认识过程全体的结果。何种动因占优胜的那种差异，也决定认识本身的发展阶段的差异。因而认识过程的阶段，是不能被用不可逾越的界限去互相区别的。

认识目的在把感觉材料作论理理解，两个阶段有区别，但不是不可逾越的。

在普罗列达里亚对资本主义的现实的个别现象做自发的斗争时的发展阶段上，普罗列达里亚也曾企图用一种方法去认识并理解那些现象。普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1页）

罗列达里亚自身的发展阶段还在低级状态，他们还没有暴露资本主义的本质的能力——这也是因为现实自身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充分展开它内在的矛盾——，这种种事实的结果，使得普罗列达里亚对于现实的一切认识，只在理解现实的各个方面或现象的感性认识形式上表现出来。

感性认识：片面、现象、外的联系。

理性认识：全体、本质、内的联系。

但是，资本主义的现实以及阶级斗争的发展使得普罗列达里亚感到有在其内的联结上，在其全体性上去认识各个现象的必要，使得他们把资本主义当作特定的社会制度，当作基于剥削的生产方法去理解。感性的理解，对于普罗列达里亚，不表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发露那矛盾的“内容”。因为劳动者没有理解资本主义之内的矛盾（剥削关系），所以他们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现实之一切方面，是怎么样并为什么去互相结合的。……资本主义的个个现象，在他们的认识上，只单是外的联结的东西。但是阶级斗争一进到较高的发展阶段而转化于“自为的阶级”时，普罗列达里亚就开始把从前个个散乱的资本主义诸现象的总体，当作内的联结的东西去把握了。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它先暴露周围世界之内的矛盾，而能在其总体上，在其一切方面的联结上去把握现实。

伊里奇发展了感性的认识与论理的认识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并说明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认识过

概念比感觉更为深刻，是进一步的东西，例如商品与价值。

？

程中所领会的概念，比较感觉和表象，更为深刻。他说："每秒有三十万基米的速度的运动，我们不难表象出来，至于光用那样快的速度而运动这件事，我们却不能理解。"[1]为要理解诸现象之内的联结，单靠感觉是不够的。和这同样的思想，马克思在论价值时，也曾说起过价值是表现各商品所有者间的关系的范畴。这种关系，是不能靠感觉去把握的。能够看，能够触的东西，只是个个的商品，而不是价值，不是商品所有者的关系，也不是当作全体看的资本主义。这些东西，是不反映"于肉眼"之上的。关于这点，马克思曾经爽直地说过："商品价值的实体，在不知道它的所在这一点上，与胡尔斯达夫的情妇郭克里寡妇不同……各个商品，无论怎样把它反复舞弄，依然不能抓住它的价值。"[2]

感性认识不从论理认识分离，感性认识中已有论理认识的萌芽。一般性的东西已在具体性

从感性的认识推移到论理的认识，就是从个个的方面和现象的理解推移到法则，即现实之内的联结的理解。感性的认识，不从论理的认识分离。它在已经萌芽的形态上，包含着我们后来借概念之力所实行的普遍化。

费尔巴赫所谓某种普遍化已被给予于现实之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这里的译文有误。（《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6页）

[2]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页）

的东西中间包含了的，但包含的只是外的联系，不是内的联系。由浅向深，由外向内，由各个向一般，只有依据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才能达到。这就是认识之深化运动，是认识之突变。这一深化与突变，才比较正确与完全的反映自然。

感性的知觉的那个思想，伊里奇是表示赞同的。伊里奇引用过费尔巴赫所说的“只看见树叶不看见树么？”[1]这一句话。不过费尔巴赫虽然述说过人的感官常与思想相联结这句深刻的话，却不曾力说到这种联结只是外的顺列的联结；现实的法则，只有依据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才能发见。费尔巴赫把在直观和表象上被给予着的联结，当作论理的认识。反之，伊里奇却力说到认识之深化的运动，力说到从感性的认识到论理的认识之推移。他这样写着：“物质的抽象、自然的法则、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即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重要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比较深刻，比较正确，比较完全地反映自然。”[2]

两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各阶段，不是互相分离的。

伊里奇把感性的认识与论理的认识，当作人类认识周围世界过程中两个不同的阶段，又说明了把握实在过程时的感性的知觉与思维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显现为感性的东西；在高级阶段，认识显现为论理的东西。但任何阶段，都是

[1] 参见列宁《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5页）

[2]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1页）

实践证明：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他，只有在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更正确的感觉他。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是解决本质问题，只有在实践过程才能暴露其本质而理解他。

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各阶段，不是被用不可逾越的界限互相分离的。依实践所证明：并不是我们感觉到什么东西，就立刻开始理解它；反之，也不是理解到什么东西，就不感觉到它；只有在理解了什么东西时，才更正确、更深刻的感觉到。我们与曲解党的一般方针的人们斗争时，不一定是在最初就把握着那事实的本质的。最初我们只感到有些地方不对，往往不能彻底证实它，这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才开始理解到反对者的错误的体系。虽然那样，但我们在最初仍然理解着，关于某一问题，左翼或右翼是怎样离开党的一般方针的。以伊里奇的中委为首班的党，当着和托罗斯基[1]派及右派相斗争时，多数的党员虽知道两派的个个的错误，却没有知道两派错误的全体系。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即托派和右派的曲解到最后完全结晶时，我们才能在其全体上，在其内的联结上理解了托派与右派的反党的见解。

此例很好

认识与情感之关系

当我们理解某件事之时，我们当然不仅是说明它，而且还悲叹，还发怒，还愤慨。……

思想与感情的统一

多数派[2]党员的显著的特征，就是：在他们底下，思想感情与兴趣，并不抵触，如激流一般向着阶级的敌人斗争，去实现社会革命所课责于

[1] 托罗斯基（1879—1940），现译托洛茨基。

[2] 多数派，现译为布尔什维克。他们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时占多数。

我们的伟大的任务。

感性的认识与论理的认识，互相发展，互相丰富其内容，这一层，可举实例来说明。……于是从小布尔乔亚[1]意识到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意识之急速转变，就在农民之中发生了。可是随着对于现实的新理解，随着普罗列达里亚意识的成熟，又现出新的感觉。从前伟大建设的欢喜，在他是一场空。于是劳动变成于他不适宜的东西了，在他看来，劳动只是“绞汗”，只是压迫。……于是劳动对于他已不但不是压迫自己的负担，而渐渐变为“名誉，勇气，与光荣事业”了。

？

此例不甚清楚

感性的认识与论理的认识，只是反映了离我们意识独立存在的客观的实在的不同阶段。感觉是当作外界作用于感官的结果而发生的。至于概念，就是从感性的经验发生的。概念是把认识主体在感觉或知觉现实的过程上所得的材料，加以改造，加以普遍化的东西。

对

感觉和概念，都是对象的肖像，即离开我们意识独立显现的过程的模写。

对

我们的感觉和概念，是客观的现实之正确的反映么？答复这个问题的，就是实践。“对象的真理到达于人们的思维与否的问题，不是什么理

说得很好

[1] 小布尔乔亚，即小资产阶级。

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们必须在其实践上去证明真理，即证明其思维之现实性与力，证明其此岸性。从实践游离了的思维之为现实的与否之论争，是一个纯粹烦琐哲学的问题。”[1]（马克思）[第203～213页]

实践证明是否是真理

在实际上实行理论，也就是试验理论。为真理之标准的实践，并不是真理向它前进，停在那里试验它的努力而又进行的那样的阶段。实践并不是一种“装饰”。一切社会生活，并不是像垫子那样用理论与实践的布片缝合了的东西。为真理之标准的实践，贯串着我们的认识的全路程。整个的革命，实行了马=伊主义[2]，即只有革命，纠正了并论破了马=伊主义的曲解。

实践贯串着我们认识的全路程

为真理标准的实践之完成认识的路程，这是在理论被实现于实践之中的意义上说的。但在实践上能够实现的理论，必须是从现在之社会的实践产生，而正确反映自然及社会的现实之发展路程的那种理论。

理论从实践产生，如果正确反映客观外界的发展过程，然后再应用这种理论于实践，就能在实践上实现这种

照上面所说，唯物辩证法，是认定“生活的见地、实践的见地为认识论的第一而且根本的见

[1] 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2] 马=伊主义，即马列主义。“伊”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即列宁。

理论，完成认识的路程。所以认生活与实践的见地为认识论的第一与根本的见地，是唯物辩证法的见地。

地”[1]的。

然而反马=伊主义的理论，也是依赖于实践的。它们究竟是怎样解释实践的呢？

资产阶级的实践观——实用主义的实践观，是只顾目前不顾将来的实践观。他们所谓真理，是主观的部分的真理，没有客观性与全体性。

就资本主义美国“流行的”布尔乔亚的实用主义，举例来说。……实用主义的实践观，是逃回过去的阶级的、具有利己主义与私有财产的阶级的，适合于布尔乔亚状态的布尔乔亚的见解。资本家是所见不远的。对于利润的渴望，使他们不能洞察将来。“捉住这一刹那呵！”——这是美国“实业家”的口号。这就是典型的实利主义的实践观。

机会主义的实践观的特点：（一）埋没弱点；（二）不把握整个发展，屈服于个个事实；（三）没有看穿

布尔乔亚的=少数派的实践观，我们的托派和右派，也是有的。埋没弱点；不把握整个发展而盲目的屈服于个个事实之前；没有看穿现实的矛盾的深处之能力——这些，便是机会主义的实践观的特征。对于实践作这样的解释，就是从科学的理解——只有科学的理解，才能使人们把握并理解整个的现实与整个过程的运动——分离出

[1]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2页）

现实的矛盾的深处之能力。这就是抛弃科学理解的实践观。

行动。

马克斯主义的实践观，是伴随着洞察究极目的之实践。

马=伊主义的实践观，和它完全相反。马=伊主义的所说的实践，是伴随着洞察和究极目的之理解的实践，是当作展开了的阶级斗争看的实践。

在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的认识论，也和观念论的认识论一样，想在物质的实践，在社会的=历史的实践之外，去解决认识的路程如何的问题。因而在认识的种种阶段与要素（感官与思维）之间，就缺乏了联结。这种分离，就进到了从论理的认识分离感性的认识之方向。哲学家之中，有认定感性的经验为认识的真实源泉而轻视思维的意义的人；反之，也有只认定思维为真实的东西而怀疑的去处理感性的经验的哲学家。前者是从含有“经验”意义的希腊语的“Empiria”采取的，被称为经验论；后者是从含有“理性”意义的拉丁语“Ratio”采取的，被称为唯理论。[第213～216页]

经验论和唯理论

经验论——倍根[1]与巴克

经验论的创始者，是英国哲学家培根。但他的学说，没有如后起的洛克的学说，以及主观观

[1] 倍根（1561—1626），现译培根。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来[1]、休谟的区别。

念论代表巴克列与休谟的学说中那种粗笨的一面性，也没有使感性的东西与论理的东西相分离。至于巴克列和休谟的哲学，是从极端的经验论出发，从专承认知觉一事出发的，他们否定论理的概念对于认识所具有的意义，把论理的概念，看做是由悟性引入于我们的认识中的制造品。[第216页]

唯理论的缺点

唯理论有两个重要的缺点。第一是否定概念由经验而生，所以最初的概念，从他出发而到达于真理概念，究竟是从什么处所发生的问题，他们是不能说明的。第二，唯理论是同样从否定经验的认识的真理一事出发的，所以不能从抽象的思维过渡到个个感性的事物之认识。唯理论的这些缺点，在它的发展中显现了出来。[第217页]

根源的性质

认识以实践始以实践终

……伊里奇说："马赫很知道：在实践上，人们不可避免的就变为唯物论者。人们在社会的活动上，直接与自然联结着，因为要做出某种事物，人们必须从自然所供给的材料出发，即在实践上承认物质的第一次的性质，而变为唯物论者。所以马赫应用观念论者的全气力，要从认识论排除实践。因为这件事是把认识论变为观念论的东西的唯一手段。"……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据伊里奇的意见，其中必含有实践。……

[1] 巴克来（1684—1753），在其他处又译巴克列等，现译贝克莱。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第218页]

普列哈诺夫看轻实践

……蒲列哈诺夫超出论理的证明之界限以外的事是很稀少的，但他对于实践却看得很轻。譬如，一切观念论对于现实的曲解，其本质与根源，是在于从认识过程分离实践，是在于放弃为真理之标准的实践，这种地方，蒲列哈诺夫并不曾用力说来。[第219页]

## 四　真理论

……

？[1]

……人类的认识，在各个被给予的历史的瞬间，不能完全究明无限的这些联结。所以各个一定历史的瞬间中所得到的知识，是被限制着。绝对的知识固是不可能的，而知识之渐趋于完全和深刻，即是可能的。[第236页]

我们主张参加反法西〔斯〕战争。

……还有更奸巧的诡辩论，就是普列哈诺夫和考茨基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劳动者在特定情形参加某一类战争的理论，去辩护第二国际对于国际劳动运动的背叛。例如，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曾经主张西欧国民参加于对俄战争。恩格斯在一八五九年，也曾表同意于德国对法国的战争。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在当时陈述那样的

[1] 毛泽东在此处用红铅笔、黑铅笔、毛笔批了三个相叠的问号。

意见呢？这是因为在一八四八年当时，封建的俄国演着国际的宪兵之任务，演着扑灭波兰及匈牙利的革命之任务；在一八七〇年当时，德国对法国的战争，含有对拿破仑三世的世界帝国的战争的意思，含有德意志国民的统一的意思。……[第250～251页]

96[1]

## 第三章　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

### 一　发展之质的规定性

……科学的认识之任务，在于渗入过程的深处，暴露过程之发展的原因，认识过程的根本矛盾及内的规律性，并由此去阐明多种多样的现象与现象间的相互联结。但，我们并不是一次就认识现象的法则，而是经过许多的阶段才认识它。我们在社会的实践上，首先碰到相互联结的极复杂的种种现象。我们的思维集中注意于这些现象时，首先要确定一种现象和他种现象的差异，这个事物和别个事物的差异。

？

研究从辨异入手

我们当观察在与他种事物相互作用中的某种事物、某种现象之时，首先不能不确定这种事物

[1] 这是毛泽东注明的本章页数。

和他种事物不同的所在，这一过程和另一过程不同的所在。

苏维埃经济，究竟和资本主义经济有怎样不同的处所？苏联进到社会主义时代的阶段，和新经济政策最初的阶段，究有怎样不同的处所？认识任何过程时的第一任务，就是确定那过程的特性。这即是暴露那过程的“质”。所谓“质”的范畴，自古以来，就已知道了。古代希腊哲学者们，譬如说亚里士多德，首先就要求了研究任何过程的质。

认识过程先确定过程的性质，与其他过程的性质有什么不同，即认识其特性。

所谓暴露过程的质，就是指示过程之最单纯的、最根本的规定性。我们暴露出过程的质，就踏上认识的第一阶段。在认识了过程之质的特性后，我们就更进到过程的深处。

认识其最简单最根本的性质，由此再进到深处。

质，是唯物辩证法最初的范畴。过程的质，不是如机械论者莎拉比雅诺夫[1]所主张的那样，也不是如一切主观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它不单是我们思维能力的产物，它是在实在的现实中存在着而被人类意识所反映的东西。进到社会主义时代那个阶段的特殊性，不是人类头脑所规定的东西；不论人类意识它与否，它现实的存在着。

过程的简单的特性，是唯物辩证法最初的范畴，他是客观存在的。

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地存在着，具有使它和以前的社会形态相区别的许多特殊性。即，发达了

战争首先分析特点，统一战

[1] 莎拉比雅诺夫（1886—1952），现译萨拉比扬诺夫。苏联哲学家。著作有《历史唯物主义》等。

线也是首先分析特点——中日矛盾与国内矛盾。

的商品交换，剩余价值的占有，产业预备军，资本家的企业，利润，商业的利益，利息，货币地租，加特尔，托拉斯，金融公司，产业恐慌等等。我们仔细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就看到这些现象是贯穿于自由竞争时代及帝国主义时代的各阶段的。帝国主义时代，同时具有自由竞争及独占，同时具有个人企业及托拉斯，加特尔，金融公司，同时具有商品输出及资本输出，等等。

过程许多特性之中有根本特性，例如劳动动〈力〉买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性，他规定这社会中其他许多特性。

前面说过，质就是一定过程之根本的最初的规定性。我们要确定资本主义的质，不可以单只数出资本主义的全部特殊性就算了，还有阐明它的最初的规定性之必要。资本主义之最初的规定性，是当作商品交换的发展及生产手段从生产者分离了的过程之结果看的、所谓劳动力那种特殊商品的发现及存在。资本主义的其他特性，完全受这个根本的特性所规定。（所谓最单纯的最根本的规定性，最初的规定性，根本的特性，就是所谓本质。本质以外，还有其他许多特性，为本质所规定。）[1]如果只把一定过程的标帜一齐数出来，那还不能探出那个过程的发展法则。例如培根那样的经验论者，他分析某种事物、某种过程时，是数出那过程的一切标帜的。固然，这种

指出过程的一切特性是必要的，尤要指出根本特性，才能认

[1] 以此种形式排印的是毛泽东写在行间的批语，下同。

识过程之发展法则，因法则是包含于根本特性之矛盾发展中。例如资本主义法则包含于劳动力买卖这个根本特性之矛盾发展中。

工作是必要的；但只是这样，还不能认识一定过程的运动法则。（倍根研究方法之错误。）反之，暴露出最单纯的规定性时，我们就能够确定运动法则。因为，法则的本身是被包含在这样最初的、最单纯的规定性之矛盾的发展中。

过程发展，根本特性（规定性）也随之发展，在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获得特性，直至过程完结为止。例如劳动力出卖者（工人）的性质。

适应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那个最单纯的规定性也随之而发展，愈益获得新的方面，并丰富其内容。商品交换越发展、扩大，劳动力出卖者的质，就越发增加。不论资本主义通过如何的阶段，这个资本主义发展之最单纯的规定性，就在每一阶段获得特殊性而被保存着。在一定的过程存在而没有消灭的限度内，那个过程的质是被保存的。

帝国主义时代，虽说由于许多特殊性而与自由竞争时代有区别；但是，整个资本主义的质，在帝国主义时代，仍然保存着，发展着。

帝国主义阶段与自由主义阶段各有许多不同的特性，但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始终存在的。[1]

[1] 以此种形式排印的，是毛泽东的批语。下同。

不但要认识整个过程的根本性质，而且要认识这个过程各阶段上性质的差异。

对于任何过程之具体的研究，不仅要求研究整个过程之质，并且要求在其相互的质的差异上，去研究这个过程的种种发展阶段。

苏联经济三个阶段中，不但苏维埃制度的根本特性发展加强了，而且各阶段都有不同的质。

例如，苏维埃经济，在其发展中，经过了两三个阶段。即，经过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复兴期、再建期，现在进入于社会主义的时代。每一阶段都把全体的苏维埃制度的根本特性发展了，并且加强了；同时，各个阶段又各自具有相异的质。[第253～257页]

?

过程各阶段是统一的，但根本特性在各阶段中都有新的发展，认识各阶段中的特点是必要的。

固然，各个发展阶段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先行的阶段是以后各阶段的准备，但各个阶段，都独特的发展了整个苏维埃制度之规定的特殊性，即“质”；我们必要记住这一层，去考察各阶段之质的特殊性。

质表现于许多特性中。

发展的各过程各阶段之质，显现于许多特性之中。

任何过程都有许多特性，为其根本的质

不单是社会过程如此，即客观世界的任何过程，也都具有为其固有的质之发展所规定的许多

所规定。

特性，都具有许多的固有性。

一切过程依一定方面互相联结，例如苏联与外国依条约与军备与外国联结，这些方面根本上为过程的质所规定。

我们知道，所谓孤立的过程是没有的，一切过程都依一定方面互相联结着。例如，苏联即处于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结之中。这个联结，显现于许多固有性之中，这些固有性，如以对外贸易的独占及苏联之强化为目的的许多条约关系，以及巩卫苏联之必要的军备等即是。

过程中质的发展使得过程的固有性随之发展，例如恐慌随资本主义之根本特性而发展。

过程的质之发展，规定过程的固有性之发展。例如，随着资本主义的根本特性的发展，恐慌也发展起来，尖锐化起来；产业循环期，每次都呈现为新的独特的形态。譬如，在战后帝国主义时代中，恐慌及不景气的期间延长了，好景气的时候非常的缩短了。

固有性有本质的非本质的。

固有性有本质的及非本质的。例如，产业循环期之周期的交替，对于资本主义是本质的东西；但在好景气之时，某部分的恐慌高涨起来，那是非本质的。就运动过程的各阶段说来，某种固有性虽是本质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在以前的发展阶段上虽不是本质的东西，而在特定阶段上却变成本质的东西。这在相反的情形也是一样。……

过程发展有原为本质的固有性变为非本质的，有原为非本质的变为本质的。这个区别是

对于固有性之本质的东西及非本质的东西，

必要的，否则错误。

如没有区别的能力，就要引到错误的结论。……[第258～260页]

过程的质只有通过各阶段的固有性才能发展。

任何过程之根本的规定的特性、即它的质，只有通过各阶段的固有性之发展而发展。[第260页]

固有性的发展，促进过程由一阶段转变到他阶段。

保存整个过程的质的固有性之变动，促进那过程的发展，招致由一发展阶段到他发展阶段之过程的转变。

过程有共同特性又有多数方面，这些方面又都有其特性。

各过程互有质的区别，同时，又具有被一个规律性所连系的多数方面。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分配、消费，表现为一个生产方法之质的差异的方面。

过程有质的一方面，还有量的一方面。

质的规定性，只给与我们以过程的一方面的认识。在确定了过程的质及其固有性之后，我们的认识更加前进，进到下面的阶段——过程的量的规定性之认识。

## 二　发展之量的规定性

……

世无无量之物。

我们在一切过程上，都与量的规定相接触。过程之量的规定性，不是我们头脑的创造物。它不像怀疑论者及主观主义者所想的那样，它不单

依一定方法，使过程的要素及方面完成量之发展。

是我们的表象，而是存在于客观的现实之中。不具有量的规定性的事物，一个也没有；又，不依一定方法使其自身的要素、自身的方面成就量的发展的过程，一个也没有。

量与质，不是各自独立的存在着的东西。

量与质是同时存在（非分割的），同时发展，二者是统一的。

不同过程，量也不同。布匹、人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量之发〔展〕都不同。

……不同的过程，具有不同的量的规定性。布匹不能用里特[1]去测量，人的寿命不能用启罗格兰姆[2]去测量。资本主义，描画着腐朽的曲线而发展；苏维埃制度，描画着成长的曲线而发展。过程之量的规定性，其发展的期间及速度。依存于过程之根本的特性，为过程之质所规定——这一层，从前面关于质的陈述看来，是不难理解的。[第261～263页]

量的发展速度，依质的情况而不同，质规定量。

任何过程量的特殊发展，为特殊的质所规定。

任何事物，任何过程之特殊的量的规定性，都为那事物的质所规定。

质在过程各

特殊的被规定了的量之变动，起于过程之各

[1] 里特，现译升。

[2] 启罗格兰姆，现译千克。

阶段中起变〔化〕，规定着量也起变化。

阶段的发展之中。

量的变化也促进质的变化。

计划经济的发展及强化，社会主义关系的优势，农业的半数以上引入了社会主义关系，这些事，使得进到社会主义时代的速度显著的增高，超越再建期及复兴期的速度，而使经济上发生质的变化，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工事的完成。这样沿着加速曲线的成长，变成苏维埃经济之规律的发展现象。

认识质量联结不可分，认识量的发展之特性是最要任务之一。

确定量与质之不可分的联结，确定过程之量的方面之特殊的规定性，是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要求之一。

不了解过程质的特殊量也特殊，以为不同的质却是相同的量。

右翼，左翼以及一般害虫们的见解之理论的基础之一，即在于他们不能理解量之特殊规定性。

红白军质不同，量也不同——行军速度，任苦程

孔德拉捷夫[1]，克鲁曼，查亚诺夫[2]及其他害虫们，都以为苏维埃经济不能成就在资本主义经济以上的发展速度。他们以为，前者和后者一

[1] 孔德拉捷夫，现译孔德拉季耶夫。苏联经济学家。

[2] 查亚诺夫，现译恰亚诺夫。苏联经济学家。

度，作战力量。

国共两党，质不同，量也不同。

路遥知马力，马力是质，路遥是量。

压迫的政策大减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我们学校则不然。

睡得死，能力增加；精神疲劳，则产量减少。

新量〈质〉规定了新量的发展。

分配土地这个政策的质，规定了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大量的扩大红军，发

样，也是沿着腐朽的曲线发展。这种速度论是从那里发生的呢？这种速度论，是由于把苏维埃经济看成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这种速度论，是由于他们没有理解资本主义体系及社会主义体系在原则上是两个相异的体系。右翼机会主义者们，也宣传了同样的腐朽曲线的理论。……他们的任何一方面，都不理解苏维埃制度的特性，开拓着生产力之未曾有的新的发展速度之可能性。他们的任何一方面，都把资本主义的产业发展速度，机械的转用于异质的俄国的条件之上。

右翼之机械论的立场，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当布哈林、路易柯夫、特姆斯基等主张要减低党所公布的速度时，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以为俄国经济的发展，应当按照与复兴期最后数年间相同的速度进行。他们不能理解新的质给与了发展之新的量的规定性，不能理解进到再建期就是意味着新的发展速度——这种无理解，是他们那种见解之方法论上的基础。在苏联进到社会主义时代的今日，右翼及左右两派反对党所采纳的发展速度；其反对的论据，也是这个同样的方法论上的特征。

展农业经济与合作社。

和平与民主政策的结果，使得抗日力量大为增加。

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全国各方面的发展将不可限量，故必须量与质之联结。

机械论者不承认质，只承认量，忘掉一方面。

把一切不同质的现象对立起来是必要的。

因为量的变

对于过程及其各个阶段上量的发展之特殊的规定性，没有理解，这在托罗斯基的场合，特别显明。托罗斯基在第十五次党大会以前，就已要求国内之过度工业化。但是，在俄国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用非常的速度向前发展之时，托罗斯基却不能挝住这一时代之特殊的特性，却反对这个速度，以为过于极端。[第265～267页]

机械论者们不以暴露过程的质为任务，他们以为科学之唯一的任务只在作出现象之纯量的说明。

……布哈林在史的唯物论[1]中，大声疾呼把力学的现象和“有机的现象对立起来……是没有意义的”。机械论者们，要求只研究过程之量的方面。……[第268页]

恩格斯批评那否定质与量之联结的机械论的思想。他说：“机械论的意想，在从地点的移动去说明一切变化，从量的差异去说明一切质的差

[1] 现译名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布哈林1921年著。

化产生了质的变化，反过来质的变化又产生了量的变化。

异；致于质量相互之间所有的关系，质到量的转变，量到质的转变，其中的相互作用，是没有注意的。如果一切质的差异及变化，不能不归约于量的差异及变化，不能不归约于机械的转动，那末，我们就必然的到达于如次的命题。即，一切物质都由同一的极微体构成；物质的化学要素之一切质的差异，都起于这些极微体在原子中被统一时之数量的差异及空间的集结。”[1]

？

## 三　由量到质及由质到量的转变的法则

质在量中发展。

量发展便变为新质，新质发生，新量也发生，质变为量。

如上所述，没有无量的质，也没有无质的量，——质量这两个方面，在客观的现实上，是在统一之中被给与着。质在量之中发展，即一定的，特别的，被规定了的过程在量之中增大，使其一切方面或要素发展。量，特别的被规定着。过程发展其一切方面而转化为其对立物。过程之量的增大引导其自身转化为新质。——量转变为质。

另一方面，新质的生成，同时就是新量的发生。——质转变为量。

只有依量的变化质才能变

恩格斯把由量到质的转变及由质到量的转变，认作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之一，他说：

[1]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96～597页）

化，也只有依质的变化，量才能变化。

人多成王。温度增减成固、液、气。王子筷子集散。地小不足回旋，地大则否。英勇〈雄〉无用武之地。有机体。帝国主义。苏联经济。民主运动。抗日运动。长袖善舞、多财善贾[2]。韩信将兵。

“这个法则，为着我们的目的，可以这样表示出来。即，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只有依着各个场合中正确的被规定了的方法——物质之量的增减及运动，才能发生。”[1]

无论观察任何过程，过程之量的增大都引到新质。在气压不变的情形下，温度降至摄氏零度，水变成冰；温度升至摄氏百度，水变成蒸气。

如达尔文所证明，有机体中渐次的量的变化，引到有机体中之质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独占之量的增大及扩张，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其他方面的增大相并行，导入了资本主义之新阶段的发展，即帝国主义。在苏联，贯通于国民经济全线之社会主义要素的成长，引起了由复兴期到再建期的转化。[第269～272页]

第二种见解，对

过程间的转变的方法

各过程之量的增大，受那过程的构造所规定。各以独特的方法显现。苏联向社会主义的推移，向过渡期的社会主义时代的转化，也各以独

[1]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

[2] 参见《韩非子·五蠹》。原文是：“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

特的方法显现着。

对　　所谓量到质的转变，就是一定的质及其量的规定性，同时转变为具有别种量的规定性之别种质。

对　过程间的转变与过程中的转变之区别　　把一种过程到他种过程的转变和过程内部的转变相区别，把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转变和质量内部的转变相区别，这是必要的。

民主革命过程中，辛亥革命、袁世凯、五四运动、大革命、苏维埃战争、民主共和国，各阶段不同，每阶段内还有一些小的阶段——例如争取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过程与阶段的区别　　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转变，例如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就是到新形式的规律性的转变。反之，质量内部的转变，例如由单纯的资本主义协作转变到工场手工业，更进而转变到机械的生产方法，乃是质量之特性的发展，乃是质量由一阶段到他阶段的转变。各阶段，使从前阶段的各方面在量之中发展着，并且添加几多新的方面和属性，而与从前的阶段有质的区别；但是，截至某一定的瞬间，还没有引导到全体的质量向新的质量之转变。

连续的中断　　一切质量，到达某一发展阶段时，就中断其一定的发展过程，而转化为别种质量。

通过飞跃或　　一种质到他种质的转变。一种质量到他种质

革命而表现

量的转变，通过飞跃而显现。例如，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是通过革命而显现的。

承认飞跃的发展，是辩证唯物论中心特点之一。

承认飞跃的发展的道路，乃是辩证唯物论之中心的特性之一。

自然、社会、思维，都有飞跃。

不论在客观的现实之一切领域中，或在思维之中，都发生飞跃。一种质到他种质的转变，完全是飞跃。这因为在那一瞬间即转变的瞬间，旧质失去了作用，以旧质为基础而生长了的新质开始发展。一切飞跃，都是“连续性的中断”。这因为在那一瞬间，旧物之量的发展被中断，而新物的发展即新质量及新质的规定性开始发展。

飞跃的瞬间，旧质消灭，新质产生（以旧质为基础）。

旧物之质与量都中断，新质与量开始发生。

旧过程是新过程的准备，旧阶段是新阶段的准备。

新质不是一时突然出现的。旧质之一切从来的发展，是新质的准备。机械的生产方法是由工厂手工业的发展所准备的；手工业之部分作业的细分，准备了向着机械的推移。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进行，资本的聚积及集中，普罗列达里亚的成长等等，所准备了的。

新过程或新阶段中保存着旧

新质从旧质生长出来，而且在长时间还保存着若干旧来的特征及方面。资本主义，在长久期

质的残余，而且长时间新旧错综，但有主导。

间，还保存着单纯商品关系及若干封建的遗物。

不但过程而且阶段，凡有质的变化就是飞跃。

我们不仅要考察一种过程到他种过程的飞跃，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飞跃，例如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飞跃；并且还要考察过程内部或质量内部的飞跃。在资本主义以及苏维埃经济中，由一发展阶段到他发展阶段的转变，是一个飞跃。这因为它在质的方面转变到新阶段。

这一认识却要紧。

这种飞跃是与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飞跃有区别的，因为它是在当作全体看的过程之一定规律性的范围内所发生的飞跃。

一切客观过程都如此。

质量内部的飞跃、种种方面的飞跃的发展路程，是客观现实的一切过程之发展中所固有的。在动物及人类的有机体中，显现着万千的飞跃的变化；生物学上的种，通过若干的飞跃而变化；化学上的原素，其形成及分散，都是飞跃的。

飞跃各以独特的方法

各种质量，以其独特的方法，转化为他种质量。唯物辩证法要求认识特殊性及规定性，要求认识转变及飞跃。

举例

由新经济政策的再建期到社会主义时代的飞跃，和那到资本主义过渡期的转变，带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飞跃的特

飞跃的特殊性及形式、期间、速度及强度，

性、形式、速度、强度，因过程的不同而不同，即受旧质的特性所规定。

都受旧质的特殊性——它的构造、及新生长着的质的特性所规定。由水到冰的飞跃，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但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飞跃，却必须伴着资本主义内部的发展的若干飞跃的方面所经历的长时间。唯物辩证法要求认识过程之质，要求摘出飞跃的特殊性。

举例

辩证法要注意飞跃的特性。

德波林的离开实际，也不知过程内部的飞跃。

德波林一派，对于飞跃的特殊性虽曾给以一瞥，但他们之中，谁也不能用具体的实例去指示这种特殊性。德波林一派，更没有提出质量内部的飞跃的问题。

托洛斯基也不懂

不能理解飞跃的本质及其特殊性，这是把不同时代不同过程的飞跃作同视的托罗斯基的特征。

机械论

对于飞跃的发展方法之否定，是机械论者的特征。机械论者否定质，只承认量的发展，因此，他们当然也否定飞跃。

视飞跃为神秘

波格达诺夫[1]肆口嘲笑了辩证法之神秘的飞跃。有些现代机械论者，以为飞跃只存在于我们头脑之中。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只是不断的量的发展。机械论者，是站在所谓渐次的发展、过程

渐进主义

[1] 波格达诺夫（1873—1928），在其他处又译波格达洛夫等，现译波格丹诺夫。俄国社会哲学家，经济学家。

庸俗进化论

的渐次的增减之见地上的。这种渐进主义的见地，正是一切修正主义的基础。……[第272～276页]

渐进主义是庸俗的经验论，忘记阶级根本利害。

……渐进主义的见地，陷于鄙薄的经验论及拜金主义，忘记阶级之根本的利害，导入于基尔特气习[1]的游戏。

以上论过程质的特性及量的特性。

## 四　当作辩证法的本质看的对立之统一及斗争

以下论过程发展之内的规律性。

以上，我们确定了过程的特殊性、其质的特性及量的特性，现在，要进而考察过程的发展之内的规律性。

两种见解

在人类思想的历史上，有关于发展的两种根本的见解。依照第一种见解，所谓发展，是存在物之单纯的增减。……

第二种见解，以为一切事物都由于对立的斗争、由于统一物的分裂而发展。……

第一种见解，机械的发展观，发展由于量的增减。只从片

第一种见解是机械的。这种见解，从现象的表面出发，只能从外面去记载过程的增减，而不能说明过程的运动之内的原因，不能指示出一定

[1] 基尔特气习，基尔特，现译行会。基尔特气习，即行会习气。

面与外面看问题，不从全面与里面看问题，不能说明事物发展的原因。

的过程怎样发展并为什么发展。……

第二种见解，唯物辩证的发展观，暴露过程自己运动的源泉。所谓认识过程，就是暴露出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各方面，确定这些方面之相互关系，追求过程之矛盾的运动。

第二种见解，不停留于现象的表面，而深入于过程的底层，暴露过程的发展之内的法则，确定一定过程之发展的原因，在这种场合，不在过程的外部而在过程的内部去发现发展的原因，主要的注意在于暴露过程的“自己运动”的源泉。依照这种见解，所谓认识过程就是暴露出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各方面，确定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追求过程之矛盾的运动。……

第二种见解，是辩证唯物论的主张。

把过程在其分裂上去认识，考察过程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相互关系时，我们就能认识过程由发生到消灭的发展。所以列宁

伊里奇说，统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之认识，是辩证法的本质。这是说，把过程在其分裂上去认识，考察其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相互关系时，我们就能认识过程由发生到消灭的发展。这个法则，贯穿于客观的现实及我们的思维之一切方面。

说：对于统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之认识，乃是辩证法的本质。

仅认识过程之互相区别、互相对立的许多方面与许多属性，以及认识这些方面与这些属性之互相联结，是必要的，但是不够的；还须认识所以使过程〔发展〕之根本的矛盾，这就是自己运动的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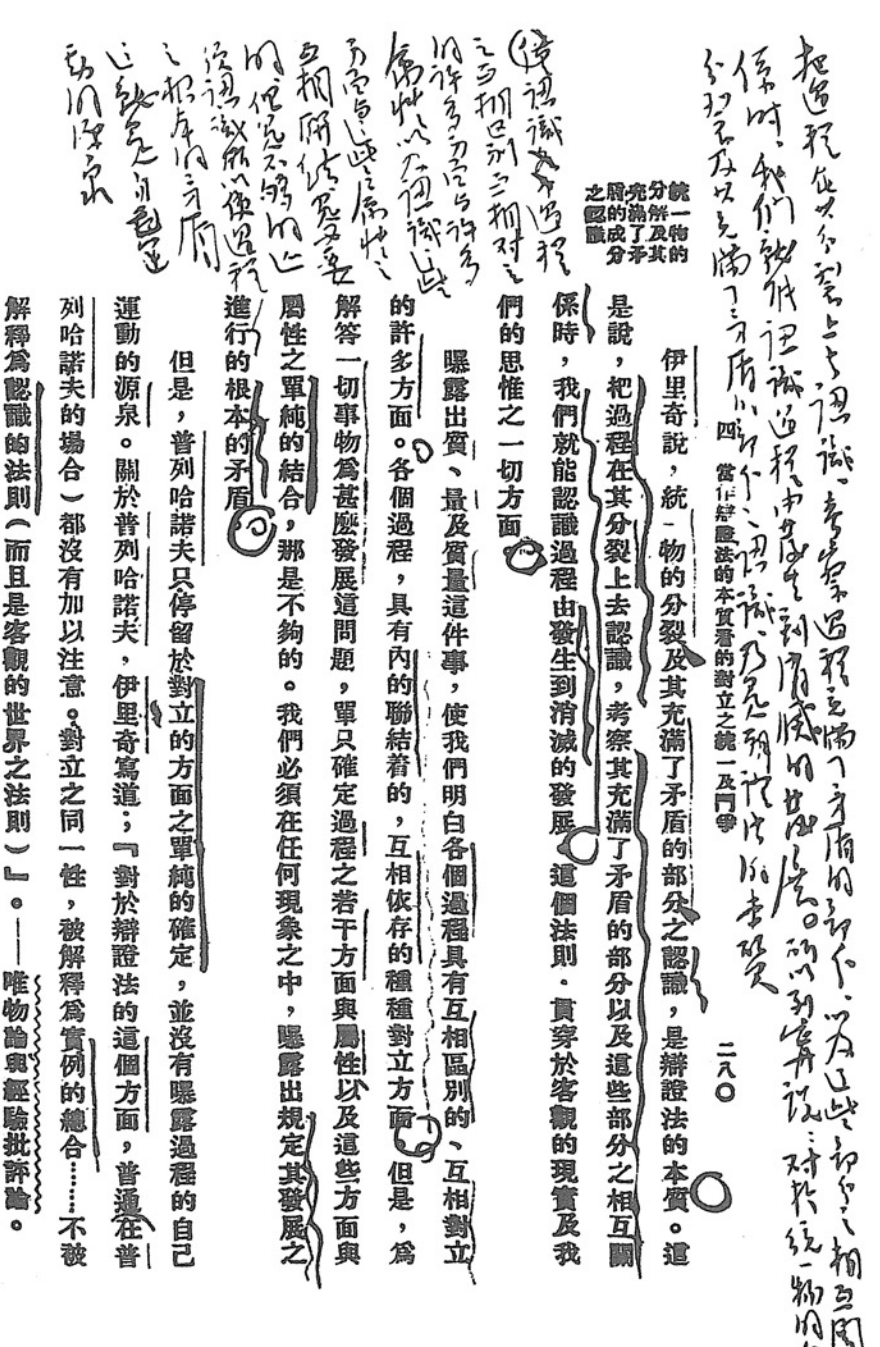
暴露出质、量及质量这件事，使我们明白各个过程具有互相区别的、互相对立的许多方面。各个过程，具有内的联结着的，互相依存的种种对立方面。但是，为解答一切事物为什么发展这问题，单只确定过程之若干方面与属性以及这些方面与属性之单纯的结合，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任何现象之中，暴露出规定其发展之进行的根本的矛盾。

但是，普列哈诺夫只停留于对立的方面之单纯的确定，并没有暴露过程的自己运动的源泉。……[第277～280页]

## 五　统一物的分裂，本质的对立之暴露

马克思前后的布尔乔亚经济学，认为布尔乔亚制度不但现在存在着，今后也将永久存在；那种经济学不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性，不认识资

不认识矛盾，便不能认识过程的发展法则。




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的手稿。

本主义走到死灭的内的矛盾。甚至于亚丹斯密[1]、李嘉图一流的进步学者，虽承认价值是体现于商品中的人类劳动，却仍不能暴露资本主义之根本的发展法则。这是由于他们没有看见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之现实的辩证法，去对抗布尔乔亚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他说："不要矛盾的独断，而代置以构成那独断所掩蔽了的基础的矛盾的事实及实在的矛盾，才能使经济学成为实证科学。"

旧经济学与新经济学的区别

马克思暴露了布尔乔亚生产方法的主要矛盾，由此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则。

马克思在资本论之中，指摘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及其"自己运动"的主要源泉，论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规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矛盾，在于：生产力之发展，在剩余价值生产的名义上显现，而又成为产生剩余价值的手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之发展，陷入于和那狭隘的目的即剩余价值的产生之间的日益不能相容的矛盾。

从生产社会性与占有私人性间的矛盾看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这是根本矛盾。由这根本矛盾发生其他一切矛盾，由这根本矛盾规定资本主义的发展。

不平衡发展

伊里奇指示了资本主义在其最后的发展阶

[1] 亚丹斯密（1723—1790），现译亚当·斯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

是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

段，转化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矛盾极度激化的帝国主义。从分析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矛盾出发，从各国的帝国主义之不均等的发展法则出发，伊里奇论证了帝国主义的锁链中最弱的一环被冲破的现实性，科学的证明了一国中革命的胜利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

九一八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我们论证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现实性，证明了民主共和国的可能，这样去解决这个主要矛盾。

苏联过渡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断发生的基础是富农的存在。其他一切矛盾，都受这个主要矛盾所规定。只有由于工业化及农业社会化，才能将此主要矛盾解决，但有用

伊里奇和斯达林[1]在其著作中，指摘出过渡期之根本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并证明使这个矛盾不断的再生产的根柢，是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和分散的小布尔乔亚农业之间的矛盾，是主要阶级的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民层之间的矛盾，——这农民层中的勤劳者是普罗列达里亚的同盟者，但农民层中的小所有者，却时时刻刻产出资本主义。他们指示了苏联普罗列达里亚和资本主义要素之间的对立（不能相容的矛盾），是怎样产生并怎样成长的。

[1] 斯达林，在其他处又译斯丹林等，即斯大林。

内部力量解决此矛盾之可能。

内部矛盾，不但使社会现象发展，并且使客观现实的一切现象发展。

一切客观过程都由内部矛盾而发展。

现代科学早已不把原子看作物理学上的物质被分解的最后界限，现代科学发现了原子是阴阳电子的统一，并且阐明了这阴阳两电子的交互渗透规定原子之物理的及化学的性质。不仅如此！在二三十年前，物理学及化学尚被认为绝对不变的东西。基于历史的见地，去考察化学元素的性质，还是最近的事情，化学元素在发展着。化学元素之发展的内的根据，就是元素的内的矛盾之运动。

原子的内部矛盾规定原子之物理化学性质。

化学元素的发展由于内部矛盾。

生命现象的自然过程之辩证法的性质，特别明了的表现着。不论在有机体的生命中，或在各个细胞的生命中，生和死、发生和消灭、同化和异化（物质和能力的新陈代谢），都是被给与的内的统一。

生与死、发生与消灭、同化与异化，由于内部矛盾规定有机体现象的发展。

在生存竞争中的变异性及遗传性之充满了矛盾的统一，是有机体发展的主要原动力。

变异性、遗传性之矛盾统一——有机体发展的主要原因。

矛盾统一及其分裂也是思维的法则。

对立的统一和统一物的分裂，是我们思维的普遍的发展法则。如前所述，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运动于相对真理及绝对真理的矛盾中，我们虽认识绝对真理，但在各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我们的认识是相对的。

认识受实践状态及社会历史所规定。

我们的认识，受我们的实践状态及一切从来社会的历史所规定。

统一物的分裂，是一切客观现实过程及思维过程之普遍的发展法则。

统一物的分裂，是客观现实及一切思维过程之普遍的发展法则。辩证唯物论——伊里奇说——“是把发展当作对立之统一（统一物分裂为互相排除的对立以及这些对立间的相至关系）”去观察，因此，“主要的注意在于认识自己运动的源泉”[1]。统一物的分裂，正确的摘发出过程的本身、过程的内容、过程的矛盾、过程之自己运动的源泉的主要矛盾。

所谓对立统一，就是统一物分裂为互相排斥的对立以及这些对立间的相互联结。这就是所谓主要矛盾，所谓自己运动的源泉。

矛盾的特殊

一种过程之内的矛盾，和他种过程之内的矛

[1]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2页）

性，每一不同过程的矛盾互不相同。

盾，是不同质的。那只有依着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过渡的经济之矛盾，各不相同。

托罗斯基主义的特征，就是不理解各过程之内的矛盾的特殊性。托罗斯基不知道帝国主义时代中资本主义之主要矛盾的发展的特性，不知道不均等的发展法则。他之反对一国内社会主义的胜利之可能性，其第一论据就是从此产生。在托罗斯基看来，苏联中普罗列达里亚及农民层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经济中普罗列达里亚及布尔乔亚的矛盾，是同型的矛盾；后一矛盾和前一矛盾同样，只有由于国际革命才能解决。他反对一国内社会主义的胜利之第二论据，就是由此发生。实践，反驳了托罗斯基的理论，证明了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相同的方法去解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普罗列达里亚和布尔乔亚的矛盾，被革命所解决；而在苏联条件下的普罗列达里亚及农民层的矛盾，却由国内的工业化及农业的集体化所解决。实践，把一国内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可能的理论，精当的确证了。[第281～286页]

没有同型的矛盾。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中日民族矛盾要用联合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一九二七〔年〕后的国内矛盾，却只用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劳资间的矛盾，在平常时期要用工人统一战线去解决。党内及革命队伍内正确路线与错误倾向间的矛盾，用思想斗争的方法去解

决。在国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用革命去解决。苏联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则用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去解决。社会与自然间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去解决。过程的矛盾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辩证唯物论看问题，有暴露任何过程内部矛盾的特殊性之必要，同时认识过程各方面的矛盾之特殊性也是必要的。对立的两方面中，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地位，即每方的特性如何，各用怎样的具体形式同对方发生依存关系，在依存破裂时，又各用何种形式同对方斗争。研究这些问

与托罗斯基主义及与右翼机会主义相斗争的课题，教给我们有暴露任何过程之内的矛盾的特殊性之必要。同时，认识那为全体过程的矛盾所规定的过程各方面的矛盾之特殊性，也是必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这样说过：

“普罗列达里亚和财富，是互相制约的对立。并且两者形成一个总体，两者都是私有财产的世界产生出来的。问题就是，这两个对立，在矛盾之中，各占着怎样的特定的地位呢？单只说明统一物的、整体物的这两个方面，那是不够的。”[1]

为理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必须认识普罗列达里亚及布尔乔亚的特殊性，必须认识两者相互的关系及其具体的依存关系，必须认识被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所规定的两阶级的相互制约性。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著《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页）

题，是我们的任务。列宁主义就是研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各种具体形式的科学。

## 六　对立的相互渗透

对立的方面互为条件，一方存在他方才能存在。

内的对立互相结合，对立的一方面如没有他一方面就不能存在。

国家统制与商人自由之对立的统一，此类例子可举出许多，都有这样不可分的两方面互相联结。

新经济政策，内部存有矛盾。斯丹林说："在新经济政策中，必须保存两个方面——一方面与战时共产主义相对抗，以买卖之一定自由的保证为目的；他方面与买卖之完全自由相对抗，以国家的市场统制的任务为目的。这两个方面中，去掉一个方面——那样，在我们之下就没有新经济政策了。"[1]

一切过程都如此，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

充满了矛盾的方面这样不可分的联结，在客观现实的一切过程中，也可以看见。

---

[1] 参见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5页）

对立的两方面相互结合，并转变到新的对立，即所谓相互渗透。

对立，不仅处于不可分的联结中；并且一个对立转变为别一对立，相互的渗透着。

对立的互相结合及其转变即是相互渗透

矛盾的一方面以他一方面为前提，向着他一方面转变。……由工厂手工业到机械的生产方法之发展，同时是生产力的发展，又是新生产关系的发生。劳动力和生产手段的统一，同时是生产力的联结，又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联结即生产关系。工厂手工业中的分业，是生产关系，又表现为生产力。以此为基础，即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交互渗透为基础，展开普罗列达里亚及布尔乔亚间之激化的矛盾的过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立关系的相互渗透

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保存游击性与克服游击性；分配土地的土地私有与准备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

对立的相互渗透，一个对立向他一对立的转变，存在于一切过程之中。为要暴露及指摘这种相互渗透的性质，必须具体的分析过程。

我们进到了社会主义时代，但又经历着新经济政策的最后阶段——这是一个矛盾。我们巩固货币制度及信用组织，实行节约冗费及统制卢布，以节约冗费为基础发展着苏联的商业。货币制度及银行的强化，同时又是社会主义会计、计划训练的造出及强化；冗费节约的实施，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计划化，伸张到作业场、工作组及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与战争；同资产阶级联盟与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叛变；共产党同国民党妥协，正是加强共产党的独立性；军队的休息训练，同时即是加强战斗力；退却与防御，同时即是准备进攻；良药苦口，同时却利于病；忠言逆耳，同时却利于行；羊肉好吃，无奈烫的〈得〉慌；玫瑰花儿可爱，刺多扎手；佳人却可倾国；[2]祸兮福

集体商场。苏维埃商业的发展，同时又是作出生产物之社会主义分配的要素的路程。集体农场是在内部分配利益的亚尔特尔，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企业之一种模型，并且这种企业不久就会变成彻底的社会主义的企业。在国家问题之中，也有与此同样的对立之渗透。社会主义是以国家之消灭为目标的制度。但是，我们正在策进普罗列达里亚独裁[1]的强化。我们所以使国家发展，因为要造出把国家引到死灭的条件。“国家权力之最高的发展，是以准备消灭国家权力的条件为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它‘矛盾着’吗？是的，它‘矛盾着’。但是，这个矛盾正在生动着，它完全反映着马克思的辩证法”。（斯大林）

---

[1] 普罗列达里亚独裁，无产阶级专政一词的旧译。

[2] 佳人却可倾国，参见《汉书·孝武李夫人传》：“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倾城、倾国，既可指倾覆国家，也可用形容女子的绝美。毛泽东这里指旧谓绝美的女子可以误国、亡国。

所倚，福兮祸所伏；[1]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变的对立。一切对立都是这样的。

在民族文化和国际关系的交互关系的问题中，也有与此同样的相互渗透。我们使民族文化发展，但是那种发达，同时是使民族文化死灭、是准备融合民族文化为一个共同的国际社会主义文化的条件。对立的统一及互相渗透，“使得多数派能够在民族问题的领域中，建立坚固不拔的要塞，反映着生动的真理”。

以上苏联的八个例子。

辩证法中心任务，在研究对立的相互渗透即对立的同一性。

正是这个对立的相互渗透，伊里奇名之为对立的同一性。暴露任何过程中对立的相互渗透及同一性，是我们的认识论、我们的辩证法之中心任务。

由对立转到同一：战争是双

伊里奇说：“辩证法，是关于对立怎样能是同一性？又怎样是同一性（怎样变成同一性）？

[1] 参见《老子》第五十八章。原文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方对立，同一是双方和平；国家是双方对立，同一是国家消灭。因为处在一个过程中对立互为条件，经过斗争克服对立，所以能变成同一性。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条件之下，国共对立却变成同一性，而转化为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与侵略战线的对立，在民众起来与世界革命条件之下，却将变为同一性而转化为世界和平。因为客观现实一切过程都是由于矛盾的对立与转向

在怎样条件之下，对立变成同一性而互相转化？为什么人的悟性不把这些对立当作死的、凝固了的东西去观察，却当作生动的、附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观察？等问题的学说。”[1]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1页）

同一性，转向否定之否定。他们本是生动的、附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所以人的悟性这样去观察。

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之对立与转向同一。

对立的互相渗透，同一性，又是我们的认识过程的特征。人类认识的主要矛盾之一，如前所述，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矛盾。相对真理在种种形态上反映绝对真理；绝对真理由顺次的相对真理所组成。

如不具体研究过程，无法了解对立的同一性即相互渗透。

对立的同一性及其相互渗透之暴露，要在过程之具体的研究以后，即在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方面，这些方面的联结及相互制约性的特殊性之具体的研究以后，才有可能。……[第 287～292 页]

认识过程中对立的同一性（或相互渗透），就是认识过程中矛盾着的那些方面（即过种〈程〉中主要矛

研究对立的相互渗透、同一性，就是认识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方面的运动、发展、被制约性及其一切限界的可动性、与这些限界的互相转化。[第 292 页]

盾与若干其他次要矛盾每一种矛盾之两方面）之运动，那些方面的被制约性，那些方面所设界限的可动性，以及那些方面所设界限的相〔互〕转化。辩证法研究这许多，就是对立的同一性或相互渗透。

依照布哈林的意见，互相独立的力存在着，它们互相作用。而且，运动之引起，由于不同方向之力的外的冲突。伊里奇要求首先要认识过程之内的矛盾，发现自己运动的源泉；但布哈林却要求去确定互相冲突的外力。伊里奇要求论证统一物的分裂，暴露对立的同一性，即确定对立的诸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但布哈林却要求只去考察互相独立的力，各自能够个别存在的那样的力。布哈林把对立之统一的法则，机械的去理解。这是由于他从力学的概念、互相独立的力之单纯的冲突出发的缘故。

不是统一物的分裂，而是外在地存在的两种力；不是内的矛盾，而是外的矛盾；不是对立的两方面不可分地结合着，而是而是二力各能独立生存——反

从对立的互相渗透之机械的解释出发，对于

辩证主义的形而上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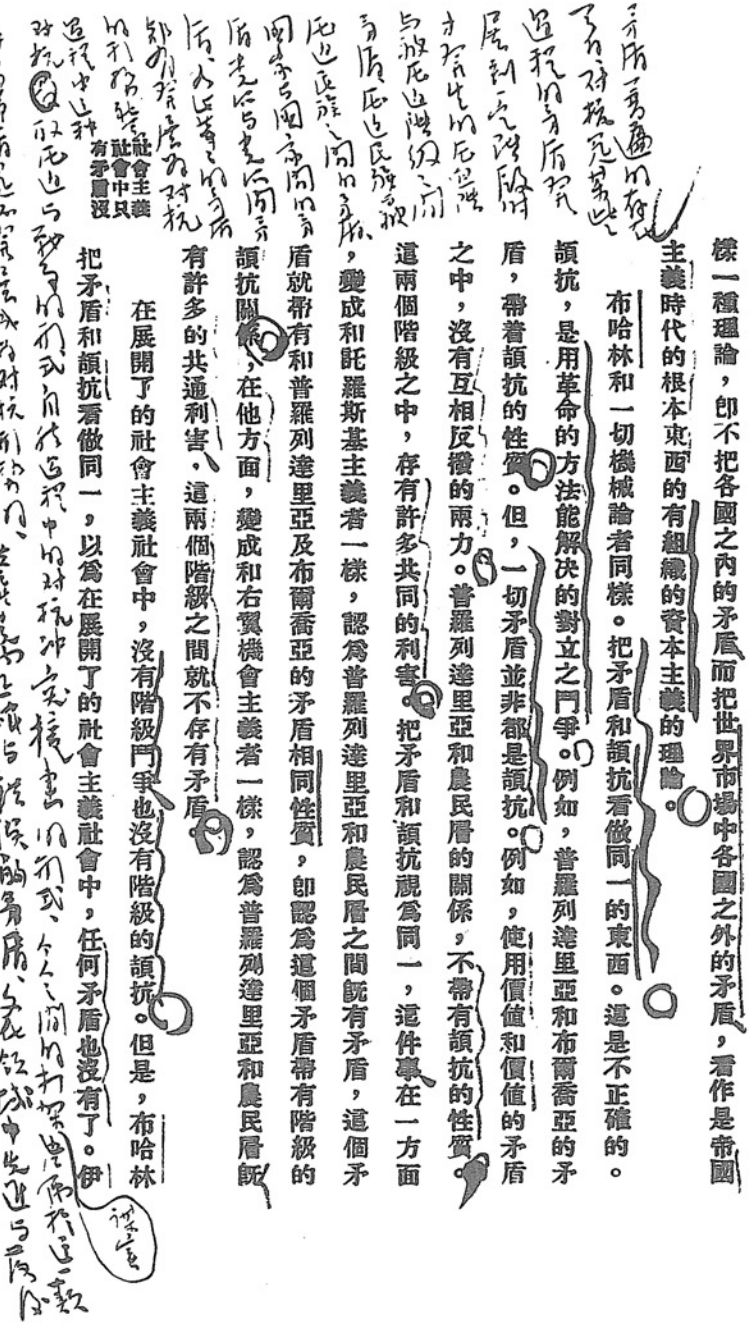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矛盾普遍的存在着，对抗是某些过程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发生的。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矛盾、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国家与国家间的矛盾、党派与党派间〔的〕矛盾，如此等等的矛盾，都有发展为对抗的形势。社会过程中这种对抗，取压迫与战争的形式；自然过程中现时帝国主义的研究，就会产生这样一种理论，即不把各国之内的矛盾而把世界市场中各国之外的矛盾，看作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根本东西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

布哈林和一切机械论者同样，把矛盾和颉抗[1]看做同一的东西。这是不正确的。颉抗，是用革命的方法能解决的对立之斗争。例如，普罗列达里亚和布尔乔亚的矛盾，带着颉抗的性质。但，一切矛盾并非都是颉抗。例如，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之中，没有互相反拨的两力。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民层的关系，不带有颉抗的性质。这两个阶级之中，存有许多共同的利害。把矛盾和颉抗视为同一，这件事在一方面，变成和托罗斯基主义者一样，认为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民层之间既有矛盾，这个矛盾就带有和普罗列达里亚及布尔乔亚的矛盾相同性质，即认为这个矛盾带有阶级的颉抗关系；在他方面，变成和右翼机会主义者一样，认为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民层既有许多的共通利害，这两个阶级之间就不存有矛盾。

在展开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阶级斗争也没有阶级的颉抗。但是，布哈林把矛盾和颉抗看做同一，以为在展开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任何矛盾也没有了。伊里奇回答这种主张，这样说

[1] 颉抗，在其他处又译颉颃、拮抗等，现在一般译为“对抗”。


六　對立的相互滲透　二九四

樣一種理論，即不把各國之內的矛盾而把世界市場中各國之外的矛盾，看作是帝國主義時代的根本東西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理論。

布哈林和一切機械論者同樣。把矛盾和頡抗看做同一的東西。這是不正確的。頡抗，是用革命的方法能解決的對立之鬥爭。例如，普羅列達里亞和布爾喬亞的矛盾，帶着頡抗的性質。但，一切矛盾並非都是頡抗。例如，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之中，沒有互相反襯的兩力。普羅列達里亞和農民層的關係，不帶有頡抗的性質。這兩個階級之中，存有許多共同的利害。把矛盾和頡抗視爲同一，這件事在一方面

社會主義社會中只有矛盾沒有頡抗

把矛盾和頡抗看做同一，以爲在展開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任何矛盾也沒有了。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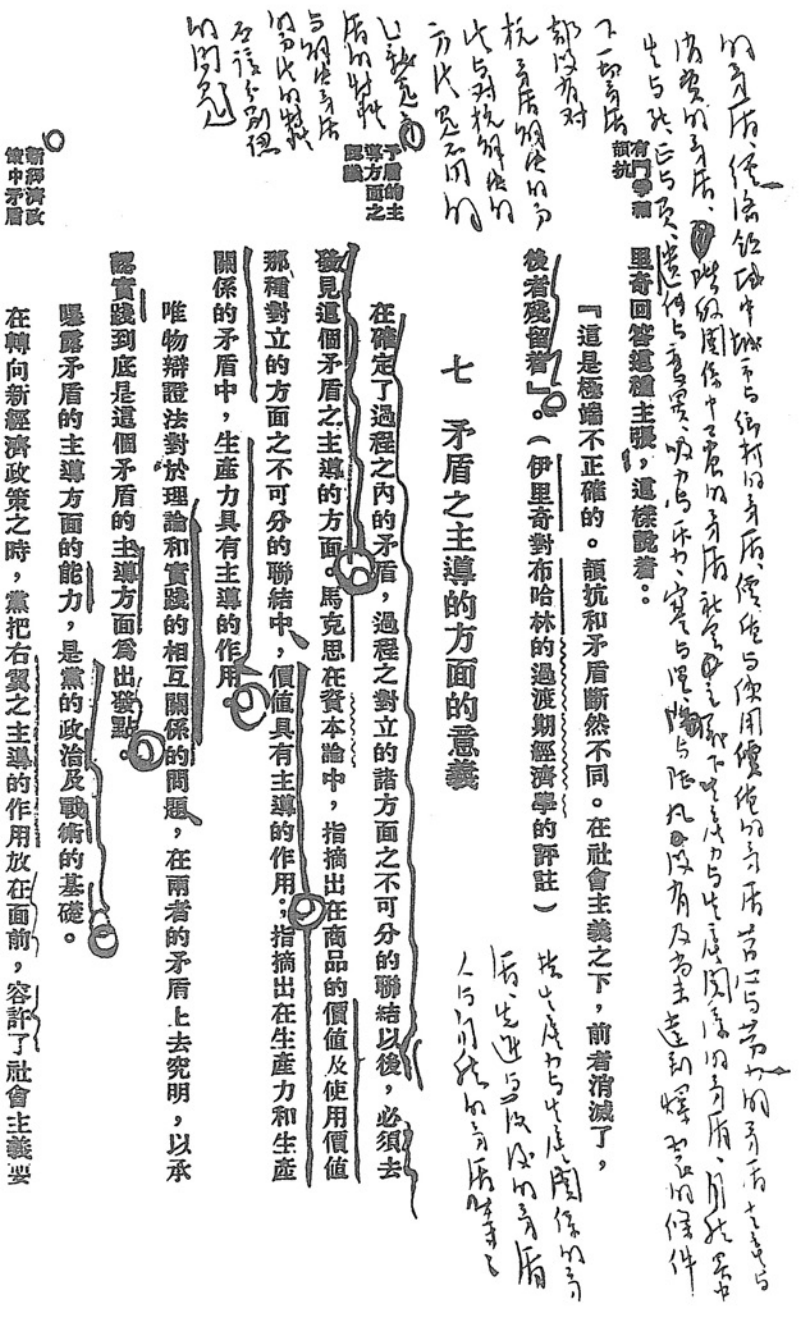
在展開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沒有階級鬥爭，也沒有階級的頡抗。但是，布哈林

有許多的共通利害。這兩個階級之間就不存有矛盾。

頡抗關係。在他方面，變成和右翼機會主義者一樣，認爲普羅列達里亞和農民層既

同樣，認爲普羅列達里亞和農民層之間既有矛盾，這個矛盾就帶有和普羅列達里亞及布爾喬亞的矛盾相同性質，即認爲這個矛盾帶有階級的

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的手稿。



里奇回答這種主張，這樣說着。

『這是極端不正確的。調和和矛盾斷然不同。在社會主義之下，前者消滅了，後者殘留着』。（伊里奇對布哈林的過渡期經濟學的評註）

## 七　矛盾之主導的方面的意義

在確定了過程之內的矛盾，過程之對立的諸方面之不可分的聯結以後，必須去發見這個矛盾之主導的方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摘出在商品的價值及使用價值那種對立的方面之不可分的聯結中，價值具有主導的作用；指摘出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中，生產力具有主導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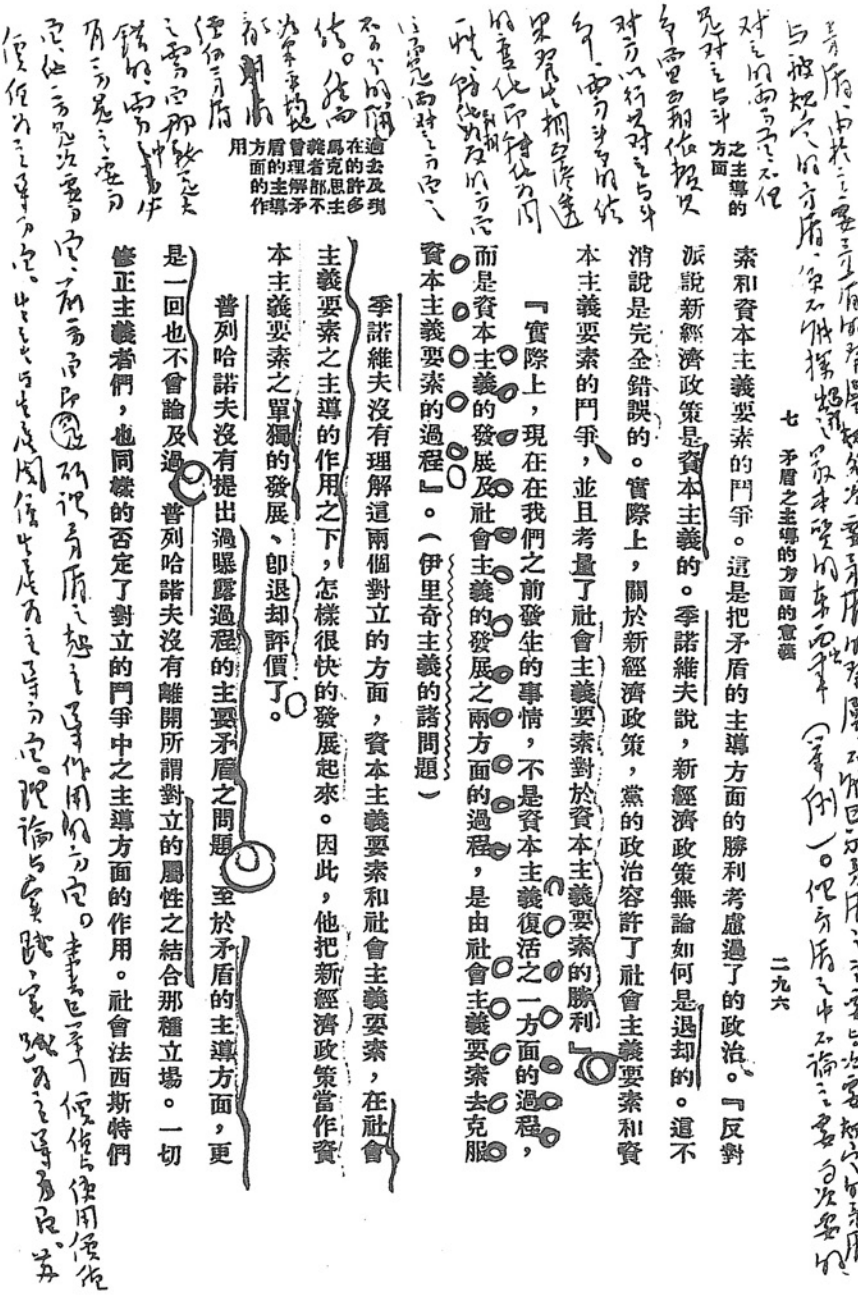
唯物辯證法對於理論和實踐的相互關係的問題，在兩者的矛盾上去究明，以承認實踐到底是這個矛盾的主導方面爲出發點。

曝露矛盾的主導方面的能力，是黨的政治及戰術的基礎。

在轉向新經濟政策之時，黨把右翼之主導的作用放在面前，容許了社會主義要



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的手稿。



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的手稿。

的对抗，〔取〕冲突撞击的形式；个人之间的打架、谋害，也属于这一类。许多矛盾是不发展成为对抗形势的：共产党内，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文化领域中，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经济领域中，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劳心与劳力的矛盾、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阶级关系中，工农的矛盾；社会主义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自然界中，

着："这是极端不正确的。颉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之下，前者消灭了，后者残留着。"[1]（伊里奇对布哈林的过渡期经济学的评注）

[1] 参见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页。

生与死、正与负、遗传与变异、吸力与斥力、寒与温、海与陆。凡没有及尚未达到爆裂的条件下，一切矛盾都没有对抗。矛盾解决的方法与对抗解决的方法是不同的。这就是矛盾的特性与解决矛盾的方法的特性，应该分别认〔识〕的问题。

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等等。

## 七　矛盾之主导的方面的意义

在确定了过程之内的矛盾，过程之对立的诸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以后，必须去发现这个矛盾之主导的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摘出

在商品的价值及使用价值那种对立的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中，价值具有主导的作用；指摘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具有主导的作用。

唯物辩证法对于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在两者的矛盾上去究明，以承认实践到底是这个矛盾的主导方面为出发点

……

季诺维夫[1]没有理解这两个对立的方面，资本主义要素和社会主义要素，在社会主义要素之主导的作用之下，怎样很快的发展起来。因此，他把新经济政策当作资本主义要素之单独的发展、即退却评价了。

……德波林主义者们，在任何的论文中，一点也没有述及应当暴露主导的对立之必要。他们不但没有把对立统一之法则的这一方面作出定式，并且无视了这一方面；这在他们的全体著作中，明白的表现出来。至于卢波尔[2]，则以为理论决定实践，实践决定理论。他没有阐明实践之主导的作用，以为两者单只存有交互作用。德波林把新经济政策只当作资本主义要素和社会主义要素的斗争去下定义，并没有阐明社会主义关系

[1] 季诺维夫（1883—1936），在其他处又译季诺维埃夫，现译季诺维也夫。曾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共产国际主席等职。

[2] 卢波尔（1896—1943），在其他处又译鲁波尔。苏联哲学家。

之主导的作用，也没有指摘新经济政策向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前进的事实。

一个复杂的过程有许多矛盾，这许多矛盾中，有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其他则为次要矛盾。由于主要矛盾的发展规定各次要矛盾的发展，不能区别矛盾之主要与次要、规定的矛盾与被规定的矛盾，便不能探出过程之最本质的东西出来（举例）。但矛盾之中，不论主要与次要的，对立的两方面，不但是对立与斗争，而且互相依赖其对方，以行其对立与斗争。两方斗争的结果，发生相互渗透的变化，即转化为同一性，转化到相反的方面，这即是两对立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然而，如果平均地去看任何矛盾之两方面，那就是大错的。两方中必有一方是主要方面，他一方是次要方面，前一方面即所谓矛盾之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本书已举了价值与使用价值，价值为主导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为主导方面；理论与实践，实践为主导方面；苏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为主导方面等四个例子，都证明主导方面对于他方有决定的作用。不是单纯的互相结合，如普列哈诺夫的错误说法；也不是互相决定即交互作用，如卢波尔的说法；而是一方起着主导的与决定的作用。究竟哪一方是主导的呢？这要看过程发展之情况，在一定条件之下来规定，资本主义社会在长时期中，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但到革命前夜时期及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就转变为主导方面了。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主导方面，封建势力是次要方面。然在革命前的俄国与现在的日本，封建势力还是主导方面，资本主义不过占次要地位。在中国社会，主导势力属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他们的作用决定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决定了各种

的变动。然在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大革命猛烈发展中，南方革命势力与北洋军阀对抗中，南方势力由次要地位转变到了主导地位，北洋势力作了相反的转变。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言，资产阶级因握有经济命脉，至今还居于主导地位；然在革命领导上面说来，由于无产阶级之觉悟程度与彻底性，而资产阶级则是动摇的，无产阶级却居于主导地位。这一特点，影响到中国革命之前途。无产阶级要在政治上、物质上都居于主导地位，只有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工农小资产阶级多数觉悟与组织起来的话，那末，革命之决定的主导的作用，就属于无产阶级了。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因为民族统一战线如果广大的与坚固的建立起来，加上国际的因素（苏联、日本民众、其他和平国家），就有造成优于日本方面之势。在农民与无产阶级之矛盾中，无产阶级是主导。在产业工人与手工工人的矛盾中，产业工人是主导。在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矛盾中，熟练工人是主导。在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中，城市是主导。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经济基础是主导。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中，感性是主导。在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的矛盾中，主力红军是主导。在进攻战术与防御战术的矛盾中，进攻是主导。在战略与战术的矛盾中，战略是主导。运动战与阵地战的矛盾中，运动战〔是〕主导。各兵种中，部〈步〉兵是主导。劳心劳力的矛盾中，劳力是主导。凭谁决定？凭过程发展至一定阶段中，斗争双方的力量如何而定。主导与非主导是互相转变的。

## 八　自始至终的过程的矛盾的运动

……

伊里奇接着说："这正是辩证法的一般的叙述方法或研究方法。"[1]（《伊里奇文集》第十二卷）发现过程之最单纯的最根本的关系；在那种关系之中，暴露主要矛盾；探求主要矛盾的发展、斗争及以主要矛盾为基础而出现的全体矛盾、充满了矛盾的方面、发展的倾向——过程之自始至终的发展；探求发展中的过程各阶段的质的变化，充满了矛盾的各方面的运动之相对的特殊性；充满了矛盾的各方面之相互联结及相互推移——这是必须的[2]研究任何过程的路程。[第293～299页]

研究的原则如此

## 九　对立的统一、同一性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

……

永久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随时随地，一种形态转变为他种形态；一切过程，都有始与终。一切过程，转化为其自身的对立物。任何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变为他种过程是绝对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伊里奇说了这斗争的绝对性及统一的相对性，并且作

同中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是相对的，中国同某些和平国家之和平外交也是相对的，苏联同

[1]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3页）

[2]　这是毛泽东对原文的修改。

各国之共居及同盟条约也是相对的，党内的一致亦然，一切过程之一致皆然。

思想斗争所以是经常的方法。

两例甚好。

对立的同一性、合致、统一、常住性，被包含于对〔立〕的斗争中，不过是对立的斗争的一动因。静止被包含于运动之中，为运动之一动因。认识同一性、常住性、静止性是辨别斗争或运动的条件，出极明确的定式。他说："对立的统一（合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除的对立之斗争，是绝对的，发展、运动是绝对的。"（关于辩证法的问题）[1]

在布尔乔亚民主主义革命之中，普罗列达里亚与那包含农村布尔乔亚在内的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农奴的关系。这种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村布尔乔亚之活动的合致以及两者之利害的同一性，带有相对的、一时的、有条件的性质。两者之间的斗争是绝对的，把同一性作为其动因而包含着。在法国大革命时，未发达的普罗列达里亚和布尔乔亚的利害，彼此合致，形成了统一、同一性。但是，这种统一，带有相对的、一时的、有条件的性质；这种性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久就出现于表面，暴露了普罗列达里亚及布尔乔亚间的阶级斗争之绝对性及不联合性。两者的这种

不统一，不合致[2]

同一性，不过是包含于两者之绝对的斗争中的一个动因。

---

[1]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原译《关于辩证法的问题》，又译《论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2页）

[2] 这是毛泽东在行间的批语。

是必要的；然而，他是暂时的、相对的，并且即是斗争、运动之一动因。

一切过程矛盾的运动，同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是任何过程如此。但因矛盾性质每个过程不同，内部构造每〔个〕过程不同，这种绝对性、统一性的表现方法因而各异，这是要明白的。

承认矛盾引起运动是对的，但是不够的，还须明了矛盾在何种状态引起运动。矛盾在统一状态虽然是运

客观的现实之一切过程，也和这相同，只是在各个过程上，对立的斗争之绝对性与统一，各以其独特的方法显现，由过程的质及其内的构造所规定。

马=伊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不同之点，在于理解对立的斗争的绝对性，及其统一的相对性。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个理论家，考茨基也好，普列哈诺夫也好，虽然他们反对伯伦斯泰因对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修正，承认矛盾引起运动，可是他们毕竟没有认知统一物的分裂引起运动，没有认知对立的斗争的绝对性及其统一的相

动，但那是运动之特殊状态，相绝〈对〉状态，普通叫做静止、常住、不动、死、止、停顿、僵局、相持、和平、和气，这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必须承认运动之一般状态，即统一物的分裂，斗争、冲突、动、无常、生、行、活跃、战争、相争，这是绝对的。同一、统一、静、死、和平等相对的矛盾状态，包含于绝对的矛盾状态之中。不明此理，就是形而上学、

对性。考茨基所以只在形式上承认辩证法，而不曾理解辩证法，那是什么意味呢？那是因为：考茨基仅仅[1]主张矛盾引起运动，是革命的形而上学；事实上，他拒绝了辩证法。

[1] 这是毛泽东对原文的修改。

机械论，事实上拒绝了辩证法。

现代社会法西斯特[1]们的政治上的总战术，都以对立的和解为基础。他们弃去马克思所说阶级斗争不能和解的命题，而宣传普罗列达里亚和布尔乔亚之利害的调和，两个阶级的妥协，援助资本家的产业合理化，援助民族布尔乔亚之夺取市场的斗争，诱引普罗列达里亚去参加布尔乔亚的国家。

和解、妥协、调和是可以有的，〔在〕过程发展〔的〕一定状态必是〈是必〉要的。停战、媾和、终止罢一〈工〉、临时的统一战线、某些合作，是阶级斗争中有过的，会有的，但不是总战术。不能和解与妥协，最后还须用革命解决矛盾，则是总战术。

多数派理解对立的斗争之绝对性，及其统一同一性的相对性；少数派却高唱统一之永久化的理论；这两种不同的主张，是两者在阶级斗争上种种不同的战略战术之理论的基础。

列宁党也有过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时期，提出分进合击的口

多数派对于自由主义布尔乔亚的战术，在赞姆斯特瓦选举战时代的“分开前进，共同攻击！”的口号中，表现了出来。在一定阶段上的、与一定形态中的自由主义布尔乔亚的这种共

[1] 法西斯特，法西斯分子，法西斯主义者。

号。中国党同国民党合作，原则上也是分进合击，不过表现的方法不同。分进是阶级与党的政治独立性，合击是统一战线。

同动作，乃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战术之相对的、一时的、有条件的动因。少数派对于这种相对的动因，附与绝对的意义，以之为自己的全部战术的基础；其结果，少数派转入了布尔乔亚的奴仆的任务。一九一七年，以普列哈诺夫为首领的少数

在另一定阶段

派，支持了取得胜利的布尔乔亚，宣传利害的调和，

上与另一定形态中的资产阶级共同动作　陈独

高唱继续帝国主义的战争，对于妨阻资本主义强

秀主义高唱不要违背国民革命对于妨阻国民党强

化的一切，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却倾注全

化的一切　特别对于土地斗争

力加以反对。十月革命以后，他们直接支持白党

现在他们直接支持

了。苏联中资本主义要素的驱逐，使得少数派和日本侵略[1]

妨害革命的布尔乔亚政党缔结同盟；贯通全线的广泛的社会主义的进攻，使得少数派去援助那准备干涉苏联的国际布尔乔亚。

这两句是说的陈独秀主义

在主张对立的统一之时，而不理解斗争的绝对性，必然不可避免的引到对立物的和解。对立物的和解论，是右翼派的立场之特征。右翼派，抛弃马克思=伊里奇所说阶级斗争是不和解的那

[1] 以此种形式排印的是毛泽东写在行间的批语，下同。

命题，而建立所谓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的理论、主张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可被取去而移至外部的斗争场中——世界市场之中。在苏联中，他们建立了所谓豪农向着社会主义和平的成长之理论。他们以阶级斗争之自然的消灭，和平的死灭之理论，去代替伊里奇所说阶级只有依著激烈的社会革命才能消灭的理论。右翼派忘记农民层内部的矛盾，在他们看来，农民是涂上了灰色的集合体。他们不曾注意：我们和农民的同盟，是把普罗列达里亚和布尔乔亚不能相容的利害考虑过了的同盟，因而是和农民之资本主义要素相斗争的同盟。“没有辩证法的理论家，烦琐哲学的理

是把无产阶级和富农不能相容的利害考虑过了的同盟，即在中国民主革命中亦然，何况十月后的苏联。

辩证法的本质是矛盾斗争的问题，烦琐哲学论家布哈林”，不理解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对即形而上学　陈独秀同样不理解。

立的统一是相对的学说。

对立的和解论，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因为这

对

所谓以一定过程之发展为基础，即是过程由一种状态转变到他种状态，即是矛盾的发展，即所谓飞跃、突

种理论，没有发现从一种状态到他种状态的出路。辩证法的本质却在此

对立的和解论，没有注意新事物的发生，没有注意新现象、新过程的前提、可能性、条件及其发生，乃是以一定过程的发展为基础而作出的。这种理论不注意一定过程之矛盾的发展，不考察一定状态怎样转变为其他状态。……

变。以此为基础，乃作出新过程的前提、可能性、条件及其发生。

对立的和解之见地，变成了德波林一派对于马克思的辩证法所加入的少数派的=观念论的修正之基础。……在他们的任何著作中，对于对立的和解论从没有加过批判。反之毋宁说他们简直

对

是从这样理论出发。德波林不在对立的斗争中而在对立的同一性中，去发现辩证法的本质；……德波林的特征，在于不理解伊里奇的思想——伊里奇所说对立的同一性不过是充满了矛盾的对立的统一中之一动因。[第303～308页]

对立的统一性不是本质，对立的斗争〔是〕。

## 一〇　均衡论

以为对立的均衡是绝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相对的，而所谓对立是外的对立，体系与体〔系〕间的对立；

……在布哈林看来，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翻译为现代力学的言词，是必要的。布哈林忠实于自己所提起的问题，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的矛盾引起运动，实际是两个反拨的力之冲突，外部之力互相冲突，暂时形成可动的均衡，这均衡以后被扰乱，再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均衡。……布哈林这样写着：一切事物是某种总体的东西，由互

体系内部由互相联结的一群要素所组成，体系中各要素之间也有矛盾，但是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外的矛盾，起着对于内部矛盾的决定作用。

布哈林学习斯宾塞[1]、谢林格[2]、波格达洛夫。

相联结的一群要素所组成，即成为某种体系。一切这样的“体系”，和那构成其本身的环境的其他体系，互相结合。环境和体系互相矛盾。这种体系和环境的矛盾，在布哈林说来，是一切发展的基础。

布哈林所乱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均衡论，并不是新的东西。这种均衡论，在布尔乔亚的社会学及经济学上，广泛的一般的被应用着。布尔乔亚的哲学者及社会学者的斯宾塞，在这种均衡论之上，构筑了他的机械论的进化论。……在斯宾塞之前，已直接反对黑格尔及马克思之辩证法的谢林格，这样说过——

“在反对的方向中互相抗争的力之对立，也是自然及其发现体的一切作用的根本形式”。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严格的批判了这种见解。把均衡作成了极完全的定式之人，是波格达诺夫。波格达诺夫在布哈林以前，就把辩证法翻译为“力学的言词”了。……波格达诺夫把

[1] 斯宾塞（1820—1903），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宣扬不可知论和庸俗进化论。主要著作有《社会静力学》《第一原理》等。

[2] 谢林格（1775—1854），现译谢林。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

运动从没有任何矛盾的均衡发生。

问题：为什么中国与日本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除此以外不可能吗？恰好可能是另外一面。不是扯高补低，而是克服落后，把低、落后提到先进的水平。不是先进向落后看齐，而是落后赶上前去。履与足矛盾时，削足适

辩证法定义为："由对立的力之斗争而显现的组织过程。"在他看来，运动从没有任何矛盾的均衡发生，其后，这个均衡为两个对立的力之斗争所搅乱，然后再在新的基础之上恢复。波格达诺夫所认为根本的东西，规定的东西，是制约内的矛盾之外物。他以为，主要矛盾是环境和体系间的矛盾。这样，我们看出布哈林之大智的源泉，就是布尔乔亚的社会学，和他受过强烈影响的观念论者、折衷主义者波格达诺夫的哲学。

均衡论在一切有害的团体中受非常的欢迎，它成为他们的理论的见解之方法论的基础。……

即一般思想原理。（经济评论，一九二七年第六号，第二一页）〔第310—320页〕

"在由相互间必要不可缺少的一联环子所组成的全部体系中，具有决定的意义的，是最弱的环。例如，铁对于社会经济中的一切部门都是必要的，如果铁的生产低降至标准以下，那末，只好停止一切部门，专事采掘铁量到够用的程度，除此以外是不可能的。"（波格达诺夫《一般组织学》二七四页）

均衡论的一切党徒，一切机械论者，都宣传补救弱点，孔特拉捷夫仿效布哈林的经济学者的摘

履，正是布哈林的思想。这是可能的吗？不可能的。补救弱点是可能的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谓补苴罅漏[2]的办法，结局将使大局溃败。这不是扩大矛盾去解决矛盾，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堵住矛盾发展，取得内部的安定，以求得所谓平衡，结果是无济于事的，这是破落户救穷的办法。从构成外部平衡来求得内

要[1]，重复着相同的口号，他在财政人民委员会的扩清会中说：

“如果没有砖，房子就不能建筑，在这一点上，我和布哈林同意，是的，应当补救弱点。在我看来，除此以外，再没有方法。”

从均衡论从补救弱点的思想，生出一切右翼机会主义的问题。例如说，在建筑材料的生产比较其他生产部门落后时，不去克服这种落后的状态，却以为应当减低资本的建设。

---

[1] 《经济学者的摘要》，布哈林著，原载苏联《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现译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为迎接新的经济年度而作》（《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0～299页）。

[2] 参见韩愈《进学解》。原文有“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之句。

部平衡，这是布哈林的根本方法。

依靠斗争，依靠社会主义农业与基于分散性而自由〔倾〕向资本主义的农业之间的斗争，来克服农业分散性（这个同社会主义经济不相容，而有利于资本主义根苗的生长）〔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

苏维埃经济的发展中最弱的环，是小商品农业的分散性，均衡论的党徒们，认为这个矛盾的克服，不是由于把农业的发展引上大产业的水准一事——这要靠把农业转移为社会主义的形态才有可能——所能做到；反之，他们以为要由于缩小产业的发展速度才能做到。均衡论的党徒们，以为上述矛盾的解决，其可能性在于保持这两个对立的方面，即社会主义的大产业和小商品农业，在于利用这两个方面之机械的相互关系去补救弱的方面，而在两者之间设置均衡。[第315～316页]

很清楚

过程外的矛盾与过程之内的矛盾，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但不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他须通过过程之内的规律性才影响于

马克思及伊里奇的辩证法并不否定外的矛盾的作用、即某种过程对于其他过程的作用，反之，毋宁说是从现实的一切过程之不可分的联结那种观念出发，而要求认识过程之相互的作用、过程之相互的影响及其相互的渗透。马克思及伊里奇的辩证法，其主要的注意在于暴露内的矛盾，确定对立的同一性，认识过程之自己运动的源泉。外的矛盾，只有通过过程之发展的内的规

过程之发展。他不是主要与决定的东西，主要与决定的矛盾是在过程之内部。

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即社会内部的矛盾，给予决定的影响于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即所谓人定胜天。从有劳动工具之产生以来，就是如此的。此处举例是进步社会之事。

“物必先腐也，然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后谗之”。[1]

律性，才影响于过程的发展，马克思和伊里奇的辩证法，不否认社会和自然的矛盾，但不承认外的矛盾是主要的东西，决定的东西。在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许多国家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地形、动植物、天然富源，在长期间内没有变化，而社会关系却变化了，即封建制度变为资本主义了。

在社会构成的发展中，譬如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辩证法所看作主要的东西、决定的东西的，是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和自然的矛盾，不消说也作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不是直接起作用，而是通过资本主义之主要矛盾的发展才起作用，地理环境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时，社会依其内的规律性，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变化地理环境。

……国际资本企图实行要粉碎苏联之绝望的尝试。这个尝试成功吗？或终于不成功吗？——其程度，完全系于苏联的强度如何。国际资本依其内的矛盾而发展。这些矛盾怎样急剧的激化起

[1] 参见苏轼《范增论》。原文是：“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

“非战之罪，乃天亡我”[1]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策〈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吸引与国民罪〈党〉变，对于革命说当然是原因。外的力量，须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

这是主要的

来，在某种程度上，也依存于苏联。苏联社会主义的成长，使得资本主义体系之内部的矛盾激化起来，因而促进普罗列达里亚的世界革命。理由是：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对于社会主义之终极的胜利，具有绝大意义。

这样，我们看到外的矛盾，只有通过过程之内的规律性的发展，才在过程的发展之上，曲折的发生影响。我们只有具体的分析两个互相作用的过程，才能把其影响的性质、程度及力量，暴露出来。

具体分析两个过程，才能把互相作用的性质、程度、力量发现出来，各过程的情况是互不相同的。[2]

[1] 参见《史记·项羽本纪》。原文有“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话。

[2] 这是毛泽东对上面一段话的批语。

等）才能曲折的即间接的发生影响。流水不腐，非流水腐；户枢不蠹，非户枢蠹[1]。物之本身情况如何，是第一原因。国民党能够破苏区与红军，但必须苏区与红军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点。若能克服弱点，自己巩固，则谁也不能破坏。红军至今没有被破坏，就因为此。中央苏区、鄂予〈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的〔是〕内的原因。西路军亦然。“内省不

[1] 参见《吕氏春秋·尽数》。原文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后来唐朝马总撰的《意林》等都引“不蝼”作“不蠹”。

疚，失何忧何惧”。[1]九一八之不能抵御，原于一九二七〔年〕之失败。今日国难之是否得救，决定于统一战线能不能发展与巩固，不决定于日本。国民党之不能照旧不变的存在，原于其政策与组成之弱点。资本主义之必然灭亡，原于其内在的矛盾。阶级与政党之兴亡，原于其自身之条件。人之健病、生死，原于其自身条件。机械力推动物体运动，通过

[1] 参见《论语·颜渊》。原文是：“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物体自身的可动性。任何事物、任何过程，外力是有影响的，且是严重的影响，然必通过内的情况才起作用。决定的东西属于内力。

均衡论，忽视了暴露过程之具体的内容及“自己运动的源泉”之必要，因此，在一方面，对于哲学问题抽象的唯理论那样去处理，从所
非具体的
谓“一般”的见地去处理，因而到达于空洞的
非特殊的无个性的
图式主义；在他方面，到达于忽视根本的东西及
形式主义　　近视病与琐屑病
具体的东西之经验论。这种二重性，也就是右翼派的特征。他们对苏维埃经济的问题，一方面，抽象的去处理；不分析其发展之具体的条件、局面及阶段；无力暴露那新转化向着新局面出现的条件及可能性是怎样造成的；不注意新的发展阶段从新提出[1]问题，从新解决其矛盾。他方面，
这是唯理论
们从补救弱点的均衡设置论出发，因而到达于拜
这是经验论
金主义。例如，他们的困难打开策——在社会主义的大产业及小商品农业之间从速设置均衡——，当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时，这只有基于个人农业的成长才是可能的。由此，生出了

试举具体处理之例

[1] 毛泽东在此处删掉了一个“了”字。

使提供大部分谷物商品的个人经济（主要的是豪农经济）发展的政策，而回避了那打开困难的根援助富农发展的政策

本的决定的路线——农民经济之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农业形态。

当时的阶段已经存在了这种转变的条件，造出了可能性。

世上无此过程，只是机械论者的幻想——资产阶级的幻想，一面自慰，一面迷惑劳动群众。

均衡论，不承认过程的发展是始终都依存于在发展中的矛盾而进行。从这种理论的见地说来，所谓均衡乃是过程中没有矛盾的瞬间之东西，因而过程的运动，在矛盾发现的瞬间以前，只有由于外的原因才有可能。

一针见血之言

德波林也不承认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德波林一派对于均衡论加以时代落后的批判，不能给与这种理论以决定的打击。德波林派的那种批判是极一般的，极抽象的，他们不能抓住均衡论的最主要点——均衡论不承认过程是自始至终依着矛盾，依着统一物之分裂而发展，即均衡论使对立和解之点——，去加以批判。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对于对立之统一的法则的理解，是与均衡论合体的。他们也和均衡论同样，认为矛盾不是从过程发生的瞬间就在过程中固有的，而是在过程发展为某阶段上才出现的——这样，他们作出了他们自己所恐怖的结论，即所谓过程在

矛盾发生的瞬间以前，由于外的原因而发展的结论。而且，和均衡论的党徒们同样，他们也支持着社会民主主义的对立和解的理论。极端和极端，是相通的。

左的与右的相通，因为都离开过程之正确的了解，到达于不顾过程内容，不分析具体的阶段、条件、可能性等抽象的一般的空洞见解。因此，他们两极端就会于一点。

## 一一　否定之否定的法则

所谓现实与认识发展之辩证法过程，就是质量互变、矛盾统一与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从上面所述看来，当作通过质与量的发展而进行的、基于对立的运动之飞跃的转变的过程看的辩证法的过程，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现实以及我们认识的发展之辩证法的过程，不止是量到质及质到量的转变的法则和对立之统一的法则。与以上两个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相并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建立了辩证法的第三个根本法则——否定之否定的法则——的基础。

……

多数劳动者私有——少数资本家私有——社会公有的私有

“私有，和社会的集团的所有不同，只存立于劳动手段及外的劳动条件属于各个人的场合。劳动者私有生产手段，是小生产的基础；小生产成为社会的生产及劳动者自由的个性之发展的必

否定之否定的范例

要条件……

……

恩格斯之言三段法是对的

……恩格斯说：否定之否定，“实际上是极单纯的随时随地进行着的程序。这个程序，只要把旧观念论哲学掩蔽着它的秘密的破衣取去，就是三岁的儿童也能理解”[1]。……形而上学者们把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当作图式的“三段法”描写出来，而说马克思主义者们无理的把具体的现实之发展嵌入三段法之中。但是，这里不能不声明一句，黑格尔自身，特别在所著《法律哲学》[2]之中给与了一个根据：即不把“三段法”的性质解释为否定之否定的法则的一个方面，而是可以把它解释为发展法则本身。例如，黑格尔把犯罪当作法律的否定去观察，把刑罚当作犯罪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去观察。在这里，实际上，三段法成为把现实的现象嵌入于其中的外的图式。……

这样说是不对的。甚么也乱嵌进去，这是外的连〈联〉结，表面现象，图式主义，不是内的联结与本质发展的东西。否定之否定律是论内的联结的理论。

赫格尔也犯了图式主义。

横的联结与纵的连〈联〉结。横的联结是

马克思及恩格斯在说明否定之否定的法则时所力说了的，不是这个法则之“三段法的性质”，而只是互相发展并且互相推移的现象之内

[1]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5页）

[2] 现译名《法哲学原理》。

矛盾的两方面在发展中相互依赖与相互斗争的关系。纵的联结是过程经过飞跃向前发展的关系。两者都是内的联结。

在的联结。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倾向之分析，上面已经引用过了；在那引用文中，否定之否定的法则的这种本质，被力说着。

第二个否定的结果，再归于最初的东西，然而性质与数量变了。谷物等〔种〕类因变化缓慢，不容〔易〕看见质变，但看〔见〕质变的事物或过程是极多的。举例。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引用麦粒为例。落在地中的麦粒，置于适当的条件之下，发出芽来。“麦粒被消灭，被否定，而从麦粒生出来的植物，出现为麦粒的否定。究竟，这种植物之正常的生涯是怎样的呢？它成长，开花，结实，最后再生出麦粒。而且麦粒成熟时，麦茎枯死，轮流的被否定。当作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我们再获得最初的麦粒，然而这不是一个麦粒，而是十倍，二十倍或三十倍的麦粒”。

恩格斯并且事先指出，这里的问题不单只是发展之量的方面。“谷物的种类仅是极缓慢的变化。所以，今日的大麦和一百年前的大麦，几乎完全一样。但是，试考察粘质的观赏植物；例如牡丹或兰花罢。如果我们把种子及由种子生出的植物加以人工，这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我们不但得到更多量的种子，又得到生出更美丽的花的、质的方面被改良了的种子；并且，这种过程的每

不是单纯的纯量的循环，每次都有质的变化。

次的反复，每次的新的否定之否定，这个改良是被促进了”[1]。[第324～327页]

问题是明显的，否定之否定律是论由同一规律性所发生的现象之内的联结。其行程只有两个否定，多数否定说法，如蚕蛹蛾、茎花果、少壮老，等等，是不对的。因为都是同一规律性所发生的现象，虽通过种种变异阶段，依然只是完成一个种属的持续过〔程〕，依

民粹派的密海洛夫斯基[2]，以自己的方式去解释恩格斯的麦粒之例。他说：茎否定粒，花否定茎，果实否定花。这样，三段法在哪里呢？在这里，不只两个否定，而有三个否定。恩格斯恰好像预知这样的“反驳”一样，他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和麦粒的场合同样，这种过程在许多昆虫的场合，譬如蝶的场合，也显现着。蝶由于卵的否定，由卵生出，通过到性的成熟为止的种种变异阶段，交尾，于是再被否定。即，雌蝶完成种属的持续过程而在生下多数的卵时就死灭。

在其他植物及动物的场合中，这种经过不是那样简单的被解决。在其死灭之前，不只一次而是多次的产生种子、卵或幼儿，这种事实在这里与我们没有关系。在这里，只是证明否定之否定的法则现实的显现于有机界的两个领域中，就够了”[3]。

---

[1]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5～176页）

[2] 密海洛夫斯基（1842～1904），现译米海洛夫斯基。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在哲学上倾向实证主义、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的观点。主要著作有《什么是进步?》《社会科学中的类比方法》等。

[3]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6页）

然处在同一的规律性中。密海洛夫斯基的错误：不看发展的全生涯，只看量之变异。而重要恰好不在量，而在发展之质的生涯。必须当作新生命的出发点，即新规律性之出发点之一定过程的否定，才是否定之否定律的真义或本质，否则只是空虚概念的游戏。普列哈诺夫在这里是正确的。过程中的阶段有表现为否定之否定的，社会现象中此例甚多。但不是一切

这样，重要的事情不是否定之量，而是发展的全生涯，把其自身的否定当作向新的规律性之转变——否定之否定——，在其自身之中包含着。过程之发展中的现象及阶段，并不是一切都表现为否定之否定。

“花是植物的一机关。并且，当作这样东西看的花之不否定植物，恰如密海洛夫斯基的头之不否定密海洛夫斯基本人一样。但是，果实，正确的说来，受胎了的卵，实际上当作新生命的发展之出发点看，是一定的有机体之否定。恩格斯从那由受胎了的卵生出的植物之发展的开始，到植物把受胎了的卵再现为止，观察植物的生涯”。[1]（普列哈诺夫《史的一元论》）这样，普列哈诺夫把那企图反驳否定之否定的密海洛夫斯基的尝试，加以还击了。密海洛夫斯基不但把三段法偷换为多数的否定，并且把否定变为现象之外的交替。因此，密海洛夫斯基终于不理解辩证法的否定之本质和否定之否定的本质。这否定之否定，正存于通过过程之矛盾的发展而发生新的规律性的问题中。[第327～329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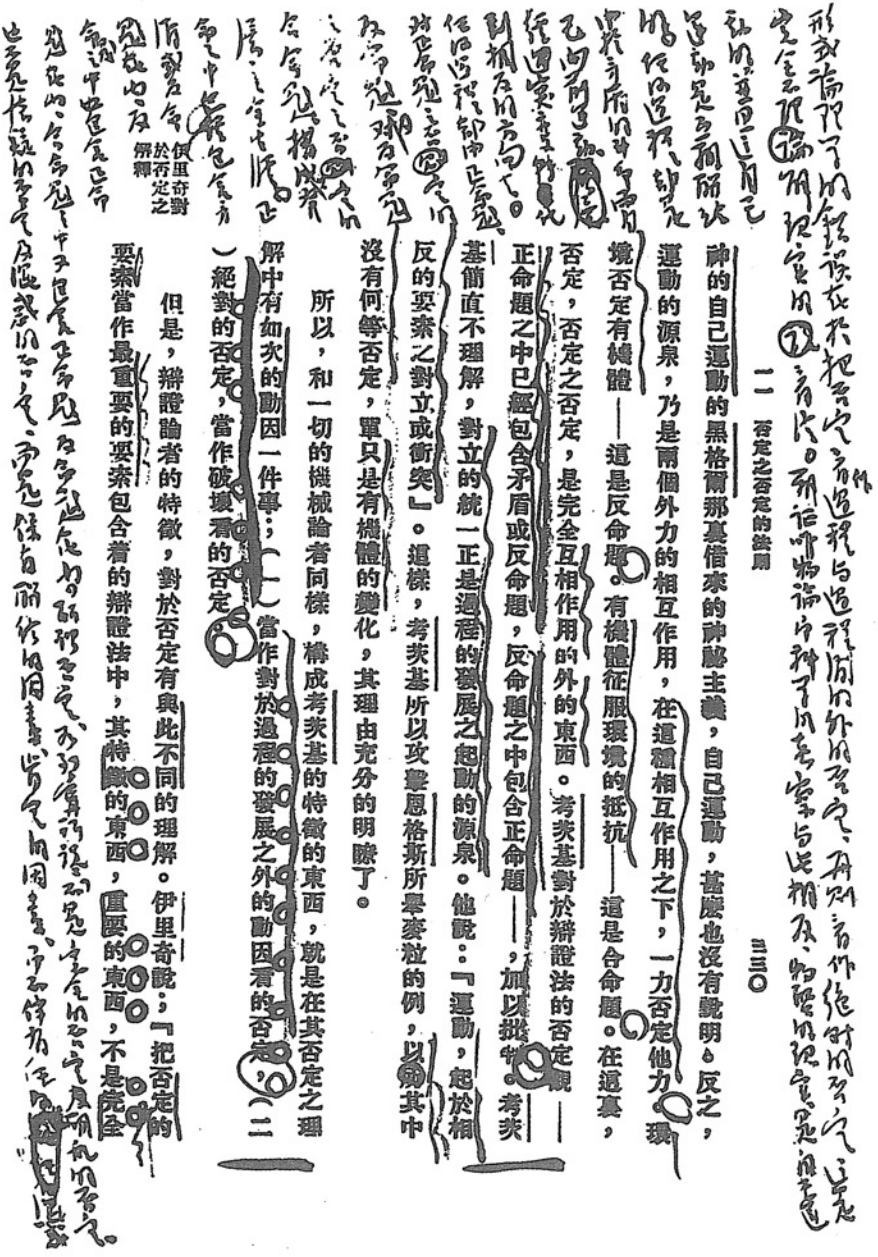
[1] 参见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原译《史的一元论》）。（《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646页）

都表现为否定之否定，例如动植物之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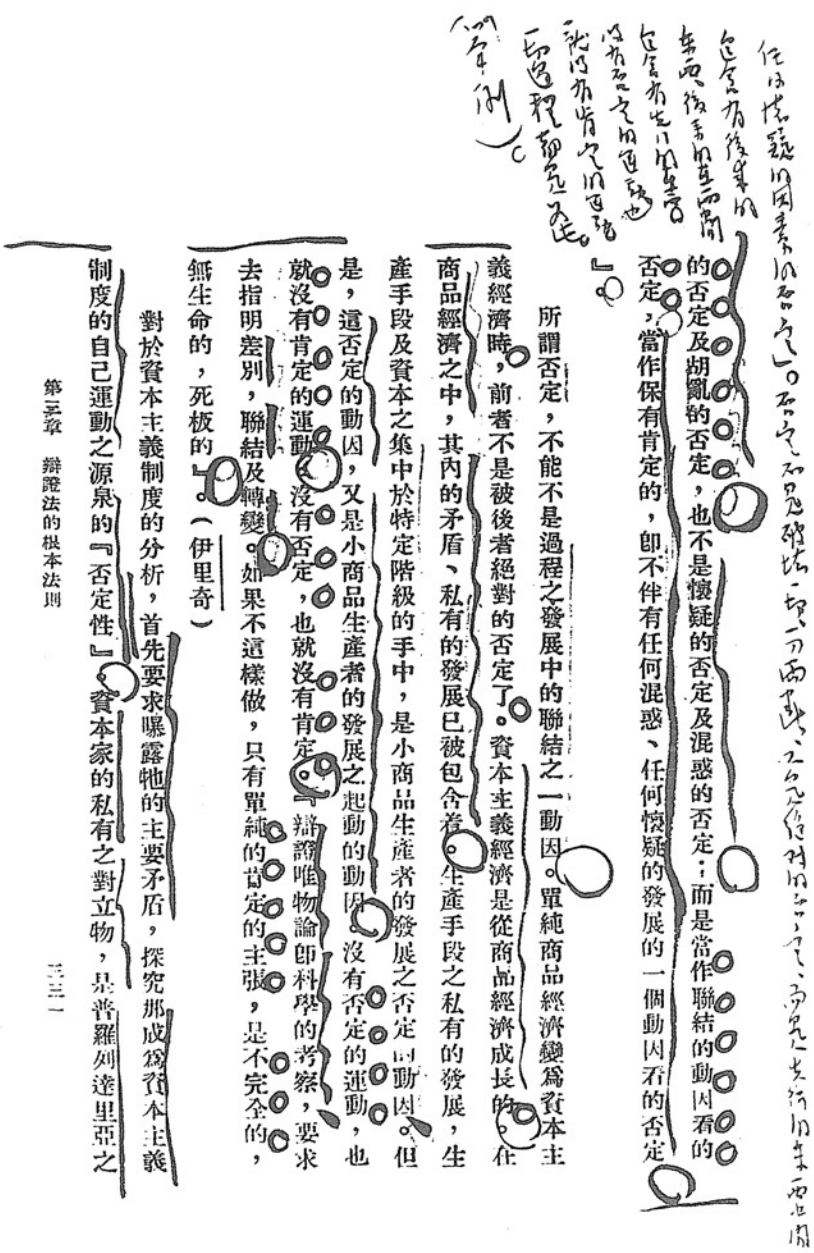
形式论理学[1]的错误在于把否定看作过程与过程间的外的否定，再则看作绝对的否定，这是完全不理解现实的看法。辩证唯物论即科学的考察与此相反，物质的现实是自己运动的，并且这自己运动是互相联结的。任何过程都是由于矛盾的斗争而自己向前运动，经过突变转化到相反的方向去。任何过程都由正命

在形式论理学，所谓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形式论理学把否定看作完全的取消。例如，动物界中某种动物为他种动物所灭亡，这是否定。形而上学的论理学，没有看见过程之内部的矛盾的发展，过程之自己的否定；认为否定性不是发展着的矛盾之内部的起动的动因，而是外的动力。机械论者恰好把这样对于否定之外的理解，作成其方法论的基础。所以，考茨基在所著《唯物史观》之中，攻击基于物质的自己运动之辩证法的否定。他说，在物质之中，没有任何的自己运动。这完全是从那说精神的自己运动的黑格尔那里借来的神秘主义，自己运动，什么也没有说明。反之，运动的源泉，乃是两个外力的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之下，一力否定他力。环境否定有机体——这是反命题。有机体征服环境的抵抗——这是合命题。在这里，否定，否定之否定，是完全相互作用的外的东西。考茨基对于辩证法的否定观——正命题之中已经包含矛盾或反命题，反命题之中包含正命题——，加以批判。考茨基简直不理解，对立的统一正是过程的发展

[1] 形式论理学，旧的译法，即形式逻辑学。



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的手稿。



的否定及胡亂的否定，也不是懷疑的否定及混惑的否定；而是當作聯結的動因看的否定，當作保有肯定的，卽不伴有任何混惑、任何懷疑的發展的一個動因看的否定。』

所謂否定，不能不是過程之發展中的聯結之一動因。單純商品經濟變爲資本主義經濟時，前者不是被後者絕對的否定了。資本主義經濟是從商品經濟成長的。在商品經濟之中，其內的矛盾、私有的發展已被包含着。生產手段之私有的發展，生產手段及資本之集中於特定階級的手中，是小商品生產者的發展之否定的動因。但是，這否定的動因，又是小商品生產者的發展之起動的動因。沒有否定的運動，也就沒有肯定的運動。沒有否定，也就沒有肯定。（辯證唯物論卽科學的考察，要求去指明差別，聯結及轉變。如果不這樣做，只有單純的肯定的主張，是不完全的，無生命的，死板的。）（伊里奇）

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首先要求曝露牠的主要矛盾，探究那成爲資本主義制度的自己運動之源泉的『否定性』——資本家的私有之對立物，是普羅列達里亞之



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的手稿。

题，对正命题之否定的反命题，及对反命题之否定之否定的合命题，构成其发展之全生涯，正命〔题〕之中已经包含矛盾或反命题在内，反命题之中也包含正命题在内，合命题之中又包含正命题反命题在内。所谓否定，如列宁所说："不是完全的否定及胡乱的否定，也不是怀疑的否定及混惑的否定，而是保存联结的因素，肯定的因之起动的源泉。他说："运动，起于相反的要素之对立或冲突。"[1]这样，考茨基所以攻击恩格斯所举麦粒的例，其中没有何等否定，单只是有机体的变化，其理由充分的明了了。

所以，和一切的机械论者同样，构成考茨基的特征的东西。就是在其否定之理解中有如此的动因一件事：（一）当作对于过程的发展之外的动因看的否定，（二）绝对的否定，当作破坏看的否定。

但是，辩证论者的特证，对于否定有与此不同的理解。伊里奇说："把否定的要素当作最重要的要素包含着的辩证法中，其特征的东西，重要的东西，不是完全的否定及胡乱的否定，也不是怀疑的否定及混惑的否定；而是当作联结的动因看的否定，当作保有肯定的，即不伴有任何混惑、任何怀疑的发展的一个动因看的否定。"[2]

---

[1] 参见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分册，第141页）

[2]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4页）

素，即不伴有任何混惑、任何怀疑的因素的否定。”否定不是破坏一切，一刀两断，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先行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后来的东西，后来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先行的东西。没有否定的运动，也就没有肯定的运动，一切过程都是如此。(举例)。

得之否定为失，得之出现以失为前提，得之中包含失。资本家之得包含劳动者之失，二者互相结合而运动。

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首先要求暴露它的主要矛盾，探究那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己运动之源泉的“否定性”。资本家的私有之对立物，是普罗列达里亚之不保持任何生产手段的私有之事实。但是，这“否定性”和肯定物密切的结合着。这两个对立方面[1]，彼此相互作为对方的前提。资本家的私有，包含其本身的“否定

[1] 这是毛泽东对原文的修改。

反面，失之否定为得，失之出现以得为前提，失之中包含得。劳动者之失包含资本家之得，二者互相结合而运动。

性”、对劳动者之私有的否定；又，反之，劳动者之不保持任何生产手段的私有，以生产手段之集中于资本家的手中为前提。

至理名言

伊里奇说：“辩证法的动因，要求指摘否定的东西及肯定的东西之‘统一’，即两者的联结，发见否定的东西中之肯定的东西。由肯定到否定，由否定到包含肯定的‘统一’——没有它，辩证法就变成完全的否定、游戏或怀疑论。”[1]所谓否定，不能不是为表现过程之发展中的联结之特定的否定。

至理名言

“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单纯的说‘否’，或宣布事物不复存在，或随便的把事物取消……在这里，否定的方法，第一，由一定过程的一般性来决定，第二，由那过程的特殊性来决定。所以，我不能不使第二个否定是可能的[2]或成为可能的那样去建立第一个否定。但这事怎能做到呢？这是依从于各个场合之特殊的性质。如果，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5页）

[2] 这是毛泽东对原文的修改。

完全否定，乾坤或几乎息。[1]

我把麦粒磨碎了，或把昆虫踏死，我诚然完成了否定之第一个行为，但第二个行为却成为不可能。因此，对象的各范畴之中，具有着发展由否定造成的、特殊的、其自身所固有的否定的方式”。[2]

否定是过程更向上的发展。

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的麦粒之例中，植物不是麦粒之完全的否定，而是麦粒之更向上的发展。麦粒之单纯的死灭，昆虫之被鸟所破坏，不表现这样的联结，不是辩证法的否定。反之，麦粒的死灭，在植物出生的场合，同时又在一定发展阶段上，被保存于再生产其他麦粒的植物之中。否定同时是肯定，“死灭”同时是保存。辩证法的否定是过程的发展中之一动因，一方面表现为“扬弃”，即表现为旧事物的克服，他方面，把旧事物当作附属的动因而保存着。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之私有制中，小私有当作独立的规律性被克服着，当作资本主义规律性之附属的、“被扬弃了的”形态，被保存着。

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证法的否定。

第一个否定造成了第二个否定之可能。

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

辩证法否定是过程发展之动因，这种否定有

---

[1]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182页）

[2] 参见《周易·易传，系辞卜》。原文是：“乾坤其易之缀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扬弃，即克服旧物事〈事物〉之主要的不适于保存的东西；一方面表现为肯定，即把旧事物中某些还暂时适于生存的东西给以合法的地位而保存起来。正规红军阶段，否定者是游击主义，保存者是作战的游击性、组织的轻快等。

过程之矛盾解决的结果，即一个一定的规律性腹内包含的另一个一定规律性二者间矛盾的解决。即旧规律性倒，新规律

否定不能不把现阶段和过程之发展中的从前阶段的联结表现出来，恰好与此同样，否定之否定不能不是过程的矛盾之解决的结果，即一定的规律性向他一规律性的转变。

性生。

有关系的、亲属性的、因果性的、先行后行、新阶段旧阶段的联结，即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不是不相干的两规律性人工的机械的衔接，不是三段法儿戏，而是向特定方向中的发展。这就是否定之否定的本质。

在否定之否定中，也不能不力说新阶段和从前阶段的联结、即发展的过程。恩格斯，对于那把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归着于现象之外的交替的见解，曾经加以批判。那种见解，是把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归着于那构成辩证法的过程之“外部的表面的一方面”（伊里奇）的“三段法”，归着于“三段法”的儿戏——“交错的写上A字又涂灭A字，或关于蔷薇，交错的主张是蔷薇又主张不是蔷薇的儿戏”。

否定之否定表示过程发展的一个循环之终结，另一个循环开始。

在植物的发展中，果实即种子的出生，是植物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但是，种子是植物的发展所生出的，构成植物的一动因，并且是意味着植物发展的终结的动因。植物死灭，种子存留。发展的一个循环就终结。[第329～334页]

## 第五章　可能性及现实性、偶然性及必然性

### 三　可能性和现实性

……

条件

新东西之生成的源泉，是根据的运动。可是，这并没有说，种种的条件在这种过程上不发生任何的作用。如前面所述，在发展的全部过程上，条件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不论在新东西的生成之际，或在实在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之际，条件都具有意义，这是不待言的。……〔第450页〕

## 第六章　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

### 三　普列哈诺夫的形式论理学之批判

……

?

在人的头发脱落的那种场合，不能说他是秃着，也不能说他是不秃着。在青年的面颊上生须的那种场合，不能说他是白面的青年，也不能说他是有须的男子。在这种场合，“对立物”实际上是一致的。〔第499页〕

## 四　形式论理学与实践

……

理论上——辩证法，实践上——形式论理学，亚斯姆斯[1]这样说。

如果从这种见地说来，伊里奇就变为反对辩证法的“全面性”而拥护形式论理学的规律性及论理性的人了！因为伊里奇，在其革命活动的全生涯中，对于党的各个的环的动摇与踌躇、观照的客观主义、少数派的小布尔乔亚的折衷主义“在这方面在那方面”等等，都斗争了的。〔第505页〕

？

1936，11

1937，4，4[2]

---

[1] 亚斯姆斯，苏联哲学家。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主要著作有《辩证唯物主义和逻辑》（1924）等。

[2] 这是毛泽东批写在书末空页背面的字。

#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6年12月1日）

张学良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战，但又谓无法长停，似蒋介石尚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似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十二月确定在现地区[2]以随时准备打胡姿势，加紧休息整理。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的可能。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2] 指定边、盐池、环县地区。



1936年，毛泽东、朱德在陕北保安。




《战友》（中国画）

# 给蒋介石的信

（1936年12月1日）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1]。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

---

[1] 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陕西富县直罗镇全歼东北军第一〇九师和第一〇六师1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这次战役称直罗镇战役。

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1]。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2]与上海一二八之役[3]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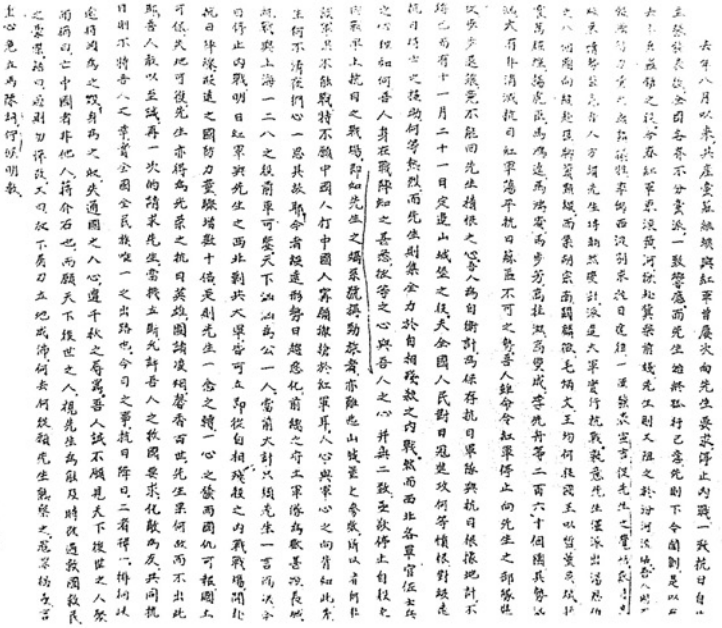
[1] 山城堡之役，指1936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在第二方面军配合下，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击败国民党军进攻的战役。这次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部1个多旅，使国民党军从此基本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2] 长城抗战，指1933年3月驻守在喜峰口、古北口一带长城线上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等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役。

[3] 一二八之役，又称淞沪抗战，指1932年1月28日起，驻守上海的蔡廷锴、蒋光鼐部等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

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蔷　彭德怀　贺　龙　任弼时
林　彪　刘伯承　叶剑英　张云逸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董振堂
罗炳辉　邵式平　郭洪涛
率中国人民红军二十八万人　同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毛泽东朱德等致蒋介石書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朱德等致函蒋介石，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 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

（1936年12月1日）

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党派各界各武装队伍及全国人民均鉴：

日伪匪军进攻晋绥的前哨战已经开始，大规模的侵掠战争即将爆发。当此中华民族生死关头，非动员全国兵力人力财力以抗战，则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准备全国性的抗战。

（二）停止进攻红军，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三）开放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立即释放政治犯及上海各爱国领袖。

（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商讨救国大计。

我们再一次的要求南京政府，立即放弃对日妥协政策，停止中日谈判，实行上述迫切要求。若再因循延误，坐视傅作义将军等局部抗战而不救，而仍旧专心致力于压迫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与进攻抗口红军，则其结果不但将给民族国家以不能补救的损失，而南京当局亦将自绝于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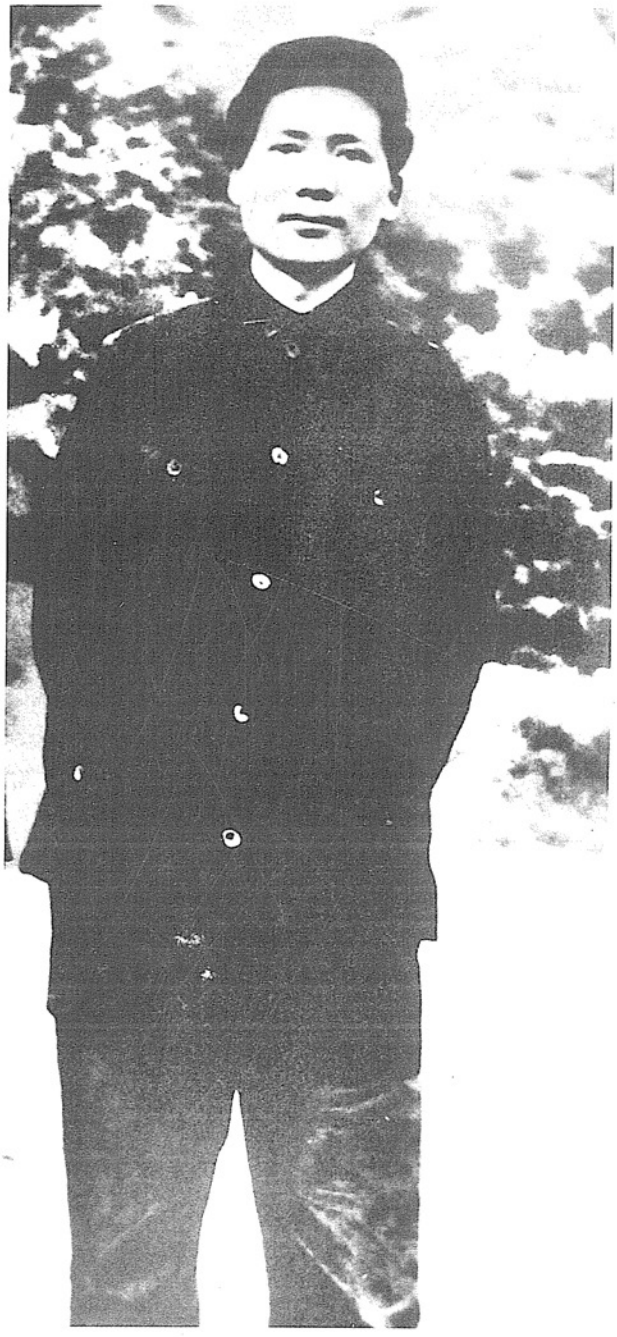
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抗战，我们更号召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不

分阶级、不分职业、更亲密的联合起来，督促南京政府实现我们的主张，克服一切困难，自动的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援助现在绥远坚决斗争着的英勇将士。抗日救亡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天职，也只有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才能逼使南京政府决心抗战，给日寇以致命的打击。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红军，一年来艰苦奋斗，东进山西，西出宁夏，无非要寻找一条抗日去路，以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然而南京当局总不见谅，一再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当此晋绥危急，全国人民均愿效命疆场，为民族争生存之时，南京当局偏又调动大军向抗日红军进攻，此真令人百思不解。此次红军在山城堡消灭胡宗南军一部，实出于不得已的自卫行动，并向对外妥协，对内黩武之主持者略施警告。我们认为今日而犹继续内战，实属对民族国家之罪恶行为，实际上不啻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之使命，而遗民族国家以无穷之祸。

我们现在向全中国人民宣言：全中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的抗日战线，并愿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率机关之指挥，以抗击日伪匪军的进攻，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我们希望南京政府立即承认我们的要求，希望全国人民拥护与赞助我们的要求。我们对于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是有充分信心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1936年12月，中央军委主席团组成，毛泽东为军委主席。图为1936年的毛泽东。

#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2月1日）

朱、张、周已到保安[2]，情形甚好。

你对团结与改进一、二、四方面军的方针及对许多问题的意见，我都同意，很对的。但在某些步骤上，我的意见还宜改得温和一点。两星期前批评国焘一电，昨日整顿纪律一电，原则上完全正确，但在措词上有一二句颇为刺目，在今天是不相宜的，请留意及之。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朱德、张国焘、周恩来于11月30日到保安。

# 致刘少奇电[1]

（1936年12月2日）

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其条件为：（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 给冯玉祥[1]的信

（1936年12月5日）

焕章先生：

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

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

然而蒋介石先生至今犹孤行己意，对日无抗战决心，对内则动员三百个团大举“剿共”。最近敝军略施还击，胡宗南军一旅溃败，一旅覆灭，其军心动摇已极，然夫己氏[2]犹不悟也。

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否则，长城淞沪诸役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悔，锡以圭针，敢不拜赐！敝方抗日救国纲领，具见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国国民党书[3]，前

---

[1]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安徽巢县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1936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2] 夫己氏，词意为那个人。

[3] 即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起草的《致中国国民党书》。

曾遣人付上，谅承鉴察，有何评判，愿接高明。

先生老部下董振堂[1]诸君，大有进步，堪以告慰。书不尽意。

肃颂

勋祺！

毛泽东　手启

十二月五号

[1] 董振堂（1895—1937），河北新河人，曾是冯玉祥部的师长。1931年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围剿”红军，董任该部第七十三旅旅长。同年12月14日董振堂同赵博生、季振同等率部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起义部队编为红军第五军团。1936年董任红军第五军军长。

# 关于联合抗日救国等问题给杨虎城的信

（1936年12月5日）

虎臣主任总指挥阁下：

侧闻先生发表告民众书，重申十五年前革命大义，快何如之，数月来乞尊处对于敝方多所协助感级〈激〉莫名，从此双方日臻密切，统一战线之基础益固，远大之图基于此矣。蒋介石氏孤行己意，萌城山城堡两役略施教训，半月来欲前又却，垂丧之态可搁〈览〉，银样腊枪头可恨复亦可笑。

张文彬君他适，兹派李涛君来见，幸赐接洽。有数事奉商于阁下者：其一，联合救国之大计，以长安为中心之五六省区宜有一种具体合作计划。此事多仗大力出而斡旋苟利抗日救国，弟方无不乐从。蒋氏徘徊歧路，对外则力求妥协，对内仍继续内战，非举各方团结抗战之力不足迫令其走上抗日救国之途。此救亡大计之宜商酌者一也。复次，敝方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团结巩固士气甚盛。目前方针坚决保卫苏区，有进犯者决消灭之。然部队甚大，给养困难，弹药亦待补充。叨在抗日友军之列，拟向兄处暂借三十万元。除以十万元请兄处代购弹药外，二十万元作为给养被服费。如承兄慨允，请分批拨付，部队骤增，无米难继，不得不向兄阁下作庚癸之呼，阁下交友出于至诚，谅不固拒其请。还期约明年三月，决不

失信。另备轻机关枪一百挺，如兄处需此，敬以奉赠。此款弹急需，仅以奉商者二也。复次，尔后敝军行动方向目前虽尚难确定，然不论东西南北，均与贵军唇齿相关患难与共。在未与南京订立合作以前，无论对日对蒋，均须恳求兄处协助。此项方针一俟确定即以奉告。兄高明，有何见教，密为示及，无任感幸。此双方行动之务求协助者三也。复次，空间通信再不可缓。承允即立实行幸甚，某君另有任务，兹重选一人，携带密码呼号，随李君来尊处。从十二月十五日起，重要机密均经电报交谈，此外甘肤道上抢劫案时出，竟有伤人劫车之事。有由苏区地方游击队因约束不严发生者，敝方深为抱歉。查明属实愿出抚恤赔偿费，一面已下令严禁，期于弊绝风清。有由东山土匪散兵所为者，亦请贵方派队剿办，务期维护交通毫无阻碍。此通信交通之亟宜创设或整理者四也。

上述四事或关抗日大计，或属军需紧急，或系两军行动，或为通信联络，敬以鄙意披沥奉商，务祈审察示覆。朔风加厉，为国珍摄。肃颂

公祺不赘

弟　毛泽东手启

十二月五号

# 给孙科的信[1]

（1936年12月5日）

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然国民党中如不战胜其降日派与妥协派则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展望于国民党中之抗日派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向着降日妥协之辈进行坚决之斗争。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先生。

[1] 这是毛泽东致孙科信的主要内容。孙科（1891—1973），字哲生，广东中山人，孙中山之子。

# 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

（1936年12月6日）

（甲）远方[2]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乙）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3]，第二步夺取肃州并调查肃州至安西道上是否便于行军，计算占领甘、肃两州包括休息补充时间在内共需多少天，并计划西路军全部包括红五军在内，在甘州地区集中训练一二星期，休息体力恢复力气。（丙）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军的任务下暂不西进。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电的主要内容。

[2] 远方，指苏联和共产国际。

[3] 甘州，今张掖。

# 致徐向前、陈昌浩等电[1]

（1936年12月10日）

为纪念宁都暴动五周年，特对五军团全体英勇的指战员，致以无限的敬意，更望在董军团长领导下继续宁暴伟大的精神，坚决配合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主力，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为创河西抗日根据地而奋斗。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等以中革军委主席团的名义致徐向前、陈昌浩、董振堂、黄超及红五军团全体指战员电的主要内容。董振堂、黄超，当时分别任红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

# 关于国共谈判情况及我们的原则立场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0日）

李宜兄：

（甲）雨苍[1]已动身，删日可抵兄处。

（乙）陈立夫第三次找汉年谈，红军留三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

（丙）我们决心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丁）因上海电台尚未建立，暂时不得不由兄转，今有一要电致汉年，祈赐转为荷。

弟　东　来

蒸申

---

[1] 指叶剑英。

# 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条件等事致潘汉年电

（1936年12月10日）

汉年同志：

齐电悉。

甲、合作为实行抗日救亡，但至今天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诸君如不能促成蒋氏此种决心，则谈判显无速成之望。

乙、根本不能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

丙、红军在彼方忠实的与明确的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的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协定，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丁、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止进攻并将军队撤退于苏区以外，静〔候〕谈判之结果。

杨子任

蒸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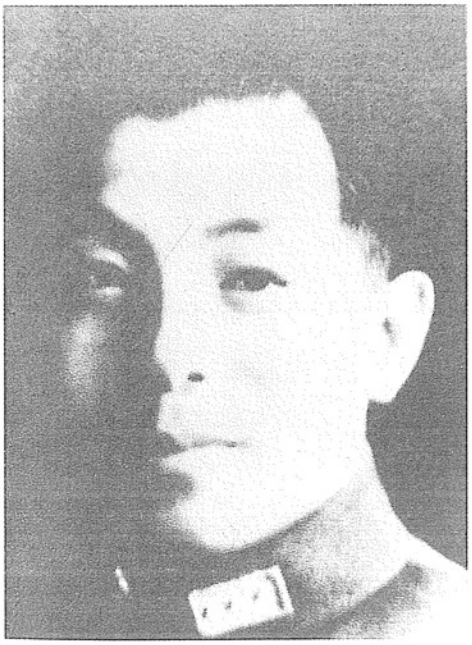
# 致张学良电[1]

（1936年12月12日）

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

---

[1]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当日，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复张学良电的主要内容。





西安事变的发起者张学良、杨虎城。



全國民衆迫切要求

爭取中華民族生存

張楊昨發動對蔣兵諫

通電全國發表救國主張八項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

卅萬民衆歡騰鼓舞擁護民族解放運動

救亡領袖

張楊等通電全國

▲發表救國主張

救亡領袖

西安各救

昨召

澈底肅清漢奸

拿辦法西斯蒂

《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2月13日刊登的西安事变的消息。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6年12月13日）

## 一

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部下，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也可能向南移动。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即部署。我们在政治上的步骤，应使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物在行动上和组织上与我们一致，要派重要的同志去做工作。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围绕这一环，我们要向人民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稳定黄埔系、CC派，推动元老派、欧美派以及其他杂派赞助西安事变。对英美应很好联络，使它们对西安事变在舆论上表示赞助。我们的政治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的。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西安事变的一段讲话；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结论的一部分。

极去做。

## 二

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

# 关于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等问题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3日）

李毅兄鉴：

文寅电悉。

元凶被逮，薄海同快。目前任务，在全国者已见致汉年电，昨已奉达，并祈转沪；在西北者略陈如次，敬祈酌夺。

（甲）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严拒樊崧甫。

（乙）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弟等认为，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的发展其胜利。

（丙）宜即逮捕或驱逐部队中法西斯分子，对全军奉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

（丁）胡、曾、关[1]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如何部署，请随时电知。此外，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详容后告。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并求杨虎城兄电知延安驻军密为保护，如何盼复。请令

[1] 指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

电台时刻联络。

弟　东　来叩

元午

# 提议东北军确占兰州汉中两战略要点[1]

（1936年12月13日）

李毅兄：

关于军事方针提出下列各点，请考虑见复：

甲、刘峙[2]有指挥河南集团，进占潼关极大可能，似宜提起杨虎臣[3]兄注意，以主力集中潼关而坚拒之。

乙、为确占兰州汉中两战略要点及隔离甘肃蒋军为二部起见，提议：

（一）于军[4]全部巩固兰州城，严防毛炳文[5]及西北补充旅之进攻。

---

[1] 1936年12月12日，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内战，拒绝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一致要求，国民党爱国将领、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领导人杨虎城，在西安附近的临潼联合发动了扣押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调动大批军队，逼近西安，企图扩大内战。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内战，就有关军事方针向张学良提出的建议。

[2]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豫皖绥靖公署主任。

[3] 杨虎臣，即杨虎城。

[4] 于军，指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

[5] 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

（二）兄部王董两军[1]及骑兵军集中平凉、会宁线，将该线上之蒋军压向陇南一面，拒止胡曾关毛[2]南下，将海原、固原防务交于红军。

（三）红军以主力进至海、固地区，以有力一部尾随胡军于豫旺[3]地区，配合在静宁、平凉之兄军，乘机消灭南攻之胡等。如胡等在现位置不动，则压迫之入宁夏为最好。

（四）商刘甫澄[4]，调川军十五团至二十团进据汉中。

以上意见是否有当，统祈见复。军事大计，祈兄主持，随时示知为盼。

弟　东　来叩

元申

---

[1] 王董两军，指国民党军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和第五十七军，军长分别为王以哲和董英斌。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曾，指曾万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关，指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毛，指毛炳文。

[3] 豫旺，旧县名，即今宁夏同心县。

[4] 刘甫澄，即刘湘，当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四川“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 关于周恩来等拟十六日到延安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3日）

宜兄：

甲、电悉。稼蕾、剑英早去霍师，候车接或电霍师转送。

乙、恩来及同行人员计共二十人，拟于十六号午赶到肤施城外，请派飞机届时往接，并商虎城兄电告驻肤程团，烦其负责保护，如何，盼复。

弟　东　来

元亥

# 关于日本、南京情况及我们的建议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4日）

李宜兄：

甲、情况：

（一）日本三相会议，认文变为革命的，准备支持南京。

（二）南京甚慌乱，恐事变扩大，急下免职令，军队交军委直辖。

（三）何应钦到郑州，判断专为指挥进攻。

（四）樊[1]军向潼关，万[2]师守咸阳。

乙、建议：

（一）闻冯钦哉师集中西安，冯不可靠，希注意，宜以孙师集中西安、潼关间。

（二）胡、毛、曾、关[3]甚恐慌，日内尚无可为，主要注意樊、万。

（三）东北军愈集结愈好，但兰州万不可失。

（四）红军准备全力增援。

弟　东　来

寒子

---

[1] 指樊崧甫。

[2] 指万耀煌。

[3] 指胡宗南、毛炳文、曾万钟、关麟征。

# 关于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及我方行动方针致张学良、杨虎城电

（1936年12月14日）

汉卿、虎臣两将军勋鉴：

（甲）文日举义，元凶就逮，抗日救亡，举国同情，弟等率领全部红军与全苏区人民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谨就所见略陈如次。

（乙）日本决定压迫南京扩大内战，俾遂其灭亡我国之谋。南京一部分亲日分子接受日本指示，继续发展蒋氏对外和平对内战争之政策，准备向西北大举压迫。然而全国民众、国民党之大多数、各省有力军人无不渴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热烈欢迎西安之抗日起义，反对日本与中国汉奸之阴谋。

（丙）我们行动方针似应立即进行如次各项，应急变：

（一）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第一集团军，张学良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杨虎臣为总司令；红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以三个集团军高级将领为委员，每集团军三人至五人，以张学良、杨虎臣、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统一军事政治领导。以上组织如荷同意，立即以三方抗日救亡联席会

议名义向全军全国宣布。此外，极力争取阎锡山先生及全国其他爱国将领加入，推阎锡山先生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

（二）目前军事步骤：抗日援绥联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在目前三星期内，由杨兄所部固守西安城，张兄所部及弟部担任野战。如荷同意，弟部主力可于一星期内到达西峰镇，尔后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原，依情况决定；弟军一部则在定、盐、环钳制胡敌，另一部则在肤、甘钳制汤敌。王以哲兄部仍在固原防御胡敌，于学忠部仍守兰州。只要打得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战局，即有若干失利，亦于大局无碍。以上第一个步骤实现之后，依情况再决第二步。

（三）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提议：

（子）在联军三部分中一致提出下列十个口号：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联合起来；抗日军队同抗日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召集救国会议，建立救国政府；争取人民自由；反对日本灭亡中国，反对汉奸扩大内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保卫中国而战，为援助绥远而战，为收复东北而战；抗日联军万岁！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万岁！

（丑）在部队中进行热烈的政治鼓动。

（寅）肃清部队中之亲蒋分子。

（卯）鼓动全军战斗勇气，造成至死不屈精神。

以上各项作为弟等之提议，敬祈需择，时机迫切，稍纵即逝，倘承英断采纳，合作幸甚，革命幸甚，并乞电复。

弟　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张国焘　彭德怀

贺　龙　肖　克　林　彪　徐海东　徐向前同上

十二月十四日

# 野战军应开至西峰镇

（1936年12月14日）

彭、任[1]：

野战军应开至西峰镇[2]。有如下理由：

甲、南京已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力对付张杨[3]，主力由潼关进。

乙、张杨内部有许多不稳成分，南京政策又拉杨打张，红军与之靠拢，壮其胆而振其气。

丙、靠近张杨，可应付各种事变，远离则不能。

丁、西峰镇靠近王以哲[4]，仍可打胡[5]。

戊、不管西安能守与否，南下有几种机动。

己、暂时出宁夏不可能，且变为单独的。张杨同时则进入陇路。

庚、在现地暂时不动，无仗可打，对张杨危急又不能救。依上理由，所以第一步到西峰镇。

毛泽东

十四日

---

[1] 彭、任，指彭德怀、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2] 西峰镇，即今甘肃西峰市。

[3] 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

[4] 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

[5]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 关于注意洛阳、咸阳之敌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4日）

李宜兄：

十分注意洛阳、咸阳之敌，彼等有围城救蒋之企图，请将全部精力注意于集中与团结〔东〕北军及十七路军上面。

东　来

寒二十

# 应奉行大的战略击破敌之要害[1]

（1936年12月15日）

彭、任：

无论军事政治方面，目前均须击破敌之要害。敌之要害不是宁夏或甘肃，而是河南与南京。敌已奉行大规模内战，我们对战争是后发，不是先发。然在敌主力向西安进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此方针应无疑义。行动务求荫蔽，一切人不得下达。

毛

十五日二十时

[1] 这是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后为应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大规模内战，关于红军大的战略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和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

# 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

（1936年12月15日）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勋鉴：

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均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2]，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3]、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夫中国国民党中爱国英贤岂得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共方面的军政要员为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给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报。

[2] 指张学良、杨虎城1936年12月13日通电全国宣布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3] 福建事变，指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建发动的事变。事变后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和分化下失败。

谓少，然受制于蒋氏，复受制于媚外残民之亲日派，正气不伸，党义为毁，国则日蹙百里，伤破碎之河山，民则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语云，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萃沿海长江守备之军，大兴讨伐于西北一角，姑无论西北苦寒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烽火之侧，而全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借令战胜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1]，取青济[2]，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惮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否则国亡种灭，不但全国人民及贵党中爱国志士不能坐视，鄙人等亦决不能袖手旁观

[1] 沪宁，指上海、南京。

[2] 青济，指青岛、济南。

也。临电屏营，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张国焘
林祖涵　徐特立　王稼穑[1]　彭德怀
贺　龙　叶剑英　任弼时　林　彪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删

[1] 王稼穑，即王稼祥。

# 关于周恩来十六日到延安请派飞机去接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5日）

李宜[1]兄：

（一）已派红军一部去肤施接防，不知城内民团抗拒否。

（二）恩来本晨出发，明十六日晚到肤施。

（三）请派飞机于十六日上午到肤施机场视察，见有“天下”二字即降下接周。

（四）川刘、晋阎接洽如何。

泽东

十二月十五日

[1] 即张学良。

# 关于通过端纳活动停止南京发动内战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5日）

李毅兄：

（一）法国舆论颇佳，英国亦不坏。

（二）闻兄之前顾问英人瑞〈端〉纳有来陕说，如宜经过瑞〈端〉氏停止南京正在发动之内战，并争取英国同情，乘瑞〈端〉氏返宁派人同去接洽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三人。

（三）弟方本日发表正式通电："坚主停止内战。"另有电致陈立夫。

（四）昨电组织抗日联军，对外请暂勿发表，惟对内似宜宣布，以一军心。上述各点统请裁夺。

弟　泽东

十二月十五日

# 关于国内外对西安事变的反应等情况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6日）

李宜[1]兄：

（甲）西安事变震动了全世界，除日、意指为赤化外，法国急进党谓：张学良已成中国第一有权威之人物；英国取调和态度。

（乙）国内纷扰已极，江浙金融大恐慌现象。

（丙）正面前进之敌，尚仅樊崧甫两师，黄杰师之第二旅，似向洛阳进，第十师方从汉口开动，共不过十三四团。李铁军师向南阳；王耀武等在汉中陇南；胡、毛、曾三部有向韦州、同心城集中讯；汤恩伯想回陕，尚未开动。

（丁）望兄坚持底集结部队，提高士气，发动民众，防止反侧，胜利前途是伟大的。

毛泽东

铣酉

---

[1] 即张学良。

# 关于发动民众反对中央军进攻致张学良、杨虎城电

（1936年12月16日）

汉卿、虎城两先生：

为了坚〔持〕决战胜利，千祈注意发动民众，主要将沿陇海路、西兰公路、西梁公路各县之民众发动起来，拥护抗日联军，拥护西安起义，反对中央军进攻，保卫抗日首都，保卫抗日根据地。是否有当，尚祈卓酌。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 关于西安事变应和平解决等事给阎锡山的信

（1936年12月16日）

飞送山西阎百川先生勋鉴：

接彭雪峰〈枫〉转来电，知先生抗日救国义薄云天，敝方奉商各端，倘荷赞谅，感幸实深。西安事变后，时局急转直下，有数事就商于先生者：

（一）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敝方删日通电详申斯旨，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

（二）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谓宜举宁方西进之军改道北进，张、杨二公所部尤志切同仇，红军则久矣，愿附骥尾与国仇相见于绥察之间，共组抗日联军，推先生为统帅，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可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社会秩序不加丝毫干涉，乞速指示以便遵循。

（三）立即建立无线电联络，雪峰〈枫〉带去呼号密码，未知此处已否启用，敝方电台屡叫未通，幸赐注意。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 关于请接周恩来到西安致刘鼎转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7日）

刘鼎转李毅兄：

甲、恩来昨到扶施城外，扶施民团守城不开，交涉不听。

乙、有何方法接恩来到西安请即示。

丙、可否派武装大汽车两辆到甘泉，何日可到。

弟　泽东

十七日五时

# 关于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龙海线等问题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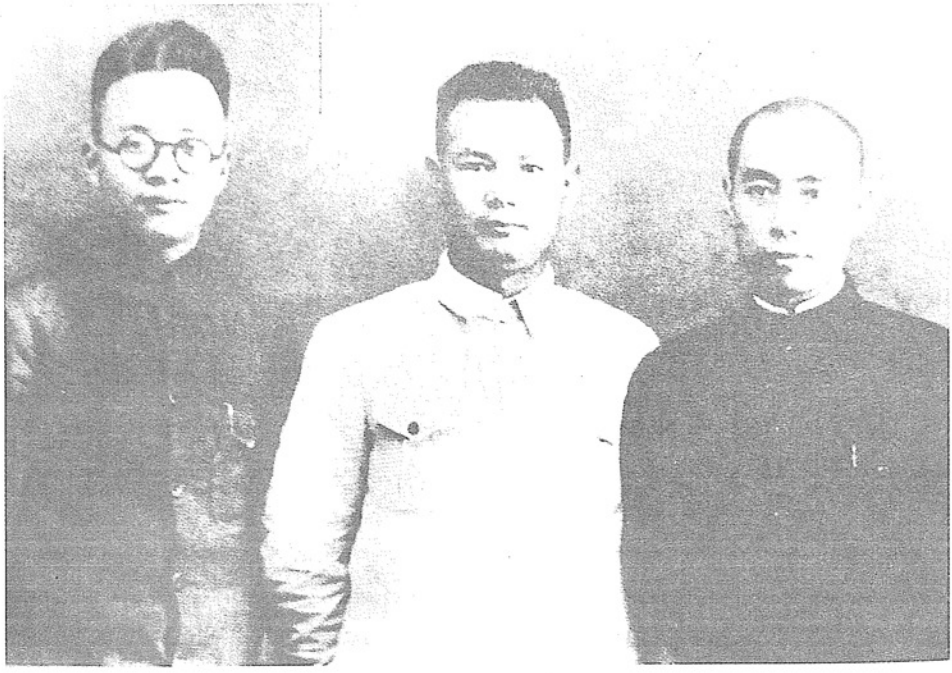
李毅兄：

筱电奉悉，集力抗战甚妥。惟对敌意见，弟认胡宗南、汤恩伯均不过一支队，各以一部钳制之可也，敌之要害在南京与京汉、陇海线，若以二三万人之战略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陇海取得决定胜利，则大局立起变化，此点祈考虑。我们对远方[1]已作几个报告，尚无回报。兄令刘鼎将每日群众运动情形电告一次，若远方知此次事变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民众联系的，估计当寄以同情。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恩来在肤施城外等候，请速饬肤施民团让出该城。如何盼复。

弟　赵东

十七日

[1] 指共产国际。



应张学良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秦邦宪）到西安参加谈判。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一行飞抵西安，立即和张学良举行会谈。

# 关于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1936年12月19日）

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以打击。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我们应与东北军、西北军接近，对他们的态度，不仅不与南京混同，而且与阎锡山也不同，我们对张、杨是同情的。应当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很大。它要取得斗争的胜利，无疑地是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与广大群众的帮助。现在的营垒是两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另一方是共产党与抗日派。中间还有动摇与中立的一派，我们应争取这些中间派。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

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1]

（1936年12月19日）

南京孔庸之，孙哲生，冯焕章，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杨虎城，王鼎芳，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诸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出抗日救亡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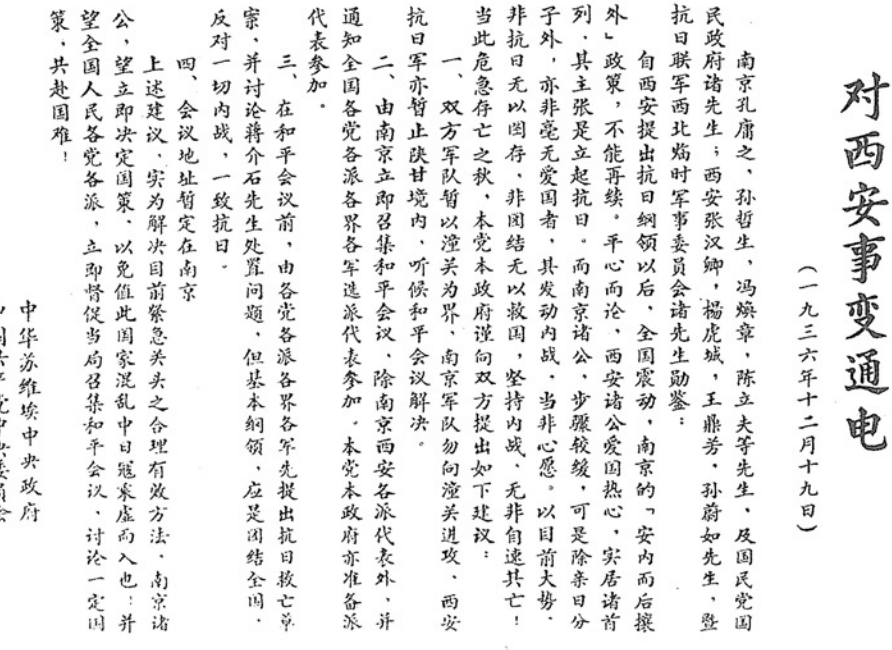
[1] 本通电于1936年12月19日还全文向全国人民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发表，文字基本相同。

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

#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

（1936年12月19日）

## 一　西安事变产生前的形势

（一）在绥东局部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以及西北各大城市（如西安、太原、绥远），抗日运动突飞猛进，不但使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绝大部分的中等资产阶级参加，即大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着决定的分化。

（二）南京政府正面对着这一迅速发展着的抗日运动，它被迫着很迟慢的与不坚定的改变着它过去对日退让的政策。在这转变过程中，它还是对日力求妥协，对绥远局部抗战表示不积极，对全国抗日运动，采取压抑政策，对红军不肯停止进攻。

（三）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将士，在全国与西北人民及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与推动之下，抗日情绪特别高涨，因此要求迅速停止进攻红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但他们的这种要求，为蒋介石所严拒。

## 二　西安事变的意义

（一）这一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

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

（二）但是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

## 三　西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及其拥护者

（一）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了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掠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造成的。[1]

（二）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

---

[1]　《六大以来》版此处为：“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

## 四　为实现第二个前途中共的基本方针是

（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

（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

（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军在军事上给张学良、杨虎城部以援助，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图为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和国民党东北军部分将领在陕西三原的合影。

# 关于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致潘汉年电

（1936年12月19日）

汉年同志：

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毛泽东

皓

# 关于张学良、杨虎城要坚持更有前途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19日）

周：

（甲）端纳谈些什么。

（乙）有蒋鼎文释放讯何故。

（丙）严防于右任。

（丁）欢迎宋子文来西安。

（戊）胡、毛、曾、关[1]准备集中天水。我意让他集中空出甘北。

（己）汤恩伯未动，不一定回陕。

（庚）张、杨必要坚持，更有前途，一点不须气馁。

（辛）情况望详告。

毛

[1] 指胡宗南、毛炳文、曾万钟、关麟征。

# 关于争取十七路军抗日反内战问题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19日）

周：

（一）争取十七路全部稳定于抗日、反内战立场，是当前重要一着。

（二）十四个政治口号，应提出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全军中，早晚点名呼唤。

毛

# 配合张学良杨虎城部消灭东来之敌[1]

（1936年12月19日）

周：

甲、时局正在发展，一方面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局面；另一方面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中国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国际和平国家，正在结合反对内战，拥护抗日。

乙、苏维埃、共产党十九日主张召集和平会议之通电，乃为团结一切国内、国际左翼及中间势力，为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而斗争。

丙、西安抗日军亦应本此共同之总方针而前进。

丁、坚决消灭进攻之敌，为执行此总方针之重要手段。

戊、红军决向西安集中，配合张杨首先消灭东来之敌。

毛泽东

十九日二十三时

---

[1]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和叶剑英等为代表到西安与张、杨和各界爱国人士共商国是，并同蒋介石直接谈判；同时，在军事上作了以红军主力协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准备迎击“讨逆”军进攻的部署。这是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

# 关于坚守渭南临潼西安线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19日）

周：

（甲）坚守渭南、临潼、西安线，二十天红军便可赶到，一战击破东敌，则西敌不成问题矣。

（乙）单用十七路于渭南西安线，十七路必胆怯，提议东北军、十七路集中力量守该线。

（丙）从渭南至西安筑坚二十道至三十道，并筑碉堡死守二十天。

（丁）敌仅二十八及七十九两个师，第二师之第二旅及第十师尚未到，其力甚薄。

毛

十九日二十三时

# 关于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0日）

周：

国际来电如下：

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

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毛

二十日二十时

# 关于和宋子文见面问题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0日）

周：

如宋子文态度同情陕变，兄可设法见他，一面提出我党调和陕变、中止内战、共同对日之主张，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痛陈时局危急，内战是死路之意旨，征求他即召集和平会议，解决国是。

毛

# 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后方问题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0日）

周：

东北军应以洛川为后方，十七路以韩城为后方，两军辎重宜逐渐向两地迁移，准备万一放弃西安时，不至仓卒误事。但迁移宜秘密，并且是在坚守西安的决心下，才这样做的。

毛

# 关于同意军事计划等问题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0日）

周：

各电均悉。

（甲）同意军事计划。

（乙）红军主力第一步集结庆阳，如胡宗南南下决消灭之，王以哲军应固守固原西峰。

（丙）杨要之人正准备，并电南汉臣〈宸〉回。

（丁）汉年有电从天津发来，邓文仪请他同飞西安说和，汉年正向各方活动和平。

毛

# 给彭雪枫的信[1]

（1936年12月20日）

雨峰同志：

致百川[2]先生信阅后即送交，并求回信。建立电台交通、吉县延长徒步交通及晋陕通商关系，务须即办，不可延缓。以后往华北交通多须通过晋境，请与阎先生妥商，得其同意。兹派宋绍林同志送信与阎并给你此信，即将回信交彼带回，以快为好。璩象咸县长如得阎许可，最好往来彼我之间，因他情形已熟悉。你在外间交接，态度务须诚恳，立场务须坚定，用费务须节省。对陕变[3]方针，已详十九日通电[4]，望本此作去。晋方交涉经过写一报告来。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廿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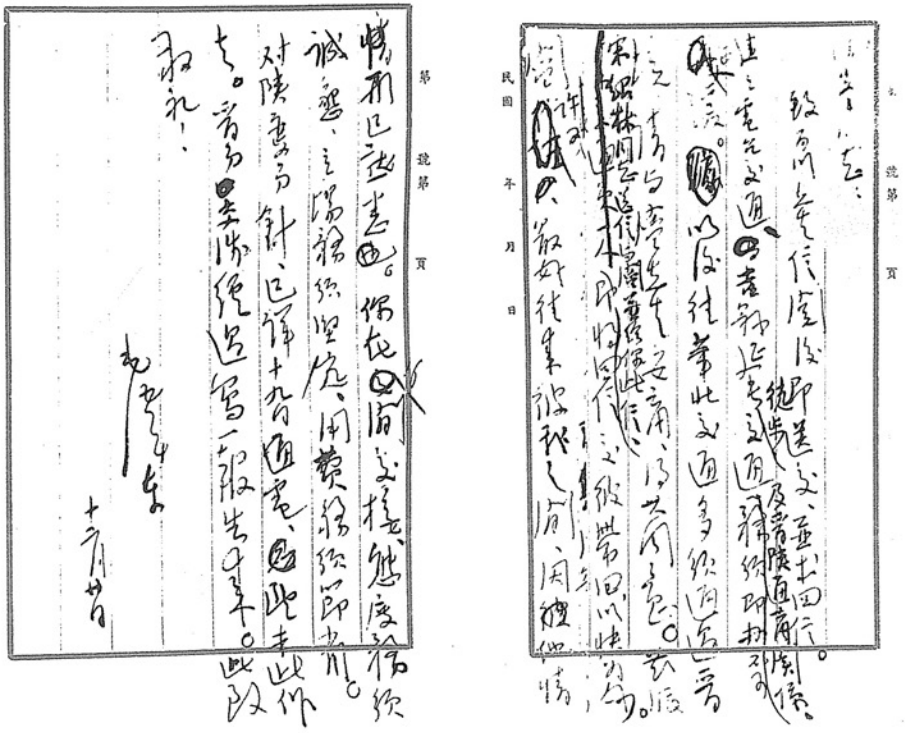
---

[1] 彭雪枫（1907—1944），又名彭雨峰，河南镇平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支队长、师政治委员。1936年任中国共产党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1941年任新四军新四师师长。1944年在河南夏邑作战中牺牲。

[2] 百川，即阎锡山。

[3] 陕变，即西安事变。

[4] 指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1936年12月19日发出的提议召集和平会议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通电呼吁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抗日。



毛泽东致彭雪枫信的手稿。

# 关于共同抗日问题致王以哲转马鸿宾电

（1936年12月21日）

王军长鼎方兄：

转马师长鸿宾勋鉴：

承王军长介绍贵师与敝方结为抗日友军，曷胜欢迎，从此纪〈化〉敌为友，谊同一家，为抗日而誓师，为救亡而奋斗，相亲相爱，互助互援，谨电申意。

敬颂

勋祺。

弟　毛泽东

朱　德

彭德怀

# 实现国内和平一致抗日的五项条件[1]

（1936年12月21日）

汉年同志：

即向陈立夫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

（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

（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

（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

（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结果如何，速以电报答复。

毛

二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给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潘汉年的电报。

# 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致周恩来电[1]

（1936年12月21日）

恩来同志：

（甲）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

（乙）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

（丙）请与张杨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骤：

（一）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

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

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

第三，保障民主权利。

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周恩来的电报。

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

（二）依上述条件与阎锡山、宋子文、于右任、黄埔左派、二陈[1]派等谈判。

（三）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

（四）招致一切愿意和平之人士来西安谈判。

（五）招致英美顾问再来西安，经过他们使英美赞助和平。

（六）巩固西安军事阵地，使尽可能持久，以待政治谈判之成功。

（七）对陕甘之黄埔军官，如胡宗南、樊崧甫、董钊等进行接洽。

（八）兄应以共产党代表资格，公开与蒋、陈、宋、阎、于等，基于上述条件与谈判，调停双方。

中央书记处

二十一日

[1] 指陈果夫、陈立夫。

# 揭破日本与何应钦派联合害蒋之阴谋[1]

（1936年12月21日）

周：

派人去董钊、樊崧甫、王耀武、胡宗南等处，告以何应钦、何成浚等亲日派实欲置蒋于死地之阴谋，愿与谈判恢复蒋自由之条件，黄埔系不要受亲日派、阴谋派所愚，并发传单揭破日本与何应钦派联合加害蒋之阴谋。

毛

二十一日二十时

[1] 这是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

# 致周恩来电[1]

（1936年12月22日）

红军正向南急进，二十天内准可集中咸阳[2]。罗炳辉、萧劲光、谢嵩[3]三部钳制胡宗南，必要时宋时轮部也加入。陕北苏区均恢复，瓦窑堡、延川、延长、延安四城均入我手。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通报红军进军和陕北苏区恢复情况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12月21日致电毛泽东，提出希望红军主力十天内集中长武、彬县一线，再十天集中兴平、咸阳一线。

[3] 谢嵩，当时任红二十九军军长。

# 给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的信

（1936年12月22日）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诸先生：

接到了你们的信，完全同意你们信上的意见。我们与晋绥当局之间尚缺乏必要的与诚意的联系，对于当前迫切的救亡任务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坚决申明：完全同情于晋绥当局及军队与人民真正抵抗日寇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我们愿以全力为他们援助。今年春间红军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静待他们之谅解。红军虽迫切愿望迅速进入抗日阵地的最前线，但必须先求得当地友军之谅解，在没有取得谅解以前，红军决不冒然开进。如果晋绥当局真心抗日，而又于他们认为必要时，红军当与之订立合作协定，在协定中规定划分防线，互相援助，保证给养补充，并统一作战指挥等事项。如果此协定能够订立，红军依据此协定进入晋绥抗战地段，则红军当唯抗战之利益是务，决不干涉当地之行政与决不对友军有任何不利的行动。来信问到红军在西北的战略企图，我们告诉你们，红军的唯一企图在保卫西北与华北，目前是集中于陕甘宁地区，首先求得

---

[1]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指1933年福建事变失败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于1935年在香港建立的国民党民主派的秘密政治组织，办有《民族战线》等报刊，宣传抗日反蒋。

国民党军队的谅解，在合作基础上共同进入抗日阵地，舍此并无其他企图。我们现已向西北一切国民党军队发表申明：红军自动地停止攻击他们，仅在他们进攻时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在为自卫而缴获他们的人员武器，如果他们转至抗日时，一律送还，他们向抗日阵地转移时，不许红军任何人员有任何妨碍他们的举动，并须予以一切可能的援助。总之，当此国亡无日之时，我们的志愿是抗日救亡，也仅仅在于抗日救亡。各方虽尚有若干对我们怀抱疑虑的人，但悠长的岁月将证明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你们为民族解放而奋斗，我谨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与我们的红军，向你们献上热烈的敬意，希望双方结成坚固的阵线，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并望你们推动各方首先是晋绥当局迅速执行抗战并成立各派的联合阵线，我们亦正在向各方面这样去做。专此奉复。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二日于陕北苏区

# 给阎锡山的信

（1936年12月22日）

百川副委员长勋鉴：

陕变[1]突起，事出非常。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敝方主张详删皓两电[2]，抄陈台鉴。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至于红军，只要南京停止“剿共”政策，赞同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并划定适宜之防地，决不向南京管辖境内进攻。对我公领导之晋绥方面，前遣彭雨峰晋谒，已将鄙意奉陈。数月来我公及傅将军在绥东英勇抗敌[3]，与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取消防共会，尤为敬佩之

---

[1] 陕变，指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领导人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次事件通称西安事变。

[2] 删电，指1936年12月15日毛泽东等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电报。皓电，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1936年12月19日提议召集和平会议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

[3] 1936年8月和11月，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蒙军两次进攻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地区。绥远驻军傅作义等部奋勇抗击，并于11月收复百灵庙等地。

至。惟现宁陕相持甚急，如宁方坚持进攻而无丝毫转圜之余地，则红军势难坐视。战争范围扩大，所需于我公协助之处甚多。如何使晋绥陕甘四省亲密团结，联成一气，俾对国事发言更为有力之处，敬祈锡示南针。尊处与敝处电台联络亟宜从速建立，再从吉县、延长建立徒步通信站。如荷同意，电台即从一月十五号起开始发报。徒步通信站在吉县者尊处任之，在延长者敝处任之，在平渡关两岸各备渡船一只，约定专任通信，双方武装互不过河。晋陕经济通商亦恳早日实行，恢复寻常关系。吉县县长璩象咸先生今春随军来陕，屈在敝处教育部工作者数月。璩先生诚笃君子，对敝方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知之颇悉，倘得随时往来，甚为欢迎。彭雨峰在尊处多承优遇，感荷实深，尚祈随时予以指导，使之有所遵循。一切统祈详示。敬颂

公祺！

毛泽东　敬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 致南汉宸电[1]

（1936年12月23日）

因十七路军不巩固，极须大力进行政治工作，杨虎臣极望兄回帮助。

兄至十七路军，应坚定其军政干部抗日救国、联红联共、不怕牺牲、直干到底之决心，并发展党的组织，争取十七路军变为真正的人民抗日军。

[1] 这是毛泽东致南汉宸电的主要内容。

# 关于胡、曾、关敌南下及我军部署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3日）

周：

甲、胡、曾、关准备南下，判断不走海静即走固镇，但不会走庆阳。现周、孔[1]退金积，再向中宁堡，顾祝同到宁夏后尚须与胡、关会商，判断须一星期后才能开始动作。

乙、提议作如下部署：

一、固原、平凉、西峰、镇原四点东北军位置四个师筑碉屯粮，为死守计，必要时固原、西峰再增加一个师，马洪〈鸿〉宾守黑城镇李旺堡线。

二、庆阳、合水由萧劲光占领。

三、罗炳辉为司令员，宋时轮为副司令员，宋任穷为政委，指挥二十八军、三十二军、骑一团及二十九军主力，尾敌前进威胁敌侧后。

四、准备调四方面军向兰州平凉，由兰州补充其被服弹药，如何盼复。

毛泽东

二十三日十二时

---

[1] 指周祥初、孔令恂。

# 关于时局正在变化中<br>张、杨不会久处孤立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3日)

周：

甲、南汉臣〈宸〉来电，王世英去沪返南京即动身，他问回陕做何事。

乙、津电二十九军高级干部开会，主张停止内战，开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事，已授意教育界出面要求宋哲元发表此主张。

丙、时间正在变化中，张、杨不会久处孤立，但应告诉张、杨及其干部，把工作放在困难点上，即使困难，奋斗到底，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如无此种决心，则遇有挫折将不能支持，凡事向好坏两面着想，力争好的前途，同时也准备对付坏的局面。

毛泽东

二十三日二十时

# 致阎锡山、赵戴文[1]

（1936年12月23日）

（一）十分钦佩晋绥当局对日寇的英勇抗战、开放爱国运动及取消防共组织，敝方与晋绥的基本方针已属一致，希望晋绥当局坚持此方针不变更。（二）希望即刻实现双方的密切合作，首先停止对西北的全部内战（包括对红军的与对西安的），给南京亲日派以压力达到此目的。（三）红军要求晋绥当局同意开赴绥察抗日，愿受阎之指挥，不干涉晋绥行政与社会秩序，晋绥发给伙食、弹药。（四）建立晋西、陕北交通通信，恢复通商关系，从吉县、延长局部开始。（五）不使汤恩伯回陕，并调出李仙洲、高桂滋、高双成离开陕北，此事请阎、赵大力帮忙。

[1] 这是毛泽东请山西吉县县长璩象咸代向阎锡山、赵戴文面陈的内容。赵戴文，当时任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自强救国同志会副会长。

#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6年12月24日）

对临时军政委员会名单，我们方面拟参加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徐向前五人。恩来、伯渠参加实际工作不参加名单，以便将来进行国民党工作。泽东不参加。对张、杨说明，共产党为争取全国各派，应采此种方针，对张、杨亦是有利的。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博古是12月23日和叶剑英等一起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的。

# 关于坚守固原等处及罗炳辉等均为配合东北军作战之部队致王以哲电

（1936年12月24日）

鼎芳兄：

两电均悉，敬复如下：

一、胡军孔、周[1]两师现由金积向同心城集中，第一师在其后，曾万钟师似在预旺城未动，毛炳文部不明。彼等均有向固原进攻讯。兄部宜在固原、镇原、西峰、平凉等处重新配备兵力，加修碉堡，屯集粮食为坚守计。

二、罗炳辉、宋时轮、萧劲光三部，红军大学第二校办，陕甘宁省所属游击队均为配合兄部作战之部队。罗、宋两部现在预旺城东侧，曾南进时彼即尾追其侧后，因相距尚远，暂时不容出击，联络由保安送克密去已来不及，有电应由弟处转令执行。肖劲光率独立师在预旺堡三岔线，红大第二校不日进驻庆阳，请令西峰周师与之联络，由陕甘宁省委负责。李富春在曲子镇，周师亦可出击联络。

毛　朱　彭

敬午

---

[1] 指孔令恂、周祥初。

# 关于东北军、西北军以西安为中心建立后方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5日）

周：

提议东北军、西北军均以富县、甘泉、延安、牛武镇、羊泉镇、张村驿为总后方，再以庆阳、曲子、环县为第二后方。立即开始输送，先搬最重要物品。为避飞机，主要不置于城市，而置于乡村，靠近苏区万无一失。但此决不动摇以西安为中心持久作战奋斗到底之决心。

泽东

二十五日十二时

# 对张学良杨虎城击破东敌部署的提议

（1936年12月25日）

周、博[1]：

甲、据本日情报：何应钦[2]以主力周嘉黄杰[3]两纵队共二十团用于渭北，李默庵[4]纵队大概八个团用于洛南，正面仅置樊松甫[5]纵队八个团起吸引与钳制作用。

乙、敌之部署甚便于红军主力到达咸阳后从蓝田击破李默庵纵队，突击陇海线，断其归路，开展战局。提议速作如下部署：

一、立即派人秘密解决冯钦哉[6]，巩固大荔于我手中。

二、巩固孝义镇[7]沿河，迟滞敌之渡河。

三、以东北军两个师秘密输送于富平，巩固该重点于我手中。

---

[1] 周、博，指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当时是中共中央派往西安的代表。

[2] 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国民党军“讨逆”军总司令。

[3] 周嘉，当时任国民党军“讨逆”军东路集团军第六师师长。黄杰，当时任国民党军潼关警备司令。

[4] 李默庵，当时任国民党军“讨逆”军东路集团军第十师师长。

[5] 樊松甫，即樊嵩甫，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军长。

[6] 冯钦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第七军军长兼第四十二师师长，西安事变后不久背叛杨虎城投靠蒋介石。

[7] 孝义镇，位于陕西省渭南市东北。

四、三原、高陵、康桥镇[1]各置一个师。为坚守计，渭南、临潼间及临潼、西安间各架桥一座，并多准备船，以便红军必要时转向北岸作战。

五、置一个师于蓝田，出一个团于厚子镇[2]，另置一部于保安镇[3]，再于商县置一旅，均坚工死守，保证后方，便红军突击陇海路。

六、渭南、临潼正面置两个师。

七、西安暂时置一个师足矣，其余集中于机动位置。以上建议速向张杨[4]提出。

毛泽东

二十五日三时

---

[1] 康桥镇，位于陕西省临潼县北部。

[2] 厚子镇，今名厚镇，位于陕西省蓝田县东北。

[3] 保安镇，位于陕西省洛南县西北。

[4] 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

# 关于争取陈诚、朱绍良、邵力子诸人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5日）

周：

向陈诚、朱绍良、邵力子、陈继承、曾扩情诸人解释我们的方针，争取他们。

毛泽东

二十五日二十四时

# 关于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之自由
#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

（1936年12月25日）

彭、任：

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

野战军仍速开咸阳集中。

毛泽东

二十五日

# 和军委电台部分同志的谈话[1]

（1936年12月25日）

革命嘛，总是难免走点弯路，总是要吃点苦的。如果有人因为吃了点苦，就不愿意在四方面军工作，那就不对了，四方面军也是党领导的军队嘛！我们干革命，就得听党的话，就要服从革命的需要，哪里需要我们，就到哪里去，革命事业嘛，总得有个分工，分到哪里，就在哪里战斗，不能挑挑拣拣。如果，认为革命工作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话，那是不对的。

[1] 在长征的路上被分配去左路军工作的军委电台的部分同志来到保安。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他们走了许多冤枉路，吃了不少苦，觉得心里委屈，工作上不安心。毛泽东得知后便去驻地看望他们，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这是毛泽东等和他们谈话的部分内容。

#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6年12月26日）

为督促南京撤兵，为准备万一变化，为便利扩大补充野战军，仍应执行原计划，惟不驻咸阳，而照一、二、四方面军次序，驻兴平、武功、扶风、凤翔线，处在南京军天水集团与潼关集团[2]之间，对东北军、西北军则处在其外侧。

西安已有五万元向庆阳运送。一切购买，不打土豪。驻乡村不驻县城。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2] 天水集团，指何应钦组织的“讨逆军”的西集团，由顾祝同指挥，集结于天水等地。潼关集团为其东集团，由刘峙指挥，集结于潼关等地。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6年12月27日）

## 一

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它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蒋介石释放后，他的动摇是否最后结束？现在还只能说是结束的开始，我们要动员一切力量结束他的动摇。西安事变使蒋介石的地位降低了，而我们的地位提高了。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应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开展全国局面，把红军扩大起来，与张、杨更加团结，成为抗日的核心，这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我们的具体策略是推动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大会上所作结论的一部分。

## 二

巩固西北根据地，扩大红军和苏区，改造东北军和西北军。做好全国群众工作，把群众组织起来，这是工作的重心。加强对国民党的工作，特别要作好左派、中派和军队的工作，重视宣传工作，党报应办起来。培养干部，要办党校和红军学校，造就群众的、军事的、党的、政治的四种人材。应督促国民党三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

# 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

（1936年12月27日）

蒋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地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的实际，即是中国抗日派与中国亲日派的剧烈斗争，也即是世界和平阵线与世界侵略阵线的斗争之一部分，并在斗争中推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间派最后结束他们的动摇地位，而坚决走上改革内政、对外抗战的道路。这个过程的快慢，首先决定于抗日派力量的壮大。因此，我们目前必须：

（一）宣传此次和平解决的胜利及日寇与亲日派挑拨内战阴谋的失败，号召全国人民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亲密地联合起来，实行改革国内政治与对日抗战。

（二）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许诺的条件，即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共产党，召开救国会议，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与实行对日抗战等条件。

（三）巩固西安发动的胜利，巩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团结，赞助张杨改造东北军、西北军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发动与组织西北民众，联合西北少数民族，扩大与巩固红军，使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与策源地。

（四）继续推动各地实力派参加对日抗战、对内民主的运动，同西北民主抗日力量实行合作，以促进南京的改革与抗战的发动。在南京政府中，推动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实行改组南京政府。

（五）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吸收广大的下层群众到运动中来，消灭严重存在着的缺乏组织性的弱点。

（六）在原有基础上发展与巩固共产党的组织。

（七）党应准备实现一切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必要的改变，以适合于全国统一战线建立后的新环境。

# 给韩复榘的信[1]

（1936年12月27日）

西安事变，西北抗日局面成立，先生主张和平解决，今已达到目的。惟蒋氏难免又受群小包围，延缓抗日发动亦意中事。今后如何改组国防政府，如何组织全国之抗日联军，如何确定救亡大计，均愿与先生及鲁军方面切实合作。

[1] 这是毛泽东致韩复榘信的主要内容。

# 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1]

（1936年12月27日）

现在蒋介石出于无奈，已经承认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但并没有签字。对于这个问题，蒋介石签字当然好，但签了字这个人也会赖着不执行啊，就是不签字，迫于形势，他也有可能执行。究竟执行不执行呢？这就要全国人民进一步努力，逼迫蒋介石执行。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能都是顺利的，都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成功。

[1] 这是毛泽东在红军大学所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的一部分。

# 与教堂订立的协定[1]

（1936年12月28日）

（甲）教堂承认苏维埃红军之抗日救国及反军阀卖国贼之主张，苏维埃红军承认教堂之存在。（乙）拒绝一切国民党军阀之军队、民团、侦探进入教堂区域，一切教民均为苏维埃公民，服从苏维埃法律，苏维埃红军承认宣教与信教的自由。（丙）教堂之财产不没收，由教堂自动捐助抗日救国经费。（丁）经济通商不加阻碍。（戊）其他事项随时协商办理。

[1] 为争取教堂与苏维埃红军建立和平友好关系，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提出与各教堂订立协定。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协定的主要内容。

#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1936年12月28日）

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1]，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2]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

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

---

[1] 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因受中国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积极布置“剿共”军事，下令镇压西安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1936年12月12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同时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随后被释放回南京。

[2] 指西安事变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亲日派。这些人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借西安事变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以便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并乘机夺取蒋介石的统治地位。

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义，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1]，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些条件的实行，首先需要确守信义，并且需要一些勇气。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

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释。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

---

[1] 上海爱国领袖，指当时在上海领导抗日爱国运动的全国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他们在1936年11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到1937年7月才被释放。

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三字改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1]、何应钦[2]等的阴谋，坚决主张

---

[1] 汪精卫是当时国民党中亲日派的首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贯主张妥协。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外通电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大张挞伐，迅予围剿”；同时立即从德国动身回国，企图夺取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继续散布降日言论，反对国共合作抗日。

[2] 何应钦（1890—1987），贵州兴义人。当时是国民党中亲日派的另一首领。西安事变发生后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推任为“讨逆总司令”。他积极筹谋掀起内战，部署国民党军队沿陇海路进逼陕西，调派空军轰炸渭南等地，并计划轰炸西安，炸死蒋介石，以便取蒋介石的地位而代之。

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1]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共产党早已于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中将此种赞助的诺言许给蒋氏和国民党了。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党的言行，实高出于信任国内任何党派的言行。

---

[1] 宋子文为亲美派。由于当时美日两帝国主义在远东争霸的矛盾，他根据美国的利益，对于西安事变，也主张和平解决。

#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6年12月31日）

中央十日内迁移延安，南面甘泉、北面瓦窑堡两城不能不交给我们，否则殊为不便。请与杨商交出甘泉，并请杨电高桂滋交出瓦窑堡，陕西红军可不进攻清、绥[2]，野战军可不进占旬邑、淳化、耀州为交换条件。[3]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要求周恩来等和杨虎城商谈中共中央迁移延安后红军驻地问题，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2] 清、绥，指清涧、绥德。

[3] 12月30日，周恩来与杨虎城商谈红军驻地问题，杨提出红军不要进入太逼迫西兰公路的旬邑、淳化、耀州（耀县）。

#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6年12月31日）

西路军已放弃永昌、山丹，向甘、肃两州进，但二马[2]追击甚紧。请商杨虎城电马步芳，停止向西攻击，红军亦不向凉州。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2] 二马，指马步芳、马步青。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 9 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 7 号兴力工业中心 5 楼 09 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 16 开

页　　面：544 面

版　　次：2013 年 10 月 1 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 年 10 月 1 日　第一次印刷

　　2013 年 11 月 1 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 套

全集字数：2015 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 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